

炎黄春秋

第 **2** 期
2012年

三十年新闻立法历程与思考

知情者谈饶漱石

我感知的启蒙、新启蒙、再启蒙

田纪云1988年谈通胀

美国的党代会：团结而胜负难料的大会

目 录

沉思录

- 1 三十年新闻立法历程与思考孙旭培
- 8 我感知的启蒙、新启蒙、再启蒙穆广仁
- 10 五十年代初毛刘之争的一个解读高王凌

访谈录

- 13 王元化：对启蒙思想的反思吴琦幸
- 17 知情者谈饶漱石景玉川

求实篇

- 25 我知道的《苏日中立条约》.....王 健
- 28 文革中的两岸关系孙宗一
- 32 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孙言诚
- 38 救国会倡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王国栋 王久战

人物志

- 41 储安平在《光明日报》当总编皮学军
- 47 潘汉年主持上海政法工作二三事吴 越

一家言

- 50 辛亥革命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陷阱袁伟时
- 55 重温新民主主义姚力文 刘建平
- 60 我看宪政社会主义萧功秦

往事录

- 62 田纪云1988年谈通胀丁龙嘉
- 67 1973年周恩来为何挨批金伯雄
- 71 胡耀邦1983年湘西之行章发林

亲历记

- 74 劳动直属营的军队右派陈 挺
- 78 新四军首长轶事陶 泊 口述 陶京天 整理
- 80 广西昭平公社化与大炼钢铁胡 辉

争鸣录

- 82 马克思主义发展有三个阶段吴启文

古今谈

- 87 义和团的战场表现：从无畏到怯懦侯宜杰

海外事

- 90 美国的党代会：团结而胜负难料的大会董郁玉

编读窗

- 49 也谈瞿秋白遇害赵于平

顾问

杜润生 于光远 李 锐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卢跃刚
 曲润海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希清 张荣华 张惠卿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宝光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副召集人) 沈志华 苏双碧 陈 敏
 邵燕祥 周瑞金 金冲及 胡德华 赵德润
 保育钧 钟沛璋 郭道晖 资中筠 凌 云
 展 江 徐小岩 秦 晖 袁 鹰 袁伟时
 高 放 高尚全 陶斯亮 钱理群 章诒和
 萧蔚彬 彭 迪 韩 钢 董 健 曾彦修
 鲁 諝 雷 颐 魏久明

社委会 杜导正(主任) 吴 思(副主任)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张晓鸥

社 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 常务社长 吴 思
 副社长 杨继绳 李 晨
 社长助理 胡竞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编 辑 吴 思
 副总编辑 徐庆全
 执行主编 洪振快 黄 钟

总 经 理 李 晨
 副总经理兼网络总监 张晓鸥
 财务总监 胡竞成
 发 行 部 孔 屏(主任)
 办 公 室 王海印(主任)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莊其環 李 琼
 秘 书 长 吴 思
 副秘书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棗赵阎律师事务所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010-85869163)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100045
 网 址 http://www.yhqw.com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发行部邮箱 yhcqfxb01@126.com
 电 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68539058
 编辑部 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部 010-68525374
 办公室 010-68522852(兼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单本定价 8元 全年定价 96元

三十年新闻立法历程与思考

○ 孙旭培

一、改革开放以来新闻立法工作的历程

基于对“文革”的反思和对国外新闻法治的借鉴,新闻改革和新闻立法的呼声首先在新闻界响起。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期间,来自新闻界的一些代表和委员就制定新闻出版法和保障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等问题发言,这些发言发表于当时的报刊上。在1983年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一些人大代表正式提交议案,“建议在条件成熟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鉴于制定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的呼声日高,1984年1月3日,中宣部新闻局就共同商议得出的意见,提出《关于着手制定新闻法的请示报告》,报告对立法的具体操作提出了一些建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有关领导人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都很快批示同意这个报告。

1984年5月,首都新闻学会召开理事会,宣布成立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共同组织的“新闻法研究室”。研究室开始出版不定期的内部刊物《新闻法通讯》,并且广泛地征求意见和搜集材料。1985年新闻法草案起草工作开始启动。

新闻法起草工作一开始,新闻法研究室组织的有关新闻法的一些讨论和形成的一些意见,如新闻法的指导思想、新闻法的适用对象和范围、报刊创办、新闻检查制度等。同时,新闻法的起草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出现一些意见分歧。

新闻法研究室于1985年开始起草,经两次修改补充,拟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草案)》第三稿。1986年11月,上海的新闻法起草小组拿出过《上海市关于新闻工作的若干规定》(征求

意见稿)。1987年初,国家新闻出版署成立,中央确定由新闻出版署负责“起草关于新闻、出版的法律、法令和规章制度”。从此,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对新闻立法只进行研究,不负责起草,新闻法研究室起草新闻法的使命到此结束。半年以后,新闻出版署于1987年7月将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法》(送审稿),送到国务院请求审查。1989年1月,新闻出版署拿出《新闻法》和《出版法》两个新草案。至此,作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新闻立法工作成果结晶的三个新闻法草案面世。

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央也希望制定新闻出版法,并且明确先出台出版法,然后出台新闻法。新闻法的制定也因此进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但进入90年代以来,新闻立法实际上进入停滞状态。与此同时,有关新闻及舆论监督立法的问题一直是全国人大代表立法议案、全国政协委员立法提案的重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新闻立法至今是有花无果。

二、目前中国对新闻传播的管理与规制方式

由于尚无专门的新闻法,而相关法规所起的作用又还不明显,因此,目前中国对新闻传播的管理和规制,通常起作用的还主要是党委和政府新闻主管部门和相关领导机关的指令、指示。

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方式有时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带来一些弊端。例如上个世纪80年代发生的武威地区收报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1988年3月16日,甘肃《武威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人民代表的心里话》的报道,这篇报道是由该报记者根据人大代表座谈纪要整理而成的,报道中涉及了人大代表就政府工作和干部作风等问题发



“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没有关于新闻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领域中取消新闻出版自由……”——马克思

表的批评意见。报道刊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有关领导对报道不满，下令收回当天报纸，并重新出一份报纸代替。此事被《中国青年报》披露，受到社会普遍关注。这种极端的做法虽然并不多见，但它却给我们带来许多思考和启示。

在中国，党和政府主管部门和领导机关可以通过组织和行政手段，包括直接向新闻媒体发布指令、指示，对新闻媒体进行管理和规制，这已成为一种常规性的做法。宣传部门每周召开由各媒体派人参加的吹风会，交代如何进行近期一些重要问题的报道，批评一些媒体的不当报道。这成为一种常规性的做法。进入90年代以来，由宣传部门直接向各媒体发布指令、指示（这些指令通常是不交代原因和理由的），成为对新闻报道内容进行日常干预的主要形式。

下面摘录一位在电视台实习的研究生工作日记中的一篇：

在台里做新闻的记者，每个人都要接触到一个叫索贝的新闻系统，因为所有的写稿、改稿和播出记录都在这个系统里面。而每次打开这个系统，都会先有一个对话框蹦出来，这个窗口叫做“消息通知窗口”，内容都是来自上级对各种新闻选题和内容的宣传和口径限制，不得违反。每天这些通知的内容涉及到政治、工商、文化等等，五

花八门，用红色字体标示，提醒大家注意。如今天我打开系统写稿子时就有一条：“福建省工商局长×××涉嫌行贿，并在被调查期间，私自出走到境外一事各档节目一律不报道。”

在他的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6月29日，接到领导通知：正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是一部重要法律，涉及面广，又比较复杂、敏感，社会关注度高，不要擅自报道，听从统一口径。

6月27日，接到领导通知：不得出版、转载、宣传《用新闻影响今天——〈冰点〉周刊纪事》。不报道查堵《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等图书。

……

像这样的消息，每个星期出现在系统里很多，这些选题都是不能做的。有意思的是，有一天当我在看这些消息的时候，部里一个老记者对我说道——这才是真正的新闻。

由于一些主管部门和领导机关，以及相关个人拥有对新闻报道的控制权，特别是舆论监督稿件刊发的决定权，这往往会为少数人搞“权力寻租”提供条件。郴州市委宣传部部长樊甲生，被新闻界称为“矿难新闻灭火队长”。当一些非法开采的小煤矿发生矿难事件后，樊甲生常常要求在第一时间对消息进行封锁，而后可获得矿山的干股或现金回报。近年来，一些新闻宣传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卷入腐败案，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同其运用自己手中控制的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稿件的刊发决定权搞权钱交易不无关系。这些人可以对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随意叫“停”，而且还冠之以“稳定压倒一切”的名号，在背后却大搞权钱交易，借国家公权之力，谋个人私利之实。这提醒我们要重视新闻传播管理的制度与法规建设，警惕少数部门、单位和个人利用手中的新闻报道控制权谋求私利。

三、我国要建立适度的新闻自由

我这一辈子都是研究新闻自由、新闻立法和新闻改革的。我以为，如果新闻自由度（这个词是我发明的）可以量化，单纯从法制的角度而言，美国或许可以定为95度，西欧则是85度。我国

将来能达到 70~75 度也就可以了。那么什么样标志出现,就算达到起码的及格线呢?那就是新闻实行法治。没有法治,只有人治,新闻自由度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会是不及格。新闻实行法治,就先要从新闻立法做起。不解决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我们永远只能在二三十度徘徊,我国新闻想在世界上赢得公信力,那只是自说自话,是没有可能的。

美国、西欧高度的新闻自由对于这些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与集权的新闻制度相比表现出很大的优越性。但弊病也不少。比如,在对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上推波助澜,美国媒体很少有反战的声音发出。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初,有的大报不断预测哪几个大公司要破产,弄得更加人心惶惶。在更大范围讲,西方的新闻自由与多党政治、民粹民主交互为用,使政府依赖指数不断升高,以致有些国家债台高筑,影响国家进一步发展。我国需要新闻自由,但要适度,有所节制。我相信,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也会创造出新的新闻文明,即理性的、适度的新闻自由。

为此,先要承认新闻自由有普世价值,只是实现形式有所不同。其实美国与欧洲都是有所不同。比如美国官员告媒体诽谤,除证明报道的事实虚假以外,还必须拿出证据证明媒体或记者确有恶意,才能打赢官司。这样,几十年也看不到一个美国官员能打赢诽谤官司。欧洲则无此规定。仅此一条就说明,美国的新闻自由度比欧洲高。有所不同,意味着大体相同,我国要承认新闻自由的普遍性原则和做法。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这个出版中就包含着新闻。《世界宪法全书》中的各国宪法都是这样规定出版自由的。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是每个中国人都有的,并不是“文革”流行的解释,只有无产阶级才有。这种解释最后导致全中国只有一个人有言论自由,那就是无产阶级的最高代表。

四、怎样从新闻的角度看待苏联、东欧剧变?

苏共是被自己长期积累的错误和腐败打倒

的,不是某一个领导人的问题。

苏联新闻方面的教训是双重的,就是从长期极度压抑到突然完全放开。不能只谈后者不提前者,而前者才是根本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封闭了除《真理报》以外的所有报纸,同时发布了由列宁签署的出版法令,该法律许诺:“一旦新制度确立起来,对报刊的各种行政干预就必须停止。而将依照最开明与最进步的法律,并在对法庭负责的范围对出版实行充分的自由。”可是,这个法令并没有兑现,反倒大批新闻自由。随后的 70 年里苏联一直没有进行新闻立法。苏联在连续实行 5 年的公开性以后,为了挽救危局,也不得不进行新闻立法,但已经错过时机,头年公布大众媒介法,第二年苏联就解体了。如果列宁兑现自己的承诺,如果没有斯大林的个人专制和集权,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急于求成……苏联很可能仍然存在。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那些不讲民主自由的政权,丧失了对人民的吸引力,所以在没有戈尔巴乔夫的东欧国家,也一样被人民抛弃。现在有些人谈到苏联新闻变革的教训,只说苏联是因为没有继续严格控制新闻媒介,造成传媒失控、苏联解体,而不谈苏联七十年不努力改革高度集权的新闻制度,这种制度遭人民唾弃是迟早要发生的事。苏联东欧新闻自由发展历程有三点启示:一是新闻专制不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政权的特征;二是坚持公开性、坚持人民的知情权,适度、渐进地发展新闻自由是必须的;三是必须通过立法保障新闻自由。

五、为什么文化立法 27 年一直缺乏重大进展?

从 1984 年筹备新闻立法到现在已有 27 年了。我国原打算要搞的新闻法、出版法、广播电视法、电影法,一个都没有搞出来。究其原因:

(一)没有深刻认识到立法的意义,没有看到扩大民主、自由,是人民的强烈愿望,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执政党永葆活力的需要。要不要新闻出版立法,绝不是哪一种驭民之术更好的问题。陈云的说法不一定妥当,更不一定永久适用。他曾经说过:“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

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实际上,自袁世凯政府倒台到国民政府上台,其间并没有出版法,传媒放纵到无法无天,国家社会混乱不堪。国民政府《出版法》颁布,有不得“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等等一系列的规定,如果不是因为当时国家混乱,政治腐败,政府不能完全控制局势,是很难有空子可钻的。再说,从组织原则来看,抓紧制定新闻出版法,是载入党的十三大报告的,是全党的决定。邓小平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不能改。陈云一向尊重党的决定和党的组织原则,有关部门也没有权力不执行全党的决定,只听某个人的一时意见。

(二)把暂时起作用而副作用极大的方法当做长治久安之计。

我们有两个口号是有问题的,在实践中更是让它走向极端。

一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以正面宣传为主”。这个口号从字面上看好像没有问题,但我们的媒介批评历来就少得可怜,1989年急忙提出这个口号,其实际作用就是减少舆论监督。新闻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市场经济下经济利益多样化,经济行为复杂化,容易产生贪污、腐败,本来就必须加强舆论监督。可我们错误总结教训,大搞“正面宣传”。尉健行在2002年人大会议期间说,“近几年查办的大案要案,大多数发生在1993年至1997年之间,1998年以后作案的逐步减少。”我认为,这与1992年宣布搞市场经济以后,舆论监督反而被大量削减有很大关系。1998年朱镕基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强调舆论监督,以后情况稍好一些。

二是稳定压倒一切。从辩证法、系统论的观点,任何事物只能有它自己合理存在的地位,不能因为一种事物重要,压倒其他一切事物。在新闻实践中,报纸揭露本地区的腐败被视为不利于稳定。让稳定压倒一切,就变成让稳定压倒了公平、正义。每个省、市都力图避免媒体暴露自己的矛盾和问题。2005年还取消了跨地区的舆论监督。其结果是,一边是腐败在蔓延,一边是揭露腐败的舆论监督在收缩。



由新闻出版署领头成立的新闻法起草小组拟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征求意见稿)》(1989年初)

(三)只搞条例不搞法。条例只是行政管理,立法恰恰是减少行政干预。法律是保护新闻自由和防止滥用新闻自由两方面的条文的结合,总的保障新闻自由。马克思说:“新闻出版法就是对新闻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没有关于新闻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领域中取消新闻出版自由,因为法律上所承认的东西在一个国家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

立法不去搞了,1997年我们搞了几个条例。但条例几乎是不起作用的。报纸禁载规定拟得很好,本来应该是“法无禁止即自由”,可有关部门给媒体下达禁载的指令,大大越过有关条例规定的禁载范围,大量不违背禁载规定的报道照样被封杀,甚至根本不需要解释理由。这意味着,有关部门没有遵守条例。据某新闻集团粗略统计,2007年一年接到各种指令、招呼3700多条,平均每天10条以上。这样,条例就没有威信了,因为它们起不了作用。

以高铁事故报道风波为例。去年7月28日,

温家宝举行中外记者会,保证在调查过程中公开透明、接受监督。可第二日即29日晚媒体却接到一个权威部门的禁令:“鉴于‘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境内外舆情趋于复杂,各地方媒体包括子报子刊及所属新闻网站对事故相关报导要迅速降温,除正面报导和权威部门发布的动态消息外,不再做任何报导,不发任何评论。”这些禁令不要说与温总理刚说的话相矛盾,就是与国家有关法令、法规也相抵触。《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统一、准确、及时发布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和应急处置工作的信息。”“及时向社会发布有关采取特定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危害的建议、劝告。”“迟报、谎报、瞒报、漏报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或者通报、报送、公布虚假信息,造成后果的”要承担法律责任。《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规定》规定:“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要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随后发布初步核实情况、政府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并根据事件处置情况做好后续发布工作。”那么,上述那些禁令是否贯彻了这些法律、法规?在人人是记者和评论员的微博时代,上述那些禁令是否有效呢?这些禁令最终只会使传统媒体更加边缘化。所以不能只顾及眼前的利益、局部的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整体利益。这个长远利益就是我国媒体的公信力、对人民知情权的尊重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这个整体利益就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国家形象和国家软实力。

六、怎样评价我国新闻立法停顿引起的后果?

中国当今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所有重要问题,都与不搞新闻立法、延误新闻改革有关。我举三个例子:

(一)腐败不断加剧,怨声载道,是怎么来的?同样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途中,美国当年有媒体开展的“扒粪运动”,我们却在那里大搞“正面宣传”,从1987年—2010年被绳之以法的120名省部级高官,没有一个是媒体从发现蛛丝马迹开始,步步深入揭发出来的。我国新闻体制是本

地无法揭发本地贪官,又因为禁止跨地区监督,不准媒体揭发外地贪官。这等于是创造了令贪官放心的舆论氛围。

(二)我国贫富悬殊越拉越大。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28上升到目前的0.48(欧洲与日本在0.24~0.36左右)。而且,1%的人口掌握了41.4%财富,财富集中度畸高。招商银行联合贝恩管理顾问公司对外发布的报告显示,相当于中国总人口0.2%的人,持有相当于全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20万亿元的近一半资金。不让媒体向决策层及时输送贫富悬殊的信息,不利于国家微调税收和分配政策;不让媒体向全社会输送这方面的情况和意见,就不能形成缩小基尼系数的社会动力。

(三)许多全局性的问题由来已久,这两年爆发性地呈现在社会公众面前,是怎么回事?政治体制改革进展迟缓,其理由还可有一说,但是像领导干部及其配偶财产公开、党政机关“三公问题”、各地普遍建政府大厦、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收入差距太大、药品流通环节问题多导致药费奇贵等问题,群众议论纷纷,解决起来并不像政治体制改革那样牵一发而动全身,但传媒也是无所作为,并不是他们不敏感,视而不见。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借口下面,传媒偶尔触及皮毛,都要冒很大风险。以至于有某特大城市下令传媒不得讨论孩子上幼儿园难、上小学难,以及大量居民被狗咬伤,怎样处理人与狗的关系的问题,传媒也只好遵命。我们过去总是认为,要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媒体要配合,不挑开引起不安定的矛盾,安心“把蛋糕做大”。结果让以上几方面的问题不断积累,堆积如山,结果造成更加严重的不安定因素。这些年随着网络技术的新发展和社会公众参政议政勇气的增强,矛盾不断爆发,群体性事件大量增加,以至于一些为政者不知从何抓起了。近一二十年实践证明,媒体应该不断揭露问题,为化解矛盾献计献策,并提供社会舆论作为动力。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困难和问题,为政者和新闻宣传管理者不能搞政治上的短期行为,回避矛盾,把困难留给后任,因为越往后拖,解决问题越要付出大得多的成本。

(四)“文革”回潮是怎么来的?无论反右、大

跃进和大饥荒,还是“文革”,都早已过了档案保密期了,可是我们几十年如一日,很少让出版社出版披露这些巨大灾难和严重错误的著作。这是导致现在出现“文革”回潮、称赞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增加了一股新的阻力。

以上这些问题的产生,都与我国没有通过新闻立法,提高新闻出版自由度有很大关系。世界的历史和现实中有很多的例子反复证明,没有新闻自由,任何政党都可能被自己的错误或腐败所打倒。那些持不搞新闻法治就能保持社会稳定的看法的人,应该梦醒了。

七、更新新闻观念,抓紧新闻立法

(一)在党政干部中进行科学的新闻观的教育,即新闻自由与法治的教育,促进新闻观念的更新。不要再搞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真斯大林主义新闻观的教育。我认为至少要让党校担当起这项工作。

要教育各级官员懂得,如果过不好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关,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牢固地确立。只有让执政党和政府逐步适应在较高的新闻自由度的条件下工作,人民逐步学会在新闻自由条件下择善而从,规范自己的行为,国家才能真正长治久安。可我们现在许多的官员都愿意享受高度集权的新闻出版制度带来的暂时的稳定,不管以后会是什么样,任上乐当太平官,任后不管洪水滔天。这是政治上的短期行为。

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在人人有手机,人人都是传播者的今天,不要幻想靠压制传统媒体报道使任何突发事件被忽略过去。打取消微博的主意,更会使我们在广大青年中孤立,因为微博已经成了他们的“最爱”。

要使各级领导认识到,报坏消息好作用大,只报好消息坏作用大。当今世界上,新闻自由度高的国家,其媒介的公信力就高,国家的软实力就强。媒体虽然报道了许多负面事物,但在国内的影响力和在国际上对于塑造国家形象方面,发挥了很大的正面作用。而我国媒体在国家权力面前太乖了,政府哪个部门不想报的新闻,它们都不报,可以说,它们采写的民众爱看的重要新闻

稿,撤掉的比用上去的多得多,结果媒体在人民中丧失了公信力,对外更削弱了国家的软实力。

要让各级领导做到,新闻报道只要不违背禁载规定基本上就不去干预。要像相信农民会种地,工人会做工一样,相信新闻工作者会办报、办广播电视。即使在特别情况下需要干预,也尽量与新闻工作者商量。

(二)我们为立法已经耽误了27年,不能再错过时机。

苏联共产党一直没有兑现建国初期的承诺,“依照最开明与最进步的法律……对出版实行充分的自由”。种种原因使得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对于这种高度集权的新闻体制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党和国家领导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谁也不肯尝试兑现共产党执政初期向人民所做的承诺。这种依赖性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一是由于没有社会公众意见的充分参与,党和国家决策频频发生巨大失误,特别是严重错误的后果由于不肯及时揭露,积累起来以后,执政者担心新闻自由度一提高,会被全面暴露,而导致社会能量大爆发,造成政局和社会的不稳定。

二是社会主义国家总是以政党和官员的清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证明其政治的合法性,所以通常不肯揭露官员的严重腐败。但是由于长期不揭露,敢于搞腐败的就越来越多,执政者更加担心由法律保证媒介自由无阻地揭露腐败,可能导致各级执政团队溃不成军,历史上执政的官员也会丑闻毕露,直接挑战执政的合法性。

这两点足以说明,越早制定新闻法,革除人治的弊病,保证适度的新闻自由,不使错误后果积累,不使腐败丑闻积累,对于社会矛盾消解,积怨及时释放,对于维护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和政权的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所以,我认为新闻立法没有所谓条件完全成熟的时候,只有错过时机的问题。错过改革和立法最佳时机的例子,在中外历史上不难找到。

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同时对民主自由发展太慢已经不耐烦了,这是通过新闻立法,扩大新闻自由的刻不容缓的时机。如果这时不做这样重要的事,依旧一味享受高度集权的新闻体制带来的

暂时稳定,那只能是“透支稳定”,把治理的困难留给后任和未来。这种政治上的短期行为将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

八、对于新闻法若干主要条文的设想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就起草了新闻法草案,并且改了几次。现在看来还有很多不足,特别是许多地方比较原则,可操作性不强,法律责任一章有待细化。应该本着与时俱进的态度加以修改。还应该适当参考俄罗斯大众媒介法、越南新闻法等。我在下面就几种有关权利的条文的拟定,提出修改的设想。

新闻法中规定的新闻自由权,要具体化为采访权、报道权、批评建议权、创办报刊权,并提出可操作性措施。这样才能解决那种对自由只做哲学式的解释,业者无法操作,法官难以判决的现象。

就采访报道权而言,政党、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社会团体、公共企事业单位均有接受媒体采访、提供信息的义务。上述组织如认为相关信息不得公开或拒绝提供,应按提出采访请求的媒体主编的要求,在三日之内以书面形式向该媒体解释说明。上述组织拒不提供解释,或新闻媒体如果认为理由不正当,可以依法向新闻评议会提出申诉或向法院提起诉讼。

就批评建议权而言,公民、新闻工作者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对法律法规、公共政策的制定、修改和执行发表建设性的意见。但所发表意见不得反对或背离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公民、新闻工作者有通过新闻媒体对政府机构、政党、政府工作人员、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发表意见、提出建议、进行批评的权利。

但对各级党政领导人的批评,由国家新闻管理部门根据渐进发展原则,制定实施细则。国家领导人的名誉不受损害。新闻媒体所发表的意见、批评等,不需要经过新闻机构以外的组织或个人的批准。

对创办报纸的规定。原草案采取不提报纸创办、改由出版法规定的办法,这影响了新闻法的规范性与完整性。需要加上创办报纸的规定。从原则上看,法律要保证公民办报的自由权利,至

少要做到所有百万以上的城市都有1~3家民办报纸。但考虑到现实国情,要采取渐进发展的步骤。作为第一部新闻法,应规定,在现有报纸中,除了执政党的中央和省市党委机关报纸以外,所有报纸都应改为国有而具备民办形式的公共报纸。其特点是:具有法人资格,无主管单位,非营利性,自主经营运作。创办时由国家提供地址、房产和必要的设备,同时接受社会团体、企业、个人、基金会等捐资助办。公共报纸接受国务院新闻管理部门的管理和新闻评议会的监督,其编辑部负责人由新闻评议会在申请者中评选产生。公共报纸由主办单位和出版单位独立负责,切实实行社长、总编辑负责制。

创办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评议会。发达国家是杜绝行政干预报纸的,实行司法加自律的办法。在司法与自律这二者中间,空档很大,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不很适应的。印度新闻理事会在维护新闻自由与新闻伦理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其运作在世界上是比较成功的,建议借鉴印度新闻理事会的做法和经验。我国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中国化,新闻评议会委员由党政管理机关、社会各界、新闻界各占三分之一组成。其日常最多的工作是,评议新闻纠纷和报道内容,其次是评议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对新闻法和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遵守情况。

侵权责任要作更具体的规定,让压制新闻自由权利和滥用新闻自由权利这两方面的违法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真正使法律救济到位。《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对这方面的规定可供参考,压制正当的新闻自由,要受行政处分、经济处罚,甚至要负刑事责任。■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原所长)

(责任编辑 黄钟)

本刊声明

为保护本刊和作者权益,凡转载本刊文章,请注明“转自《炎黄春秋》”。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我感知的启蒙、新启蒙、再启蒙

○ 穆广仁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没有认真读过多少理论书,不是学者,甚至到耄耋之年也还算不上是个明白人,对于启蒙这个概念至今还是模糊不清的。而且,学者们对启蒙和新启蒙的理念本身,也有不同的解析和争议。因此,我没有资格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评述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我只能通过个人的经历,来理解不同阶段启蒙运动的发展过程。

抗日战争爆发,已经是启科学与民主之蒙的五四运动之后18个年头了。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已经产生了鲁迅、胡适等一大批启蒙运动的先驱和大师。当我还是中学生的时代,最先读到的是鲁迅、巴金、曹禺等人的文学作品,只不过是在朦胧中接受了些反帝反封建的初步启蒙。当时,我确实是像刚刚从愚昧中初醒来一样,啊,几千年的历史原来是一部人吃人的历史!一百年来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都还像阿Q一样的无知和无助!幼小的心灵被震撼了,暗暗想要做一个“初醒者”,去唤醒尚在睡梦中的人的人。懵懵懂懂之中,萌发了寻求救国富民之路的遐想。求知的渴望促使我读更多的书。就读高中时,学校里已经有了社会科学读书会、文艺读书会,有机会读到从中国作家到俄国作家,从文学作品到社会科学小册子。于是,在朦胧中逐渐接近了(还不是“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启蒙,也就是某些学者称之为“新启蒙”的影响。

当我还处于这种朦胧的、低级的启蒙时,一些先驱们早已接受并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形成了无可抗拒的社会思潮。这大约就是学者们对“新启蒙”的解读。幼稚的青年学子参加抗日救亡和反对独裁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目标是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出于这种强烈愿望,逐渐向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共产党靠拢。这种靠拢在当时

几乎是无可选择的,最终还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当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所显示的目标(最低纲领),和青年知识分子的追求基本是相符的、吻合的。其中既有抗日救亡的民族主义,也有反对专制的民主主义,流行的说法是“反帝反封建”。年轻的我们做出这个选择时,似乎谁也没有注意到“新民主主义”当中的“新”字的含义。到了晚年,特别是经朱厚泽对新民主主义作了解读之后,才略有些明白。毛泽东把这个“新”规定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以区别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来的“旧”民主主义,或称之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当年我们非常情往地关注《论联合政府》中所倡导的“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它将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却忽略了《新民主主义论》中“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的论断,以及要建立“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预示。到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明言“独裁”了,要用军队、警察、法庭等一切国家机器对反动派实行毫不仁慈的专政。现在重读毛选这些文章,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新民主主义”的“新”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的序曲。一些学者们认为,五四以来崇尚科学与自由民主的启蒙运动,在抗战期间有所转向,或者说变了味,嗅出了“专制”之味,于是,把启蒙运动加上了个“新”字。看来,这两个“新”是有逻辑上的联系的。可是,我们当年完全没有把无产阶级“领导”和“专政”挂钩,更没有把二者画上等号。因为我们当时反对的正是蒋介石的一党专政,全然没有想到另一种更为严酷的可能。

作为在国统区参加中共的地下党及其领导的秘密进步组织,在革命处于严酷的条件下,也

有组织纪律,如保守组织秘密等,否则就不能生存,个人会遭逮捕杀头、组织会遭破坏。但是,正因为面临国民党独裁专政的严酷,他们丝毫没有放弃,而且更加强化了争取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信念。我们也接触到一些共产党员(南方局青年组的同志),他们是可亲可敬的朋友、老师,他们有引导,有规劝,但不是强迫命令我们做什么。他们把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传统视为青年运动的根本。因此,我们虽然参加了党,而思想上仍自感是独立的、自由的,并不曾有被当作“驯服工具”的感受。在我们那一代青年人的意识里,抗战并没有压倒启蒙,而是五四以来所开启的启蒙运动的扩大和强化。近来我阅读了《何方自述》中对几个重大问题的认识的论述,很受启发,非常赞同何老的论点:“救亡不仅没有压倒启蒙,而且救亡本身就包含着启蒙,甚至可以说救亡就是启蒙。”他以他自己的经历说明,“正是在救亡中接受启蒙,在启蒙中参加救亡,两者相辅相成,没有一个谁压倒谁的问题。”

我以为,在国统区从事革命的一代青年(他们因接受以重庆红岩村为驻地的南方局的引导而被称之为“红岩儿女”或“红岩一代”),与“一二·九”运动后奔向延安的一代革命青年,两者有着抗日救国、追求民主自由的共同性。但两者也是有些区别的。奔赴延安的青年先一步被灌输了些马列主义,并经过整风运动、审干抢救运动的洗礼,许多人被迫或自愿地成为听话的“驯服工具”。而国统区的进步青年则较多地保留了对自由民主的执著,更多带有国统区中国知识阶层的气质,即被指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的那些东西。这大概和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在国统区不搞整风运动的指示有重要关系。因此,在抗日救亡运动和反对国民党独裁专政的斗争中,他们自以为仍在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而未曾因“新启蒙”的影响而被遏制、被压倒。这也正是解放后毛泽东首先对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地下党进行整顿的缘故。整顿地下党依据的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16字方针,当然,这16字方针不只是对地下党,而是对一切具有独立思考、崇尚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实行专政的一个大战略。

可悲的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这些没

有经历延安整风的人,在思想改造和其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也接受了类似延安整风运动的洗礼,也被灌输了马列斯毛一系列的论述(以完成“学习任务”的方式,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等几本书),虽然比较晚了些时候,总算是一种“补课”吧。在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大潮中和政治运动的威慑下,也承受了奔赴延安那一代人同样的命运,频频作“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的自我检讨,而成为“驯服工具”。于是,同样承受了人生中一段痛苦的“迷误”,一种从启蒙倒转为愚昧的迷误。也许这是他们对“新启蒙”所预想不到的体验吧。

顺带说一下,由于他们的“稍晚一些时候”,其命运却有稍稍不同于“稍早一些时候”革命者之处。在解放大军接管原国统区之际,随大军南下的某些“早些时候的革命者”,或多或少带有“解放者”的态势,而地下党则以“被解放者”之身兴高采烈地迎了解放。但是,这些区别是短暂的、微不足道的。毛泽东并不因为青年知识分子接受过延安洗礼而对之有些许宽厚和仁慈,他们在随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纷纷被逐步淘汰。可以说,对冠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专政,也即被当作社会主义革命对象的知识分子的专政,无论是早是晚,都是一视同仁的。

“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以后,度过浩劫的知识分子在一批老共产党员的引领下,对个人的和时代的悲剧、对中国革命、中共的历史进行了大量的总结和反思。从延安的整风运动到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造成了几乎是全民的愚昧;文化大革命则达到了愚昧的顶峰,许多有良知者为坚持真理、说真话,甚至只是不愿说假话,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这个民族多么急切地需要摆脱愚昧啊!愚昧使许多共产党人成为没有思考力的驯服工具,使人性遭到扭曲,使千万人生灵涂炭。许多识者已经呼吁要来一次“再启蒙”。有人呼唤“回归五四”。事实上,这些浩瀚的反思大潮已经构成了当代伟大的再启蒙涌动。如果把五四归结为“科学和民主”,今天的“再启蒙”总的说没有离开科学与民主这个核心,然而今天的再启蒙已经大大丰富了五四,超越了五四。这个再启蒙的涌动是对愚昧的伟大逆反,它不仅受世界性民主潮流的鼓励,而且受现代科学成就

五十年代初毛刘之争的一个解读

○ 高王凌



刘少奇

《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一期)发表了林蕴晖先生的大作《1950年代初关于是否允许农民劳动发财的争论》,林先生把那些故事娓娓道来,使我们复有置身其间之感。这些当时发生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争论,不仅涉及所谓“劳动致富”,也不仅限于“农村问题”。我以为,它们正是解答“革命转变”(或曰“放弃新民主主义”)这一个重大问题所不能回避的。其中,在解读毛泽东

的想法时,林先生引用了杜润生的一段回忆。这段内容特别关键,却一向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这一段话未受到足够重视的原因很多,一是《杜润生自述》发表得晚一些(2005年,人民出版社)二是有关段落存在若干删节。我因帮助杜润生做过一些文字工作,对“内情”有所了解,手里也保留有一部“原稿”,因此能斗胆转述如下(文字略有删节,对比参阅《杜润生自述》31页前后)。

1953年1月与毛泽东会面,从中南海出来后,在汽车上杜润生与邓子恢有一段对话,杜润生说:

我的看法是,山西提出试办合作社是可以的。他们说动摇私有制,客观上也有可能,这一点,山西省委已做了说明,不过全中国那么大的社会,办几个合作社也起不了那么大作用;第二,农村两极分化……在现有条件下,还没有到来……把农村分化描述得太厉害,不合实际。少奇同志对山西试验合作社说是空想社会主义,也未免提得太高。他是主张先工业化而后有农业生产社会化的。

的互联网的驱动。它已经把老中青几代人吸纳进去,势不可当。当然,在不同年龄、不同群体中有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认知。至少,下面这些启蒙是受到广泛关注的:

1. 启对斯大林理论之蒙:包括暴力革命、消灭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专政等等理论。

2. 启个人迷信之蒙:把神明还原为人。

3. 启被扭曲的党史之蒙:将真实的党史、革命史奉献给中国人民。

4. 启中国神话之蒙:从中国模式领先世界,中国第一,“风景这边独好”之类的自诩、片面的宣传中醒悟,实事求是地估计国力的增长、百姓

生活的变化等等。

需要再启蒙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许多有识之士指出,一个生活在谎言和蒙蔽之中的民族,一个愚昧的民族,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中国迫切需要觉醒,新的觉醒。

最后,我用谢韬老人2006年3月16日写给我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作为此文的结束:“我们这一代人,有共同的经历,有共同的迷误,有共同的乌托邦,也有共同的觉醒和反思。问题是我们都老了,怎样把这些留给下一代,避免再走弯路,这是我们所尽的最后一点责任。”■

(作者为新华社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黄钟)

我还说，这些都是次要问题，最重要的是毛主席说的手工业工场。毛的意见是先改变所有制，然后发展生产。针对的是刘少奇的先有机械化然后才有集体化的思想。我的意见是：工业和农业不一样，工业从个体手工业变成手工工场，可以搞流水作业，因为工业有个厂房，有块土地，就可把大家聚集在一块生产。农业在广大的土地上生产，土地是分散的，不可能把太阳集聚在一块土地上，对劳动者也不能直接监督管理。如果土地收益多少和农民利益关联很薄弱，农民不自觉，就会磨洋工，造成减产。农业还有个季节性，有的农活要靠众人动



毛泽东与刘少奇

手抢季节，哪个农民也不能只会锄地，不会收割，不能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上分工，不能你锄草，我闲着。都得学会全套农活，没有那种流水作业。

记得我讲了这些话后，邓老让我写个报告。此后和陈伯达说起此事，那时候陈伯达是毛泽东的大秘书，帮他读原著，发现西方的工业化之前，有一个“工场手工业”的阶段。他说，手工工场是马克思说的，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毛主席所以强调办手工合作社，是可以不等工业化、机械化，不等外国援助，自力更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他还说，马克思主张“组织农业生产大军”。我说：这不是“劳动营”了么？他觉得我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教导，不尊重马克思，反对毛主席。当下他很不高兴。

在人民出版社的版本里，“劳动营”一句，是见不到了。

1998年在广东西樵通稿的时候，杜润生已经预见到“劳动营”可能难于发表，打算主动删去这几个字。我觉得它太重要了，是画龙点睛之笔。杜润生遂对我说，将来你找机会把它补上吧！现在，我可以告慰他老人家说，这件事已经办了。

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分歧所在。杜润生的这段话非常重要，是他思想的精华。弄明白这一思想，就可以解释中国集体化历史里，几乎所有那些重大的问题了。这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农业工作不好监督，监督再好，劳动者一样可

以有“反行为”（杜润生所说农民磨洋工，以及工人控制劳动进度、产出残次品等，皆是），而且比较起来，工厂更甚。

谈“革命转变”问题，不能不联系国际因素，联系其中重要的一环——“一边倒”，还有之前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战略转变。这些并不能理解为纯客观的，它有主观性的一面，它们又不是纯被动的，而有主动性的一面。此后直到抗美援朝，都有中共主动的、从自身考虑出发的因素，这正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

毛似乎也尝到了“甜头”。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少人发现，他似乎也是越来越“左”，越来越“教条”，越来越“斯大林化”了。现在看来，不止如此，在毛泽东的心里，还有一套东西，在内心里感到“骄傲”的，这就是陈伯达所说的农业方面的“劳动产业军”。它在苏联也未曾实行，如果能够在中 国实验成功，岂不就可以超过苏联，而回到马克思了？

“农业产业军”的典型表现，就是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为此，1958年底毛泽东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特别加写了一段话，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建立“农业产业军”。显然，这正是毛在中国农村集体化问题上一以贯之的一个重大想法。

什么是“农业产业军”呢？这在经典著作中很少进一步的解释。在《共产党宣言》里也仅仅说：革命成功以后，“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

下面的措施：……(第八)实行普遍的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一个“产业军”,一个“信口而来”的“劳动营”,岂不是一副“绝对儿”?好好琢磨琢磨这“针锋相对”的两句话吧,它指的正是同一件事,恰是解开“谜底”的一把钥匙。尽管杜润生当时并未想得太多,可是在我看来,这才是他思想中精华的精华,特别值得重视。

也许,今天我们就可以说,1950年代初,毛泽东想的就是如何组织农业的“产业军”了,——我们曾经一再表示,毛这时考虑的并不是“经济”,而是“革命”,——所以他不能同意刘少奇的想法,如等待多少多少年,或具有什么条件以后,再进行集体化,更不要等到哪天“两极分化”以后,再重新组织队伍,发起反对“新富农”的斗争。他要的是,遵照《共产党宣言》的教导,当下,就“提前一步”,把“农业产业军”先“组织起来”。

“提前动手”,是当年我们在杜润生领导的研究小组,读这段史料时的最大感受。比如,东北问题出现在1950年,山西是1951年,这时候全国的土地改革才刚刚开始,怎么就要“集体化”了呢?

不止如此,我的另一个感觉是,一旦开始动手,所有的东西都会触动,哪怕只是一点点(如杜润生所说山西的试办),就会形成一种新的“不三不四”的局面,原有的新民主主义那套就“保不住”了,比如“私有产权”、“雇工”、“劳动致富”等等。最终问题就出现了:“新民主主义还要不要”?

而且,一旦“提前”,就一定会“加速度”。

秦兆阳在他的小说《在田野上前进》中,就写出了合作化运动要么不做,要做则必然加速度的道理。在一个产权大变动的时代,旧有的已经推翻,新制度尚未建立,一个为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标尺已不存在。这种过渡期中“不三不四”的状况,正是合作化运动中最难措手之处。也正是因此,小说作者主张合作化应加快进行,“越快越好”,早日达到高级社才“更简便,更痛快”。

但问题还不止这些。如果没有“提前动手”,如像刘少奇所主张的那样,过多少年以后再开始集体化,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也不一定。看看沈志华《历史的启示》中所述,苏联集体化以前那多次的“供求危机”吧!同类危机在中国也同样

存在,如1953年的“统购统销”,即是其一。这不一定是农业集体化所带来的,它有其自身的规律。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些在“实际工作”中不可避免要遇到的问题,而不能只是读书本子。

因此,我们可以说,当时的体制,从政治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到经济上的“统制经济”趋势,跟“新民主主义”之间,实有一种内在的矛盾,这种矛盾早晚要暴露出来。它是躲不掉的,二者之间必然要一步步发生冲突,不管你能否料及和未雨绸缪。最终,矛盾冲突达到一个点,新民主主义就可以“告终”,它的“任务”就算完成,于是也就可以宣布新民主主义的“放弃”,以及“革命转变”的完成。

这一切,都发生在1953年。

当然,这也涉及共产党人的行为模式等等问题,不了解这一点,许多问题还说不清。

最后我要说的,是学界有一种倾向,好像非要给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争论评断出个“是非”似的。我觉得,那里不一定有什么“谁对谁错”。真理,也可能须到那以外去寻找。

历史学,不是为了寻求什么“标准答案”、“正确路线”。历史学的功用,不在那里。我们的任务只是恰当地解读那些“当事人”、“决策者”的思想,以求进一步解读那个时代和那些问题。

当然,这里只是一种解读,或许,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角度来检视这一段历史,如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及不断革命论的影响,等等。■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 黄 钟)

启 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往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 崔秀岭 手机:13611159388

电话(传真)010-60342528

汇款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

102488 信箱 3 分箱

收款人 崔秀岭 邮编:102488

王元化：对启蒙思想的反思

○ 吴琦幸

在王元化的一生中有三次重要的反思，其中以第三次反思最为重要。王元化本人也对此有不少笔述。2007年7月，王元化先生因病住上海瑞金医院，身体逐渐衰弱，虽然周围的亲人医生都没有告诉他实际病情，但他已经感觉到此次的病情不容乐观。遂约我有时间多去病榻前，跟他谈谈学术人生。一开始只是闲聊，后来先生希望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访谈录，将来成为一本谈话录的专书。于是我带着录音机，开始了正式的录音访谈。前后约有十多天，话题围绕着他的一生遭遇、对人生和人的认识、治学经历、三次反思及对当前学术学风的想法。与他往常的访谈不一样，情绪和精神都比较放松，内容丰富，为学界提供了难得的史料和真实的思想。其中尤以他自己集中谈论他的第三次反思的内容和思想为最重要，与他此前的论述相比，这次更加集中，更加犀利，更加坦率。到他2008年5月9日去世，他再也无力做如此集中深刻的长篇谈话了。有感于先生逝后的寂寞和学术的清冷，特整理出访谈记录，以志受业22年之恩。此处仅刊登一小部分。先生对自己的谈话录素有亲手订正之习惯。今全稿整理毕，惜无法再由先生过目手正，如有谬误，责任在我。

记于2011年11月30日

吴琦幸(以下简称吴)：您的一生有过三次重要的反思。这三次反思发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可不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三次反思在您的三次反思中是最重要的一次？

王元化(以下简称王)：那当然了。

吴：我觉得执政党，从一开始用马列主义走武装斗争的道路，用暴力革命来夺取政权，体现了左的较为激进的思想。您认为这个思想是不是贯穿到了今天？

王：我的第三次反思主要不是这个，我谈的呢，就是整个的这个启蒙思想，到了后来启蒙思想形成的一种倾向。我主要讲这个启蒙运动，使人类脱离了中世纪，人们觉醒了，相信人的力量，相信理性的力量，这都是很好的。但是呢，没有这个东西，人还不能从中世纪慢慢走出来。我觉得马克思恩格斯都是那个时代受了启蒙思想严重的影响，这个里边缺陷有点什么呢？就是过分相信理性的力量，过分相信人的力量，缺乏一种怀疑精神。

吴：认为人能够做到一切。

王：这个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导言》里面就说到的，就批评了，他用了一个古希腊语啦，翻译出来就是“不可知论”。他认为人的认识当然是相对的，在无穷世界里继续下去就可以继续接近真理，他有这种信念。所以对怀疑主义的思想啊，他比较讨厌，否定的。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人的认识，人的力量，人的理性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应该讲讲我自己的例子。我在1955年隔离的时候，我开始阅读黑格尔的东西。其中读到黑格尔的开讲辞，他第一次讲座开讲的时候所做的报告。他不是像我们大学教授啦，是皇帝请他来做这个，那是非常荣誉的一个讲座。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正是彷徨无知，信仰的危机，思想的危机这样一个时代，读了他的开讲辞，使我恢复了我的一些信念，信仰。他就是谈到了人类的知识，信仰，就这么一段话，我的书里面有的，我就不重复了。

吴：有的，精神力量的伟大。

王：那段话对我的影响极大，就是在这以后呢，我就是非常相信人的认识，无远弗届，都是可以达到的。因为我当时有一个进化的观念，我认为人类永远都是朝进步的道路走，这又是马恩最

重要的理论思想，所以人类的前途是非常辉煌，非常光明的。

吴：这也就是鲁迅所信仰的啊，当时很多五四人物都信仰社会达尔文主义，当时所提倡的进化论，年轻的总是比老的要好，新的总是比旧的好。

王：这个思想就是到了1990年的时候我还坚持。尤其到近代的量子力学，它有测不定原理啦，开始怀疑了，宇宙里面是不是都是那样子有规律的？毛泽东在50年代就说了，理论的一个任务主要就是发现规律。不过我们认真地总结一下，我们发现了多少规律？从他这个耗掉无数人而朝着这方面的努力，最后究竟发现了规律没有？

吴：自以为发现了，搞理论的人自以为发现了规律。

王：我看也不一定有这样的自信吧。

吴：比如说对立统一，斗争，矛盾，转化，他们觉得这些都是规律啊！

王：这是矛盾，但是说这些都是规律，大家就不得不跟着说了，有时候也是违心的。好像那时候，我也一直有这种信念，但是这个东西我后来慢慢就接受了。我认为我的思想主要从马克思的东西中来的，我因为很小入党嘛，那么马克思是作为我的一种信念，而且是一种信仰。到后来，我对毛有怀疑了，我看出他有很大破绽了。对这个，在列宁的思想中我看出也有很大破绽了，对马恩我没看出来。那么第三次反思呢，我老实讲，我觉得最基本的马恩思想，他们是诞生于启蒙时代，他们的思想都有启蒙时代的背景，这个启蒙思想的一些思想家，尤其是像黑格尔这样，他认为人类总是进步的，人总是越来越往高处走的，越来越深化，越来越深入，所以马恩他们都是有这样一种思想的。但是到了20世纪之后的几年，到了20世纪下半叶不就开始有了吗，怀疑这种人的精神力量了。那时候，爱因斯坦说了一句话，说上帝不掷骰子。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爱因斯坦认为没什么偶然性的，这世界还是有规律的。爱因斯坦对这个量子力学他是抵触的，但是后来这个发展量子力学的很多理论确实比较占上风。我不是研究自然科学的，我可以说是属于还没有经过启蒙扫盲这样一个阶段。但是根据我所知道的

资料，我就知道这样一个情况。那当然不仅仅根据这个情况，我再看看我们的这个启蒙时代启蒙思想所形成的，我不是归于启蒙，而是归到激进的啦，他为什么认为他就是掌握真理，他认为你不同意我，不是反对我个人，是反对真理，所以我不是把你改造过来，像毛主席说的这种，就是把你消灭，这个好像高尔基在1939年也有过这样的想法。

吴：那您觉得这个就是启蒙思想。

王：对，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认为自己掌握的没有一种怀疑论的因素在里面，他认为人的认识可以达到、可以掌握到相对中的绝对。用列宁的话讲，实际上就是绝对的，在这个时代讲你就是绝对真理的，因此他就理直气壮的，你不服从我的，我杀了很多人，我消灭了很多人，我把你残酷地摧毁，毫不尊重你的不同意见，因为我掌握了绝对的真理，形成这样的一种局面。后来张汝伦也讲到这个问题，我很同意他，我的书里也讲到了，他跟我差不多时候，比我晚一点，我很同意他。他引用苏格拉底的一句话，“我知我所不知”。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往往缺乏这种东西，后来我补充了，说孔子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同样提出了这样一个几乎相同的命题，就是说，我有很多东西不是我能够知道的。对不对？像毛泽东就不一样，他就以为都可以知道，缺乏怀疑主义，缺乏英国哲学里面经验主义里面的怀疑精神。所以我的第三次反思主要问题在这里，不是你刚才讲的批评那些激进主义和左的问题。激进主义的根本核心是在这个问题里，当然激进主义我是批评的。

吴：像这种思想论，以为自己掌握的是绝对真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列宁都是这样，来寻找规律。

王：列宁论述唯物论和经验主义这个问题，后来写出了一本书，一本哲学书《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他把政治概念引到里面去了。哲学上有两条路线斗争。你说哲学里面有两路线斗争吧，但是这种思想在集权主义思想家里才有，在民族主义思想家才有。所谓思想界的路线斗争，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它可以并存的，有时候甚至可以互相吸取点什么东西，虽然它们在竞选时斗得很厉害，但不是一个绝对的，你死我活的。而

列宁呢,把这种路线斗争,集权主义的路线斗争,用到哲学的发展上去,说是从罗马、希腊开始,一直到现在,说都是两条路线斗争。那我就要质问,是不是任何时代,任何路线斗争总是有一个好的,一个坏的?两个都是你死我活的啦,绝对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产生出来的东西,不是对立统一的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唯物主义永远都是好的,唯心主义永远都是坏的。我们解放后,长时期使文化遭殃的就是这个东西。要证明这个作者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唯心的就是坏的,唯物的就是好的。这里弄虚作假也有,胡乱带帽子的也有,为了什么东西把唯心的变成唯物的也有,造成极大的混乱。这种情况是20年中国哲学的倒退,是对中国哲学思想的一种紧箍咒似的厄运。那么我再问你,你说马克思思想的三个来源,一个是英国的经验哲学,一个是德国的古典主义,一个是法国的空想主义。那么德国的古典哲学,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讲过,门德尔松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成一条死狗了。因此,在那时候我要站出来,公开地宣称我是黑格尔的门生。他这个就不是唯物论。他是从唯心的黑格尔里面吸取了很多东西。后来慢慢地我们才清楚了,不懂得黑格尔就不懂得《资本论》,他(注指毛泽东)就没学过,根本没看过黑格尔,对马克思的东西也懂得不多,他就在那里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可是我们一直到现在,后来苏联一直到最后都是拿这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当最高级的教科书。后来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点最荒谬的就是,认识是再现,是摹写,是反映。我有一篇文章就写了,我觉得它还不如普列汉诺夫所写的“象形文字论”,错得还要严重。因为你对任何东西,这是我说的启蒙主义思想,它可以认识绝对的真理,认识东西它可以认识得极其清楚。但是人类的认识领域是极其狭窄的,任何一个东西它微观是无穷的,你只是认识它某一个小部分,再深入下去,你就不会认识。宇宙里面你不过是小小的地球(在这上面)你认识了一些知识。但是离开了地球,你的物理学化学都没有用。人的认识是一种真实的反映论吗?我怀疑。我觉得人类认识,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这是我的最根本的一个命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启蒙学派,把他认识到的就认为是一个绝对真理,他认为就是他掌握



王元化为本文作者展示其书法长卷

了。他一旦掌握了绝对真理,他就非常大胆和独断,因为他不是为了个人的一个东西,他是为了真理,做出很残暴的事情。这是我的第三次反思的核心。这是我心里想的,我跟你讲得比较透彻一点,就是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清。

吴:我听得清楚。第三次反思是重在对于启蒙思想的反思,是整个认识论的反思。

王:这些看法断断续续在我文章里面有,你再仔细参考一下。

吴:还有就是在西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派,作为一种学说来研究,但是我们却往往把它作为一种宗教一样去信仰,好像是排他的。

王:当然是这样了,不过西方也有许多类似的思潮,什么后现代派,结构主义,他就等于他的老祖宗一样了,就把它作为全部的东西了,我不是很清楚,这种东西很多。

吴:也这样崇拜,也这样一种的独尊一术。

王:还有一种民主思想,是有思想在里面,所以他认为是可以容忍他人的不同的意见的存在,要进行讨论,可以尊重跟自己思想不同的意见,我们中国是没有这样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不是属于我们谈的这个问题。中国是个集权国

家。独裁最后都会有斗争，希特勒的纳粹，也是这样的。

吴：美国人用暴力来压制暴力。

王：他不是，美国人就像过去社会主义输出一样，他要输出他的民主观念。我不是反对民主，你那一套东西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我是主张自由的，但是你有那一套，我有我中国的一些东西。

吴：对美国式的民主并不一定全部接受。

王：我觉得不适合，我不知道好不好。我就觉得黑格尔的一句话，民主并不是个好事情，但是目前来说还没有另外一种制度比民主好一些，我很主张这种低调民主论。

吴：那对美国式的民主你觉得目前还是最好的？

王：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我们存在着一种最浅薄的方式，谁的主义喊得最响，叫的调门最高，拳头举的最大，谁就是最革命，最民主。这种我最反对了。

吴：我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从各方面体会到美国的民主还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当然问题也确实很多，例如他们竞选政治所花费的大量金钱，以及通过广告来抹黑对方。

王：那当然，所以林毓生跟我讲过一句话，我很同意他说美国现在的政治都很差，但是他们有这个开国老爹啊，他们很幸运，也就是有了一批先驱者。比方说华盛顿、杰斐逊等等，他们制定宪法啦，为他们制定的这个制度沿用到今天。我看了《美国的民主》，是被美国奉为经典的，里面有六十几种译文，现在又有新的英文版出来了。这本书美国人奉为经典，是一个法国人在19世纪写的，他到了美国9个月，写了这本书出来。你应该多了解芝加哥社科委员会的那个机构，他们开列的必读书目，那里面开的书都是必须得读的，经典著作，林毓生就是在那里面训练出来的。

吴：芝加哥大学在社会思想方面的研究是很厉害的。

王：不是芝加哥大学，芝加哥社会科学委员会。

吴：哦，是社会科学思想委员会，相当于一个系，林毓生先生就是从那儿毕业的。

王：我觉得你现在把第三次反思的内容，把这个整理出来就了不得了，你一定要忠实于我说

的意思，而且你还要说明一下，我们谈的环境情况。下次我来不及说的话，你可以问林先生，当然很多东西也都是我书里面写到的。

吴：您今天讲您的第三次反思是比较系统的。

王：对，我今天是比较全面的，以前都是这里录一句，那里一句，目无全豹了，我今天是把它比较综合起来讲，你能综合起来讲就比较好。■

（据2007年7月19日的录音访谈整理）

（作者为美国加州斯塔莫妮卡学院教授、美中文化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 黄钟）

炎黄春秋网上书城

网上购书 方便快捷

网址：<http://yh100.taobao.com>

本刊唯一授权网上书店

联系电话：18611911105 15801313168

联系人：关小姐 淘宝旺旺：zssy8888

人文历史 文学小说 党建管理 行政管理专著

正规出书 约稿通知

书稿内容：①人文历史类书稿：回忆录、自传或人物传记、社会纪实等；②社会科学类书稿：社会科学、人文与伦理、历史与年鉴、哲学与思想、文化与民族等研究著作；③文学类书稿：散文、诗歌、杂文、时评、游记、通讯等；④小说类书稿：历史、当代、言情、武侠、反腐等长篇、中短篇小说；⑤美术类 画册类：中国画、油画、水彩画、水粉画等；书法类：毛笔、硬笔、篆刻等；摄影类：旅游、收藏、风光等。

书稿要求：可为个人专著，也可为多人合集。个人专著由单独的作品或若干篇合集组成，字数应达到6-8万字以上；多人合集由2-10名作者的作品组合而成。

出版发行办法：以畅销书或合作出版方式运作，以图书形式陆续出版，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面向国内或海外公开发行。其中国内公开发行的，由专业权威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国家新闻出版署备案查询。

约稿详情，欢迎来人、来函、来电联系咨询。

全国免费投稿热线：400-680-8368

投稿邮箱：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3号654信箱

综合编辑部收 邮编：100025

电话：010-57733086、57733087、57733088；

传真：010-89506878 在线投稿：bookbj@126.com

联系人：文馨、高晶、伽悦（编辑）

新书欣赏、订购，请登录：<http://www.bookhk.net>

详情请浏览网站：<http://www.zujiaba.com>（中华出版热线）

知情者谈饶漱石

○ 景玉川

艰难的采访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决定采访和搜集有关饶漱石的资料。尽管那时的政治氛围远比毛泽东时代宽松得多,但在一般人看来,这仍属“险学”,是危险犯禁之事。

不久,我找到了饶漱石的小妹妹饶玉莲和她的先生谷思义教授。但谷思义未见饶漱石,饶玉莲与大哥年岁相差又太大,对兄长与高层的事也知之甚少,因此,要了解饶漱石的情况,必须采访曾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

好不容易打听到了李正文可能知道一些饶漱石的情况,可我在1993年10月下旬第一次上门采访他时,却挨了一顿臭骂,差点被他赶出来。李正文曾担任过建国后第一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委员。我刚说明来意,他就大吼:“我是个小百姓,他(指饶)是大官,专门整我和陈老总。他老婆陆瑾喊他小饶都不高兴。你在我这里得不到什么!”

我狼狈极了,为了不至于被赶出门,只好向他解释我的本意,然后再与他谈别的话题。后来第二次上他家,彼此熟悉了,他抱歉说对饶漱石的事确实了解不多。在北京,不仅在李正文处我碰过钉子,在其他几处也吃了闭门羹。后来去上海,这遭遇也同样碰到。

几经周折,我找到了饶漱石的女儿兰沁。可她开始也很慎言,两次见面都所谈不多。渐渐地,经过几次交往与通信,双方开始相互信任,我只要上北京,都会找她。不过,开初几次见面,我觉得像搞地下工作时那样神秘,要头天约定会见地点。有一次见面是在五四大街附近一个公共汽车站的站牌下,还有一次是在天安门前。

兰沁告诉我:为父亲饶漱石平反,是她和她



饶漱石 1946 年在北平军调部

母亲多年来的一块心病。为陆瑾平反时,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是很热情与卖力的,但为父亲平反,胡耀邦就不便过问。

她还告诉我,张鼎丞病重时,她去看望张老,此时张已不能说话,见兰沁来,只是紧紧拉着兰沁的手,呜呜地哭着,想说什么,但谁也听不清他的话。

张鼎丞是华东局与饶漱石工作和生活中接触最多的领导人,饶被诬入狱,判决有罪时,他恰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位置上。

采访李正文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奇介绍的。当他得知我采访李正文无收获时,又介绍我去找吴宝康夫妇。吴宝康曾担任过华东局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可他说:“饶漱石平时不说话,与

下级接触少。”不过他向我介绍了陈麒章：“陈麒章是大秘书，还有一位秘书是稽春生，你找到他们，知道的事一定很多。”告别时，吴宝康夫妇都鼓励我说：“你做的这件事有用，赶快找，再不找全都死光了！”这一天，是1993年11月8日。

陈麒章谈

陈麒章曾是饶漱石的大秘书。第一次采访他，他就谈了对“高饶事件”和饶漱石的看法。他说：

饶这个人，别的方面你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生活上他也没有什么特殊，很严谨，甚至有点过头，一天到晚严肃，比较不近人情。别的方面人们也抓不到什么把柄，什么挥霍呀，大吃大喝、不检点……都没有。这个人本来是做群众工作的，后来不晓得怎么搞的，脱离了群众。张鼎丞每次来北京都住在饶家里，他们私人关系很好。饶漱石出事后，张鼎丞很吃惊：“怎么搞的，他出这事？”在华东，饶威信蛮高，舒同对他很尊重，邓子恢对饶也是服气的，曾山也是一样。

这个人毛病还是有的，但说他与高岗有什么“反党活动”，需要确凿的证据。至于说他们的反党活动可以心照不宣，这是不能服人的。你怎么知道他心照不宣？根据一些迹象，就断定是这么一回事，那就很难说。

我只给他做了10个月的秘书，后来他停职反省，我在他家里帮他整理他的检查。他有什么想法，我随时向中央汇报。他写到什么地方，有什么观点？他怎么提的？我都向上反映……他到底参加了什么反党活动？我到现在也是稀里糊涂的。

这个人很少讲话，一个人坐在屋里呆着，也不去找人聊聊。后来他写检查，也是他先谈，我帮他整理，然后他自己再看过，再改，我从来不插话。

……他的部下，华东局那么多人，没有哪个对他关系特别好。私交上最好的是张鼎丞，但工作上还是各干各的，粟裕来北京也没有和他来往过，战争年代他们也不在一起。

陈麒章眼中的饶漱石是饶生病后的状态，也许与以前在上海时稍有不同。

在谈到“高饶联盟”时，他说：

饶漱石平时难得有几个朋友，我倒奇怪。当时有个说法：“高岗门庭若市，张牙舞爪，饶漱石是单干户，不到关键时刻不伸手，看准了，到时我再捞一把。”要搞反党的人，连手下人都没有，你一个人怎么反党呢？对这个提法当时我很怀疑：老婆也跟他离婚了，秘书也不跟他了，反党总要有几个爪牙吧？据说有一个比较负责的领导同志（不知此人是否是兰沁找过的廖承志——引者）向中央写信反映饶的问题应该有个交代……关于高饶事件，我提供不了什么线索，我给他当了10个月的秘书，一直到事发。说实话，我没有见过高岗，连他的秘书也没有见过。高岗在东交民巷，我们住在景山后街，我是组织部的，与他没有组织关系，我去干什么？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同志是好几年后我才认识的，我说：“原来你是高岗的秘书，我还没有见过你呢！”

财经会议他没有让我也去，他（饶）说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回来也没有跟我讲。饶发了什么言，我也没见发言稿……这件事从现在看，不算什么问题，因为是党内开会，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允许的，比如彭德怀写信，那算什么反党？！当时财经会议也好，组织会议也好，还有华东军事委员会主席问题，从现在看，党内有些意见分歧，在公开会议上发言，不是背后活动，不是秘密的，这算怎么回事！如果会上不说，背后胡说八道，那才是违反纪律的。我是在会上公开发言，我表我的态，这算什么反党！饶漱石的问题，你去看看《邓小平文选》，讲高岗的比较具体，讲饶漱石就很含糊，没有具体的事。饶有错误，但是不是跟高岗有反党联盟？我有怀疑，我保留我的看法。他几件事，比如财经会议上的发言，这是正常的；他背后和高岗有什么活动？我不知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那个问题不能成立；潘汉年的问题现在也不能成立，还是各人有各人的账。是否真有个“高饶联盟”？我和很多同志都有怀疑……

……他跟高岗有什么来往我不知道，只知道到北京后他常到这些人（指黄克诚、曾山、张鼎丞——引者）家里去。所以后来我嘀咕饶漱石反党是怎么一回事呀？他有毛病，但不是一出问题就什么都不行。他的问题中，现在澄清了一个问题，即不是内奸……建国后讲这个联盟那个联盟，毛

泽东说了几十个反党集团,现在只剩下两个。你看,“胡风反革命集团”没有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没有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没有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没有了,都站不住脚了。现在只剩下了两个,一是“四人帮”(不是毛定的——引者),一是“高饶反党联盟”,这(指高饶)应是未定性的唯一一个。

我作为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参加了一些会议,“八大”时我也作为工作人员搞会议记录。当时听到有人说“高饶反党联盟”,拿什么做证据?毛(泽东)说这种事彼此心照不宣,还要条约?还要签字?这个事就很难说,应该有充分的证据。将来讲党史这个账怎么说呢……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了,了解全过程的只有几个人,一个邓小平,一个杨尚昆,一个彭真,彭真身体也不行了,但这几个人不会说。所以党史上这个问题将来怎么写?还不得而知。实事求是的话,我有个想法:事情终归会认清楚的,比如说朝鲜战争吧,过去说是美伪发动的,实际上是(北)朝鲜发动的。应该实事求是,不是事实的事迟早要纠正,是事实你也翻不了,比如“四人帮”,永远也翻不了。饶漱石你把那些事情去掉后,你说他到底有什么问题呢?你拿不出像样的、有说服力的证据来,传闻的东西很难说。“反革命”是排除了,“反党联盟”还存在很多疑问……

在批判高岗、饶漱石时,有两句话当时我印象很深:说高岗到处活动,东交民巷门庭若市,广为联络,饶漱石是单干户。当时我们听了就有疑问:搞反党活动你还能单干户?单干户,你一个人能唱戏?高岗当时活动很明显,到处拉拢人。现在高岗那里也有一个大问题:他的“五虎上将”里边一个坏人也没有,张秀山、张明远、马洪、郭峰、赵德尊,赵后来当了黑龙江省副省长,张秀山当了国家农委副主任,郭峰是中顾委委员,马洪是社科院副院长……这些人后来都是党的高级干部。

几天后,我第二次上陈麒章先生的家,他找出了1982年写给陈云的信的底稿,谈话中又谈起了对饶漱石事件的看法:

饶漱石没有什么贪污,个人也没有什么嗜好,或者什么什么的。他不像高岗那样作风腐化,也不像有的人利用职权,到处搜罗字画古董。康生就搜集了好多好多(陈麒章先生曾是康生专案组成

员——引者),我们到他家去,发现他捞了不少,“文革”前捞,“文革”中更捞。饶漱石没有这个问题。另外,他平时不拉帮结伙,对一些人特别好,或者任人唯亲。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人怎么反党呀?想不通。我就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一回事,确实搞不清楚。趁这些知道情况的人在世的时候能搞清楚更好,更准确。

他的事,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肖光谈

肖光离休前曾任中共中央机要局副局长。肖光对饶漱石的看法很好,他说:

我1945年到军部去,跟他接触比较多一些,因为他是新四军政委,华东局书记。那时我是机要科长,原来我在苏北,45年才到军部,从那时起一直到华东局结束,他调到哪,我都跟他在一起。在整个工作过程中,这个人工作是认真的,态度很严肃,对事情,对我们要求比较严格。比如一些电报都是我给他送去,有什么不对的,他就指出,态度很好,也是严肃的。平时生活上也很严肃,不大开玩笑,严肃有些过头,甚至跟他爱人陆瑾同志,都不怎么开玩笑。我当机要科长,他出门都会和我打招呼:“肖科长,我出去呀……”他还会告诉我到什么地方去,以方便我有急事找他——一般的领导出门是不会跟你打招呼的。生活上他也很俭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时,我们在胶东、鲁中,比较艰苦,有什么事情,无论白天还是晚上,这个人非把事做完才歇手。有时炊事员给他搞点菜(那时吃小灶),搞点肉呀,面条,他还要说几句。那时大家都比较艰苦,他生活中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上海解放后,有一次他婶母来,秘书长魏文伯买了点礼物,没有通过他,他就批评了魏文伯。

在谈到“60号办公室”旁防空洞上建礼堂一事时,肖光说:

他对人对己都要求严格,所以容易引起人们产生误解,别人会说他伪装。我与他相处几年,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进上海,我对他总的印象比较好……文稿、电报大都是自己写,只是很少的时候叫秘书写。我给他送电报,该怎么答复的,都是他自己动手。这点,有些领导人不容易做到,像他这样身份、地位的人,一般有

什么事都叫别人,叫秘书、叫参谋,他这个很少,他身边好几个秘书,艾丁之外还有正副秘书长……在励志社,他不住好房子,住旁边比较差的。

至于政治上的事,我只是听文件传达的,具体也搞不清。高岗在东北,他们没有接触过,除非中央开会。而且他们性格也不同,高岗是花花公子,饶比较严肃,什么娱乐活动他都不搞……我在华东局(他背后)搞陈毅的事没有,我没有发过这样的电报。一般这样的电报,饶漱石都会找我,指定人译的电报都找我,因为我是机要处长。所以说高饶的事我都怀疑。比如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有人)说是他搞的,我也不相信:他是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书记,负责建设上海,他怎么会破坏呢?比如还有传说他要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事,也是……道听途说,胡说八道。

说他对刘少奇态度怎么怎么,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他是少奇同志培养出来的,平时他对我们也“少奇少奇”很尊重。这事薛丹浩比较清楚,跟了他一段时间。

过去一些(华东局)领导干部对他都很尊重,下边的干部,各师师长也一样。说他是“伪君子”,那时间长了也会暴露出来。这个人个性就是那么不活跃,不大接触群众,我们在他身边工作,他很少出来给人聊天呀。也不是怕他,下面的人一般都是领导不找自己,他也不会去找领导……高兴的时候他也与人说说笑笑,但很少,大多是一个人散步、看看书。

你说他“单干户”,我要搞反党,下边至少要有几个人。一个人,顶多只能算是有点个人意见,要搞“反党联盟”,总要有几个人,一个人匹马单枪总不行。

左金祥夫妇谈

左金祥是江西人,离休前是总参谋部机要局副局长。他的夫人章静,早年曾在新四军机要部门工作。谈起饶漱石,他嘀咕说:“说饶漱石反党,弄得人莫名其妙!我们江西好不容易出一个大官……”章静则在一旁不止一次地叹息。

左金祥说:饶漱石生活还是很简朴的,作报告人家很欢迎,不是会说,而是逻辑性很强,理性性很强。他不拉关系,我们也不拉关系。

我跟饶漱石没多久……那时我们当小干部的有些怕陈老总,对饶漱石无所谓……。

我们谈话时,章静也不时插言。她很早就见过饶漱石。对饶漱石的“反党”、“反革命”问题,她显得有些气愤:“讲人要有根据嘛,我们这些走过来的人知道,该怎么样就应怎么样,事情要搞明白。”“我们在华东呆了十几年,华东那些人,有意见就当面提,大家没有宗派,人与人之间关系很好……”

临别时,左金祥说:

“写本书让不了解情况的人知道也有好处。”

送我出门,章静说:

“把这件事搞清楚,也是我们华东人的愿望……”

刘廷臣谈

1994年春天,我第一次到上海,第一个采访的对象是刘廷臣,他先后曾给张鼎丞、饶漱石、谭震林三个人当过警卫员。言谈间他不时对饶漱石的遭遇现出愤愤不平。他告诉我:

……案子发生后,我们几个老同志都不满意。我对饶是这么一个印象:他不跳舞,不大看电影,发什么穿什么,我们这些人也不能特殊,吃饭都是集体吃、门子也不串,星期天也不出去(我们警卫人员可以轮班休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他是以身作则,对他印象没有不好的……

……饶出事时,有人每天晚上去找饶漱石谈话。

大会也好,小会也好,我是警卫员,说他反党,我没有看到,这一点我觉得不公正。饶在战争环境也好,建设环境也好,他没有单独做过一件衣服,单独领过什么东西……我们在山东,今天躲,明天藏,吃辣椒水,求啥?所以我感到他不平反,我心里不好过……上海一些老的,我们这些小的(指当年的警卫与工作人员——引者)都是这个想法。

张鼎丞把兰沁接到他家,张老也吃了苦头。张老与饶老关系很好,张的秘书陆健比较正派。张老对兰沁的事很伤心,粟裕与饶关系也好,谭震林也说:“我在浙江与前线工作,不了解(饶的反党情况)……”饶与陈云的关系也看不出来。现在上海了解饶的人没有几个,胡立教肯讲的话会

知道一些,当时饶的代号叫501……他出事后中央(调查组)来了解情况,我们说:“他什么地方也没有关系,只看牙齿找过北京路一位私人医生,这我们担保,其余他哪儿也没有去”(说到这里,刘大笑)

为了便于我在上海找到更多的知情人,刘廷臣还给了我一份当时华东局在饶身边工作过的人员名单,上面有他们的地址与电话号码。此后,我就依照这份名单,一一去拜访我所要采访的知情人。

李宝贤谈

李宝贤当过饶漱石的卫士长。饶调北京任中组部部长后,1953年2月,他和饶的秘书艾丁一同返沪,李任华东局保卫处保卫科副科长,专门负责来沪的中央领导的警卫工作,接待过许多头面人物。

他对饶漱石的看法也是很好的。他说起他回到上海不久,饶漱石出事后在他心里引起的震动:

半年以后,问题暴露出来了,说是“高饶联盟”在上海开会,陈毅发表了好多意见,原来有一本材料叫《高饶联盟反动罪行》很厚,我当时看了,很多事情我们不熟悉,我一点也没有想到:他的威信那么高,我们这些人搞警卫一点也不知道。……见了那些材料后,他联盟搞什么我也弄不清。饶漱石办事很稳重,我跟领导这么多年,看的领导不少,觉得办事稳重的领导考虑问题就全面,我想也没有想到饶漱石会这样!他就与高岗接触过几次,也都是高岗来看他,所以我总感觉到(叹气)这么好的人!过去他有个叔叔来,他都不见(应是饶的族兄饶真泉,其祖父收养了饶漱石之父饶思诚。饶真泉土改时划为“破落地主”,“文革”中夫妇双双在厨房吊死——引者)。有一次我们警卫在大门口收到一封信,里面有两颗子弹。我说不给他(饶)看,这事只有秘书(艾丁)和我知道。我对下边说,这恐吓信没有什么,你们不要怕,只是今后有什么人要见他(饶),你们一定要让我知道。

李宝贤对饶漱石一家充满了感情,他对我说:“我很想到北京去看看兰沁,但现在身体不好,不能出门。”

凌文英谈

凌文英在李宝贤之前任饶漱石的警卫队长。他说:饶出事时,我们只能以“想象不到”来形容。从外表看,他蛮好的嘛……弄了半天,这样的人怎么能反党呢?前些时,我们还在一起,说饶漱石的事。高岗怎么样我们不清楚,饶漱石这人我们知道……说实话,作为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反党”呀,“联盟”呀,都存在疑问。

林钧堂谈

林钧堂曾是张鼎丞的警卫员,因为张鼎丞与饶漱石私交较好,工作上接触又多,所以对饶漱石也有所了解。林钧堂后来进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回上海,离休前任上海机械专科学校纪委书记。

在我采访过的警卫人员之中,林钧堂的文化修养算是最高的了。

由于经历与政治文化修养的缘故,林书记给我谈了许多在山东的经历,只是在评介饶的“反党”一事上,他出言还是很谨慎:

他(饶)这个事,我们作为一般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反党”、“联盟”之类是存在疑问的,实事求是地说,是不大有这种可能的。

饶在山东没有什么闲空,他和别人也没有私交。

我在北京读书时,他出事了,我去看张老,兰沁也在张老家,张老对这件事也很吃惊。

艾丁谈

艾丁跟随饶漱石6年多。1946年在延安开始由组织安排到饶身边当政治秘书,1953年2月离开。作为饶的政治秘书,他应该知道很多历史真相,可是他不愿跟我多谈,采访时也不同意录音。

1994年3月14日上午9时左右,我在上海外滩市政府大楼采访了他,当时他是上海市建设委员会顾问。事先与艾丁先生预约时,他不希望我上他家,而选在他上班的市政府大楼。采访虽有一个半小时,但记下的事情不多,其中有这么几点:

一是在延安枣园时,饶漱石夫妇散步,陆瑾

去挽饶的手,饶不肯。俩人拌嘴多用英语;

二是薄一波“三反”、“五反”期间来上海,作报告时,说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上海“三反”、“五反”表示过不满,说上海右倾;

三是为饶的事后来他吃过很多苦头;

四是饶漱石后来有些不信任他,以至他也不愿跟饶说话;

最后,在谈到饶漱石事件性质时,他仍然客观地说:

“他的事,按理也应属党内的事。”

20世纪90年代,兰沁一次来上海时,艾丁还宴请她,邀当年一起工作的人作陪。

陆熙昶谈

陆熙昶,是陆瑾的小弟弟,给饶漱石做过几个月的保健医生。他说:

我是从部队进的大学,1952年春夏在上海医学院读三年级,有一天,组织上找我谈话,要我到北京去。到了北京,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找我说:在华东首长中,饶漱石是一把手,你去给他做医生,护理他……由于长期的地下工作与精神紧张,饶当时患有肾虚症,战争年代没有条件,进上海后,陆瑾开始督促他去看病:“一天到晚总是工作工作,其他什么事情都不顾,现在条件好了,你可以去看病。”当时上海有一位很有名的医生叫杨国亮(音),他给饶看了病,饶也信任他。杨大夫给饶漱石开了针,据说可以壮阳。饶上北京后,组织上派我给他每个礼拜打针,因而这段时间与他接触的机会多一点。

我到北京时,他还在北京医院住院(治颜面痉挛——引者),刚好陈毅去看他,对饶说:“我们这些人,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我们多活几年,对党是有好处的……”饶后来到了颐和园。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保健大夫,只觉得在北京三个月我没啥事可做,每天就是督促他吃点安眠药,吃点维生素,打打针。我想自己此时是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学习很紧张,放弃了很可惜。于是我要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不要占一个人,有什么情况,只要中央保健局派一个人就行了。就这样后来我又回上海了。

这几个月在北京,几乎整天有接触。他这个人讲话很少,谨慎,不如陈毅放得开,陈毅作报告

我爱听……抗日战争年代,我很少看到姐夫,后来我调到军部一个卫生学校,陈毅来给我们作报告,他来了,我这才知道他住地离我们不远……在所有的人心目中,一直到现在,都对他非常尊敬,所以听说中央首长出事了,华东的人都没有想到是饶,都很吃惊……华东局干部对此都有看法,但不敢讲。

我去北京是因为政治上可靠(亲戚),那年夏天去北京三个月,此事我以前没说过,出事后更不敢说。

……我去(北京)时,“睡眠疗法”已经做完了,他找主席可能是在我来之前的事。我在颐和园时,中央首长都来看饶……批饶的材料根本不可信。

高岗与彭德怀的关系好,所以后来讲“彭、高、饶”。高岗的表现说明他根本不会对毛不好,他只对刘少奇有意见。高饶出事之前几个月,毛泽东有时与高岗彻夜长谈,什么都说……

1954年,饶还未抓时,我去了。那次是去东北出差路过北京,我去看姐姐,姐姐是听了传达报告的(指1954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传达高饶问题的指示》——引者),饶拿本书给我看,说:“毛主席很注重什么什么……”还教导我说毛怎么伟大……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对姐姐说:“这样一个对自己很克己,工作勤勤恳恳的人,说他有野心,野心从何而来?连吃一口白糖,也说国家很困难,别浪费了……”姐姐说:“唉,政治上的事,你不要讲。”她了解的情况多,当时希望我保住工作,要我不要过问这些事。

八、九年以前,早已时过境迁,“文革”已结束,很多人都平反了,我们对陆瑾谈起饶漱石:“像这样的有功之臣,怎么能这样就算了呢?”她就说:“饶这个人呀,也不知什么时候有个水落石出!”

“文革”中,我看到过一份材料,上面说:建国初,毛主席对刘少奇、周恩来感到不称心,毛正在考虑是否把刘、周放在一边,这时,高岗的事情发生了,毛最不放心高在背后搞名堂……我相信“文革”中这份材料是可信的,我知道高、饶两人相交很少。

我今天讲饶漱石许多事,并非(我)与饶漱石是亲戚,现在姐姐跟他的关系已结束了,我讲这些,是为了对历史负责。

李振田、姜廉谈

采访李振田是1998年长江大洪水九江决堤的前一周。李振田是山东人,15岁起为地下党跑交通,进上海后一直在华东局保卫处。菅荣斋接替李宝贤任卫士长前,原是拟定由李振田代李宝贤的,后有人提醒说他当时管的事太多(司机、警卫、其他服务人员)便改由菅荣斋去了。李后来也调到北京,最后在师级位子上离休。

李振田告诉说:饶漱石因“反革命集团”案被捕后,凡是饶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被集中起来在一起学习,为期一个月,称之为“肃清流毒”,参加者包括警卫员、司机、其他秘书、保姆、厨师……

在1954年批判饶漱石的会议上,饶还有一条“错误”就是散布对刘少奇的不满,饶漱石本人对这事坚决否认。

李振田谈到刘少奇到上海期间,饶在接待上确实有过“怠慢”:

刘少奇夫妇那年来(1950年)住了大概一个月,他左右的人对生活要求比较苛刻,如叮嘱房里气温不得低于22度,不得高于24度,那时没空调,靠烧锅炉,这个温度很难控制。饶开初陪了几天,后来没有陪。对刘左右人员的特殊要求,饶总是一边叹气:“唉,唉……”

陆瑾之弟陆熙昶也回忆说:

上海解放后,刘少奇几次来上海,陆瑾讲:“少奇同志来了,你也去陪一陪”。他说:“这次他是带夫人来,还有小孩,又不是正儿八经的工作……”这件事有两种看法:一是首长来应陪陪;一是工作正常就不需要陪。这说明饶是正确的。

姜廉当过饶漱石等华东局领导人的生活管理员。他对饶漱石的看法很好,谈起饶的“反党”,他说:“他出事,我们莫名其妙。”

菅荣斋谈

采访菅荣斋是在2005年5月。菅荣斋是饶漱石最后一任卫士长,亲眼目睹了他负责警卫的第三野战军政委、中组部部长被捕时的一幕。见面时,他告诉我:

我们很愿意为这些事(指饶)给他说说,也有老同志劝我:“不要着急,总会有人出来为他说话的。”可是到现在也没有个说法……这次听说江西



饶漱石最后一任卫士长菅荣斋

有人来找我,我很高兴,因为我一直惦念这件事。

我们有很多话也不知跟谁说?听说你们要来,我老伴说:“你别激动得睡不着觉哇!(我)太激动了,今天下午接到你们的电话,(因为)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所以下楼去接你们。”

1953年,饶漱石的政治秘书艾丁和卫士长李宝贤回上海,陈麒章与菅荣斋分别接替秘书和卫士长的工作。不过,菅荣斋比陈晚去一个多月。他说:饶漱石对我们(我、艾丁、陈麒章等)要求很严。到北京别的没有什么,就是感到生活要求太严格了,陪客人吃饭我们自己都要掏钱,偶尔才去要点烟要点茶……按常人想象:在首长身边工作一定得到不少好处,但我们一点好处也没得到。我从上海调到北京,工资一级也没有增加,去时17级,回来还是17级。他对我们要求严,对自己也是一样,举个例子:他告诉我(他)吃饭只要一菜一汤(一荤一素)就可以了。来了客人,顶多加一个两个菜。他一家的伙食钱(包括兰沁、陆瑾)一个月50块钱就可以了。有一次他妹妹(指在人民大学读书的二妹妹饶玉莲——引者)去看他,他也没有拿钱给妹妹,他没提,我也不好拿。他告诉我钱怎么用法:要节省用,不要大手大脚,以后退休了,休假都要自己花钱。我在那里一年多,给他攒

了3000多块钱,一分钱也没乱花,走时,我都交给了陈麒章处理。

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白开水一杯。没有什么爱好,只在上海看见他打弹子,一个人坐在那里。

他很朴素,一身衣服穿了好几年,后来是给虫子咬了,才换。家里什么东西也没有,一床被子、一床毯子……啥也没有。

菅的夫人姚兰桂熟悉饶一家人,她插话说:

兰沁的裤子都接了三截(人不断长高,裤子不断接),她那时是高干子女。

菅荣斋谈起饶与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交往时,说道:

当时饶管很多事:共青团、劳动部、组织部(都有归他管)组织部行使总书记权力。(很多人)包括苏联专家都对饶评价很高。那时一些苏联专家的安全也归我们管,他们说他是布尔什维克。

在与饶接触的人中,张鼎丞是最好的,好到什么程度呢?他到北京没有安家之前,吃饭三天有两天起码在饶家吃。孩子们之间也这样。饶走了(被捕)之后兰沁就在他家。她妈后来也出事了,我们不能接待也不敢接触,兰沁就在他家和张的九九在一起。

饶和张云逸的关系也不错,谭震林也不错。

饶跟粟裕很好,粟裕小孩小龙在八一小学,礼拜天、礼拜六都是我去接回来住,礼拜一我又给送回去,那时粟裕和爱人在前线(南方)。

饶与廖承志、廖梦醒比较好,廖梦醒常去他们家。

潘汉年、扬帆没有看到他(饶)与他们有什么关系。

饶不怎么到别人家去,在北京一般都是别人到他家里多,他到人家家里去很少。他与黄克诚关系一般,跟邓子恢、曾山好一些。最后一次谈话是邓子恢、曾山去找他谈。我进去倒茶,饶说:你们去吧,去吧,让我们出来。那次谈话没几天,他就被捕了。

他与高岗没有往来过,两个人生活习惯很不同,高岗好跳舞,搞男女关系,饶很保守。在北京,他给我的印象,除了开会,他没有上高岗那儿去过。后来我们听说“高、饶”之事后,很奇怪,接触都没有接触,“怎么联盟”呀?

我们住在景山后街乙(1)号,右边张闻天是甲(乙)号,邓小平也在隔壁……

谈起饶出事和被捕,菅回忆说:当时斗争他的是陈毅、邓小平等人,那次在中南海西楼开会,我很纳闷:怎么都是华东的人、比较熟悉的人?会议结束后,他停职反省,他找到我们说:“我现在在休息,你们要注意学习,钱不要乱花,以后退了休,什么都靠这个”。我们不知道他停职反省(那些日子)他总是一个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在这期间,中央警卫局一位副局长叫汪景贤(音),也布置我每周向他汇报饶的生活、吃饭、睡觉、夫妻生活怎么样……我也没说什么。

逮捕他的时候,饶正在吃饭,我在门口站着,这时外面来了人。一位是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还有一位是13局的局长,个子比较高,穿灰中山装。他们带了几个人,开了部两个门的汽车,这些人不是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局的我们都认识。徐问我饶在哪里,我说在吃饭。他们进去,不让饶吃饭,也不让我进去。我在外面听到念逮捕令,说他包庇扬帆、潘汉年反革命,签字的是张鼎丞,他是总检察长嘛。他们给他换上囚服,带上汽车,我看着他坐汽车走远的。

(接着)他们在(饶)家里到处搜查(他家)没有什么东西。他们说:“你去看看吧。”我说:“我不看。”他们啥也没搜出什么来。

他人特别好,从来没有对我们红过脸,发过脾气,没有背地说这个好,那个不好。他一辈子没享到福,怎么落到这个结局呢?这些事,我们有时想起来真是难过。

说到这里菅心情沉重,神情无奈而又茫然。■

(因篇幅原因,本刊在发表此文时作了大量的删节,在原稿的基础上主要保留被采访者的言论。)

(作者单位为江西省九江市文联,作者为一级文学创作员)

(责任编辑 黄 钟)

更 正

2011年第10期第78页周瑞金一文中“许鸣真(即后任台“国安部”部长许永跃的父亲)”有误,应为“许鸣真(即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部长许永跃的父亲)”。

我知道的《苏日中立条约》

○ 王 健



沈钧儒

我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到的香港。原计划到香港后再经越南去昆明读大学。但是有些人劝我,内地(指重庆、昆明)经常遭日本轰炸,学生不能安心读书。在我拿不定主意时,一位《大公报》的朋友给我写了个便条,介绍我先去看范长江,朋友说,他了解的情况多,听听他的意见你再作决定。

我去见了范长江,他知道我的来意后,果断地对我说,内地轰炸很厉害,影响学校正常上课,“皖南事变”后,很多进步文化人聚集在香港,你还是留下来好,这里学习的机会很多。于是我下了决心留下来。当时,我一面在小学教书,一面参加了茅盾主持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领导下的青年文艺研究会。

我是从报纸上看到1941年重庆大轰炸的新闻。当时,进步文化人、国际问题专家如乔冠华、金仲华等人,在议论日军是南进还是北进的问题,我从这些议论中知道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中立

条约,国民党表示不予承认,也听到救国会沈钧儒等人写信给斯大林表示遗憾。但我没有看到条约和信件,对真实情况更不了解。

1949年后,我很注意收集中国抗战的有关历史资料。当时我想到了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以及救国会沈钧儒等写信给斯大林这件事。这时我已被调任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的秘书,并兼任高院的机要秘书,我们朝夕相处,谈话机会很多,有一天我把问题提出来,沈钧儒说:当时确有此事。当我们看到这个条约后,救国会同仁非常气愤,他们两国互相遵守中立,我们可以不管,但是条约是以苏联承认“满洲国”,日本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交换条件而签订的,这侵犯了我国的主权领土问题,中国人实难以忍受。所以我们救国会部分中执委(9人)签名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表示不能承认。周恩来先生得知此事后,找我谈话,分析当时国内外形势,说这封信如发表出去,在客观上可能产生不利影响。萨空了和李公朴、沙千里听到周恩来的话,也觉得这封信有不妥之处,不利于国际上的统一战线,怕引起国民党发动反苏运动。我接受了这个意见,当即表示撤销签名,收回了这封信。这件事我们做得不妥,我很感到内疚。

沈钧儒说,萨空了是新闻界人士,这件事他知道很清楚,你可以找他谈谈。过了几天,我专门为这件事去看萨空了。见了面我把和沈钧儒谈的话重述一遍,他说:这都是事实,当时我在场,大家议论这个条约时确实很气愤,决定写封信给斯大林,推王造时执笔。写这封信时,我们很注意,只写我们对中国领土主权受到侵犯,表示遗憾,不正面反对两国互守中立问题,文字要温和,不要刺激,但原则上我们要表示,拥护我国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这封信写了一式两份,一份送给苏联大使潘友新,一份送给国民党宣传部



沈钧儒与身边工作人员的合影

长王世杰。后来听到周恩来的一番话,我和公朴也觉得有些道理,所以借口“补充内容”,收回了这封信。这封信实际上已在重庆国民党的《民意》周刊上登出来了。这是拥护政府发表郑重声明的信,国民党也没有借此大做文章。

萨空了告诉我,那年(1941年)8月,他是从重庆到香港帮助梁漱溟创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的。接着他又谈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经过。

他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不但打击共产党,对其他小党派也施加压力,沈老和黄炎培、张澜、梁漱溟、左舜生、张君勱、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多次商谈,想成立一个中间立场的党派,争取在政治上的发言权。最后决定在原有的“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筹备期间,有部分人认为沈钧儒和救国会与共产党关系密切,参加进来怕国民党不批准成立。沈钧儒顾全大局,退出筹备小组,暂不参加政团同盟。尽管沈钧儒未加入政团同盟,政团同盟在国民党地区仍未获得合法地位,不能公开活动,于是决定派梁漱溟到香港办报,在海外建立言论机构,宣传同盟的主张,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和同情。这件事也得到周恩来

的同意。梁到香港后,救国会海外工作委员会邹韬奋、金仲华、张友渔三人发表宣言,表示积极支持同盟的主张,并愿在行动上予以配合。因此,重庆同盟的几位领导派我去香港帮助梁漱溟创办《光明报》。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正式公开后,沈钧儒和救国会于1942年初正式参加了政团同盟,成为政团同盟的一派,故政团同盟有三党三派之称。

萨空了说完了这段经过,他接个电话,因临时有事,我们就告别了。

“文革”结束以后,我继续收集有关救国会的史料。后来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得到一份沈钧儒等人致斯大林函的复印件,该复印件是从当年重庆《民意》周刊上复印下来的。信的全文如下:

苏联大使潘友新先生并请转
贵国领袖斯大林先生勋鉴:

我们以中国国民的立场,谨以最恳切的热情,致书于阁下。贵国援助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及积极援助我中国抗战的事实,使我全国民众对于贵国具有至高的景仰,与无限的希望。今贵国于四月十三日与我们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中立协定,并发表宣言,相互尊重所谓“满洲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完整与不可侵犯性,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国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而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

我们殷切的希望:阁下对于该项协定,能就以下三点,在相当的时机,用相当的方式,作一补充的说明,以去除我国国民及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疑虑:(一)尊重“满洲国”是否事实上包含承认满洲伪国?(二)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否与一九二四年中苏协定内“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的规定发生抵触?(三)对于我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的积极援助是否有所影响?

中国抗战自始即抱定自力更生的原则,认定日本帝国主义为唯一的敌人。对于友邦的援助固然极端欢迎与感谢,但对友邦一时的苦衷所造成不利于我的表现,除表示否认外,亦莫不寄以极端忍耐与期待。我们深信我们的抗战,不仅为中

国的独立、自由，抑且有裨益于世界永久的和平；而且我们深信我们必能团结一致，经过长期奋斗，获得最后胜利，恢复我国主权行政的完整。

我们主张抗战的人，我们亦为景仰贵国的人，并且自信今后亦能为同情贵国之人。对于中苏两大民族携手向人类解放途上迈进，尤其无限的期望。故谨以至诚，略献数语，以供阁下的考虑。此信虽系我们数人签名，但我们相信能代表中国最大多数民众意见。专此并致革命敬礼。

沈钧儒 刘清扬 王造时 李公朴 张申府
沙千里 章乃器 胡子婴 史 良

中华民国三十年四月十九日

我带着这封信的复印件再去看萨空了，当时他已近耄耋之年。他看了信一阵沉思，然后反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最近看到夏衍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里写到，中日战争末期，苏联对日宣战，苏军进入我国东北，拆卸运走了日伪所属的所有工厂机器和设备，国民党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反苏运动。于是他写了一篇替苏联辩护的文章，很多大报拒绝登载，最后以“文责自负”找到一张报纸登出来，连进步文化界人士也没有反应，说明文章没有什么说服力。因此他在回忆录里反思，得出的结论是，“写文章一要讲真话，二要顺人心”。沈老9个人写的这封信就是讲真话、顺人心，既没有批评他们的相互中立，又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心意，当时有什么不可以发表的，如果这件事连救国会爱国人士都不敢表态，还算什么救国会，宣传抗日救国谁还能相信。

萨空了听了我这番话后，说了一句话：救国会的同志是最听党的话的。接着讲了一些当时的情况。他说：虽然听了周恩来的话，收回了这封信，其实信的内容早已经透露出去。

他还告诉我：后来听说在《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曾约见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表示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和援助毫无变更。中共中央也发表了声明：“在《苏日条约》之后，中国必须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国民党方面，虽然在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天，由外交部发表声明提出抗议，但出于继续争取对华援助，不对苏联作任何批评。现在看来，当时听党的话是太谨慎了。而章乃器就是不同意，发生了分歧，最后他为此脱离了救国会。

萨空了接着谈《苏日中立条约》问题。他说他8月到香港后和香港新闻界邹韬奋、范长江、金仲华、乔冠华等人经常有接触，大家分析，条约双方都是为了解除后顾之忧。苏联是准备抗击法西斯德国的进攻，是可以理解的，而日本是为了加强对中国的侵略，进而实现它的南进政策。据可靠的消息，日本在签订条约后，是从中国东北调走大批原对付苏联的重型轰炸机和重型炸弹连续几个月轰炸重庆，特别是发生了6月5日震惊中外的重庆校场口大隧道惨案。大家分析，大轰炸的目的，是想一举摧毁蒋介石的抗战斗志，逼他妥协投降，或与汪精卫伪政权合流，尽快结束中国战场的战事，实现南进政策。事实上，当时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情况下，日本的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但日本的南进政策确是实现了。当时有人片面地为苏联辩护说，苏联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这是站在反法西斯第一线的苏联为避免腹背受敌的权宜之计，如果当时不采取这个措施，那么1941年苏联就可能被凶恶的法西斯势力消灭。但是他对这个条约给中国和东南亚人民带来的严重损害却只字不提。所以人们就把这种人的名字后面加上“洛夫”或“斯基”，把他们看成是俄国人。■

（作者曾任沈钧儒秘书）

（责任编辑 黄 钟）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 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 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 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 原则上—稿—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 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本刊电话：010-68534879

传 真：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文革中的两岸关系

○ 孙宗一

早在 1955 年 5 月 13 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就提出：“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共第一次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

到了 1960 年 5 月 24 日，经过毛泽东的审定，周恩来又提出了“一纲四目”的方针。“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是：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陈诚、蒋经国亦悉由蒋意重用；二、台湾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四、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

上世纪 50 年代的两次台海危机之后，大陆对台工作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进展，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大陆对台工作基本上是以促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为主导方针的，台海局势一度趋向缓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情况发生了重大转变。1966 年 6 月 27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台湾省》的社论，社论提出“解放台湾省，把美帝国主义从台湾省赶出去，使在美蒋反动统治下过着痛苦生活的台湾同胞回到祖国怀抱，完成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这是中国人民的神圣任务。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省，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台湾省，一定要把美国侵略者从台湾省赶出去。”又重提了已经多年未提的“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这篇社论是文革开始后中共对台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标志。

1968 年 10 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也提出“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作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也改变了过去赞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提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1969 年 4 月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九大上作报告时提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解放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

在文革发生以前，大陆的对台工作主要依靠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和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来开展。文革开始后，中共党内负责对台工作的主要领导干部罗瑞卿、杨尚昆、徐冰、孔原、罗青长等被打倒或受到冲击，中共统战部门被污蔑为“牛鬼蛇神的庇护所”、“资本主义复辟部”，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被污蔑为“特务据点”，中共广大统战工作干部也被诬蔑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在红卫兵的冲击下，全国政协机关和各民主党派中央领导机关于 1966 年 8 月相继停止办公。与台湾各方面人士联系较多，在海峡两岸之间起着不可替代的纽带作用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民主党派的各级领导人被当成“牛鬼蛇神”，受到严重冲击，有的民主人士甚至被迫害致死。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做出过巨大贡献，在海峡两岸均有着重要影响力和很高知名度的民主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李宗仁、张治中、邵力子等人，在文革初期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这些“左”的错误做法，使担负大陆对台工作的主要机构陷入瘫痪，相关工作人员无法开展工作，有关人士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大陆的对台工作基本停顿，海峡两岸之间的联系中断。



二

大陆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没有直接波及台湾，但也在台湾岛内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国民党当局又借机发起了新一轮的反共高潮，大陆民众和台湾民众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给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加了许多障碍。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两次台海危机以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意识到“军事反攻大陆”的计划难以实现，被迫进行政策调整。1958 年 10 月 23 日，蒋介石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会谈公报发表，宣布台湾国民党当局原则上放弃武力反攻大陆，将“反攻大陆”的口号改为“光复大陆”。12 月 24 日，蒋介石在“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光复大陆”要“以主义为主，以军事为辅，以宪法作为反攻武器，随时掌握中共动态以策进对策。”这标志着国民党大陆政策的重大调整，由过去的“军事反攻大陆”改为“政治光复大陆”。

1963 年 11 月召开的国民党“九全”大会进一步提出了“反攻复国总体战”，指出“反共斗争是一种长期的总体战”，不仅仅限于一时的军事作战，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而国民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七分政治”和“三分军事”，开展对大陆的所谓“政治作战”。这标志着国民党正式调整大陆政策，决定将大规模的军事对抗转为局

部范围的军事对峙。

国民党大陆政策的调整虽然是迫于国际形势和岛内形势而做出的，所谓“政治光复大陆”的政策实质上并没有放弃其反共立场，但客观上减少了与大陆直接的、激烈的军事冲突，在实际中与大陆方面促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努力起到了相互配合的作用，共同促使海峡两岸关系趋向缓和。

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出现了一系列“左”的错误做法。在文革初期，大陆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一度中断，1971 年 9 月间，江青说，香山碧云寺那个地方实在太好了，可惜被孙中山这个“牛鬼蛇神”给占了。9 月 9 日，江青竟然下令封闭了北京香山碧云寺内的孙中山纪念堂。在文革初期的混乱中，孙中山先生夫人宋庆龄的住宅被红卫兵包围冲击，1965 年 7 月才刚刚归国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夫妇亦险遭红卫兵的冲击。浙江奉化蒋介石母亲的陵墓和蒋介石前妻毛福梅的陵墓在文革初期也遭到红卫兵的破坏。许多与台湾方面有关系的人士，包括在大陆的台胞、台属等，均遭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一些原本已被特赦、已经妥善安排工作的原国民党战犯也被当成“国民党残余势力”而受到冲击，有的被迫害致死。

此外，在文革初期广泛开展的“破四旧”运动中，许多古籍珍本被焚烧，许多文物字画被捣毁，许多名胜古迹遭到严重破坏，文化遗产遭受了巨大损失。所有这些错误做法，一时间在台湾岛内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1966 年 10 月 10 日的《联合报》以整版刊登了一组由该报记者集体执笔的文章，以“中国历史文化的空前浩劫”为总标题，分别介绍了文革发生以来北京、南京、广州、武汉、杭州等地文物古迹遭到破坏的情况，并称中共“驱使红卫兵来彻底地摧毁中国固有文化，正是他们一贯的作风。”台湾各界人士 22 万多人参加的“双十国庆”大会发表宣言，表示：“我们要

发扬历史文化,光大伦理道德,确保先圣先贤列祖列宗遗下之丰富文化遗产。”

国民党当局则借大陆文革之机加紧反共活动,企图实现其“光复大陆”的梦想。1966年10月9日蒋介石发表“告中共党人书”,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要将“凡是有知识、有思想、过去有功绩、有贡献的共党干部和一般党员团员,藉此来整肃清除”,让“红卫兵”成为共产党的接班人。10日,蒋介石又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指责红卫兵“盲动乱斗”,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是“必欲毁灭我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为其目标的思想与行动”,并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捍卫者自居,声称要“以保卫其民族正气的历史文化,大义凛然的坚决行动来拯救大陆同胞自任”。10月21日,蒋介石在对“第十四届华侨节”的书面致词中,鼓动广大华侨“发扬民族精神,为维护传统文化,作最大之努力”,并“一致声讨”大陆的文革“罪行”,同时提出对大陆进行经济制裁,要广大华侨“处处抵制,人人力行,以扩大经济制裁之影响。”国民党当局还下令将蒋介石的文告以热气球空飘大陆,国民党设在金门、马祖的广播电台也对福建等地加强广播,台军设在“前线”的喊话站则直接向对岸展开喊话。

1967年,国民党当局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于当年7月28日成立了由蒋介石亲任会长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动委员会”。1968年11月12日,蒋介石在“国父诞辰暨文化复兴节纪念大会”上致词时提出,“中华文化的精髓,就是以伦理、民主、科学为内涵的三民主义”,“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乃为伦理、民主、科学之发皇,亦即为三民主义的实践运动”。

蒋介石和台湾当局一再把“复兴中华文化”、“解救大陆同胞”和其“反攻复国大业”联系起来,当然有其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但不容忽视的是,大陆文革初期种种“左”的错误做法,确实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疑虑和普通台湾民众的恐慌。

对于大陆文革初期的政治动乱局面,台湾当局一度感到十分紧张,命令台军“注意大陆‘红卫兵’的发展和动向”,并随时关注中共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后来发现中共无意攻台,便转而幸灾乐祸。国民党元老谷正纲撰文称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这一年中“引起举世瞩目注视的重大事

件”,反映出中共政权“真正已濒山穷水尽的绝境,面临分崩离析的噩运”,并断言文革将“埋葬共产主义”。蒋介石在1970年的“元旦文告”中评论大陆的政局,称中共虽已召开“九大”,但政治秩序依然混乱,“军队火并,工农互斗,青年劳改……实已使它本身造成了‘土崩瓦解’的绝症末路”。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宣布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蒋介石随即于次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针对大陆刚刚发生不久的“九一三”事件,蒋声称二十年来中共内部不断发生夺权斗争,近来愈演愈烈,可以充分说明毛泽东思想与共产主义制度“均已完全破产”,并表示“当前的国际形势虽然很险恶”,只要国民党当局和台湾民众“精诚团结,协力同心”,必能“拯救同胞,光复大陆”。台湾当局“教育部”随后还把蒋介石的文告编入高中国文课本,加紧对广大中小学生进行所谓“心防”教育。12月20日,台湾当局“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严家淦在接见出席“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会”的日方代表时明确表示:“所谓国共谈判,是绝无可能的。”

1972年6月,蒋经国接任台湾当局“行政院长”,掌握了台湾的军政实权。此时大陆文革已进入后期,中共开始调整对台政策,采取各种方式缓和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但文革发生以来两岸之间互信全无,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一些善意举动也一概视为“统战阴谋”。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他对内推行“革新保台”的政策,多次公开表示拒绝与中共谈判和接触。

三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大陆的社会经济发展遭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到了文革结束前夕,国民经济几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在此期间台湾却进入了经济“起飞”的黄金时期,国民党当局在台湾过去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自1961起实行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扩张的经济战略,1963年台湾岛内的工业生产比重第一次超过了农业生产比重。在1961年至1972年台湾第三期至第五

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实施期间,台湾的出口扩张工业实现了大发展,最终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经济,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1970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其“国庆”文告中颇为得意地宣称:在“举世彷徨迷惘”之际,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澎、金、马“自由基地”,“政教修明,社会安宁,农工繁荣乐业,青年奋发向学”,“不但对大陆成为了乐土与地狱的对比,对世界亦复成为了清明与混沌的对比。”

在大陆经济严重衰退和台湾经济高速增长

的双重作用下,海峡两岸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差距拉大,也使部分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产生隔膜,甚至不愿与大陆统一,这就为后来“台独”活动的猖獗提供了条件。直到今天,大陆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逐渐缩小了与台湾经济发展的差距,但这种影响依然存在。可以说,造成两岸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是文化大革命对海峡两岸关系最严重、最深远的负面影响。■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黄 钟)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我想重新解释历史	吴 思	28.00	7.00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萧冬连、谢春涛等著	88.00	10.00
读史求实	杨奎松	38.00	7.00
净土	马季瑶	28.00	7.00
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	张 鸣	26.00	7.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信心与希望:温家宝总理访谈实录	新华社总编室	26.00	6.00
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全四套)	北京电视台卫视频目《档案》栏目组编	114.00	12.00
母亲杨沫	老 鬼	45.00	6.00
血色黄昏	老 鬼	39.00	6.00
血与铁	老 鬼	39.00	6.00
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	老 鬼	38.00	6.00
1911-1912 亲历中国革命	埃德温·J·丁格	36.00	7.00
亲历民主 我在美国竞选议员	龚小夏	28.00	6.00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史景迁	19.6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6.00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杨继绳	42.00	7.00
通往立宪之路	刘刚	60.00	8.00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张木生	58.00	8.00
文人陈独秀	石钟扬	39.00	7.00
1943 一盆红红的火(谢韬日记选编)	谢 韬	49.00	8.00
聆听历史细节	王 凡	36.00	7.00
高岗传	戴茂林、赵晓光	59.00	7.00
西路军——河西浴血、生死档案、天山风云	冯亚光	126.00	12.00
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知青回忆录(上下册)	邓 鹏	97.00	10.00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	施用勤译	58.00	8.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50.00	12.00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陆南泉、黄宗良等	246.00	20.00
国学大师之死	同 道	29.00	7.00
人生三面向:宗教、道德与人生	梁漱溟	28.00	6.00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 颐	29.80	7.00
我与中国民主同盟	梁漱溟	43.00	8.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	何 方	39.80	7.00
直译中苏高层会晤	顾达寿口述 郑少锋执笔	28.00	6.00
党员、党权与党争	王奇生	48.00	8.00
望九班忆——一位老者的20世纪	白永达	22.00	6.00
底层的叩问——肖复兴人生笔记	肖复兴	25.00	6.00
国家记忆	章东磐	98.00	10.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乔云华	58.00	8.00
共和国大审判(二)——特别法庭内外纪实	王文正口述 沈国凡采写	38.00	7.00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49.00	8.00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金以林著	48.00	8.00
红墙知情录(一—二三)	尹家民	95.00	10.00
历史:何以至此	雷 颐	28.00	6.00
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经历	徐 孔	29.80	6.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三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四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牛棚杂忆	季羨林	29.00	7.00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林贤治主编	38.00	7.00
中南海人物春秋	顾保孜	78.00	7.00
元帅大帅的最后岁月	李立宁 孟新	48.00	7.00
历史大转折中22个首任省长、市长和自治区主席纪实	孟庆春	49.80	7.00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侯井天	98.00	11.00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 克 李 锐 龚育之等	28.00	7.00
流逝的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	李新著 陈铁健整理	39.00	8.00
官场怪圈定律	李茗公著	46.00	8.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伟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代购代邮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那一场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比沉重的灾难。从“开国领袖”到“个人崇拜”,从“集体迷狂”到“天下大乱”,本书将带你回到那段永远难以忘怀的历史,去探寻那许许多多令你百思不得其解的答案:一批批党政要员的荣辱沉浮,一位位风云人物的人生百态,一个个知识群体的命运磨难……读这段历史,能使读者清晰地了解“文革”前十年曲折复杂的历史及其经验,真正弄懂“文革”发生的原因及其教训。这是一段中国社会主义走向的探索史,更是一段民族的命运史。

《净土》:本书以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为背景,讲述几位知青面对强权、欲望、利益……如何维护自己的尊严,主人公们以不同的方式捍卫自己心中的那方净土。

《我的母亲杨沫》:一位母亲的真实一生;一个女作家的里里外外;一段知识分子的曲折历程;一组巨变时代的百态写真……本书直击人性,讲述一个真实的母亲,写出了造成亲情泯灭、母性淡薄的原因:极左政治渗透于家庭后的影响。记录了一个时代和一段历史的悲剧。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作者以极为新颖的方法研究现代中国历史,——通过中国革命的一些最引人注目的参与者——那些动荡事件和受其影响的作家、历史学家和叛逆者的眼睛向我们展示了中国革命。本书选取了近现代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知识分子,比如康有为、梁启超、鲁迅、沈从文、梁漱溟、徐志摩、丁玲、老舍等,描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个富强中国的不懈追求,揭示了他们在改良与革命的选择中的心灵痛苦与内心冲突。本书被费正清教授誉为“西方对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 :100045 收款人 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注 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

○ 孙言诚

阶级路线推向极端

1963年之后,阶级斗争不断升温,阶级路线也向“唯成分论”演变。“黑五类”子女,大学基本不收,重点高中也开始拒收。有的农村甚至连小学升初中也规定:“出身占60分,表现占20分,学习成绩占5分,其他占15分。”1964年的高考,“黑五类”子女全军覆没。在高干子弟进入哈军工、清华等重点大学时,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却踏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据《无声的群落》一书记载,1964年奔赴大巴山垦荒的2万初、高中毕业生,绝大多数出身不好,其中不乏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却被挡在了大学甚至高中的门外。

1965年初,北京市发生了“四·六·八学潮”,四中、六中、八中的部分学生,以干部子弟为主,进行串联,组织罢课。他们给中共中央写了“进言书”,尖锐地批评学校领导不讲阶级路线,地主资产阶级子女受老师赏识,而干部子女却受压迫。北京市委被迫派出工作组,到这些学校去搞“四清”运动。虽然被他们批评的校领导遭到清算和撤换,但工作组并不认可学潮。彭真在对65届大学毕业生的讲话中说:“对家庭出身不好的还是重在表现。”“过去中共中央文件里面,毛主席的文章里面,都讲团结90%以上,但第一个十条里面就讲团结95%以上。为什么讲团结95%以上?就是把地主、富农家庭的子女放在这个95%以内。”

在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之时,彭真这番话显然不合时宜。“文革”中的红卫兵讥笑他是“重在表面”。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将来出修正

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

阶级斗争的对象已经由地、富、反、坏、右扩展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出身于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毛泽东把这些人定性为“国民党”。

四、六、八中的高干子弟,其实早就从毛泽东对毛远新、王海容的谈话中,理解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他们为了当好“革命接班人”,勇敢地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坚决主张用“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取代文化课的学习。《换取五分的秘密》发其端,废除高考的倡议终其成,四中的学生把阶级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钦定的“国民党”。用刘辉宣(礼平)的话说,他们是冲着国旗上的两颗星去的。

毛泽东支持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可以说是“四·六·八学潮”的翻版。他们批判地主出身的校长万邦儒,批判重点依然是贯彻阶级路线。他们宣称万重用资产阶级的子女,压制干部子弟。一位红卫兵的家长如此分析:“这就是对我们的专政。他们早把我们恨之入骨,如果没有党和毛主席,没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早把你们杀光了。这里面有阶级仇恨啊!”

毛泽东关心的是教育界的领导权,红卫兵关心的却是“接班人”的争夺。在“黑五类”子女淘汰出局的形势下,能与干部子弟一争的,只有两颗星(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子女,而击败这些子女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阶级路线。还是那位家长,一语破的:“在你们这样的学校里,团结95%可能不太适当吧……对右派学生,你们心里都有底,一个成分,一个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就足以卡住他们,不让他们升学,让他们好好改造。”“在学校里,这些人是改造不了的”。(引自《红卫兵兴衰录》)

阶级斗争不仅要年年讲,而且要代代传。于是,一副血统论对联应运而生:

老子英雄(后改为“革命”)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血统论笼罩京城

对联一经产生迅速风靡京城，传向全国。当年北工大的学生谭立夫说得好：“这副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的确如此，对联让不同出身的学生陷入冰火两重天。干部子弟在对联的激励下，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迫不及待地想担负起接班的重任。他们穿着褪色的军装，提着铜头皮带，四处寻找“阶级敌人”。一位干部子弟在清华大学辩论会上说：“天下是老子的父母流血牺牲打下来的，老子就是要坐天下。”他的话博得满堂喝彩。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对联声中却是心惊肉跳。北京一中的“狗崽子”们被逼着一边走，一边敲锣，一边喊：“我是混蛋，我是资本家……”情同手足的同窗学友，转瞬间变成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敌。

有一种说法需要纠正，即中央文革是不支持对联的。不错，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批判过对联，批判过血统论，但那是在高干子弟利用对联支持工作组之后。在红卫兵用对联冲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中央文革可是一连连声地称赞。

7月27日，在展览馆召开大会，各校红卫兵打着写有对联的大字标语步入会场，高呼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江青一旁接道：“基本如此嘛！”

8月2日，关锋在国务院接待室对群众说：“有个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这个口号到底怎么看？我看这个口号基本是贯彻了阶级路线的。”

8月4日在北师大一附中，有同学问陈伯达：“关锋讲话是否代表中央文革？”陈问：“讲的什么？”答：“关锋说对联基本精神是好的……对不对？”陈：“也对嘛，基本如此嘛！”

最权威的还是康生的讲话。8月6日晚，在天桥剧场辩论对联的大会上，康生说：“你们一切评论的、一切辩论的、本质的东西就是要不要阶级路线的问题，而不是对联要不要改几个字的问题……你们到处奔走、到处呼吁、到处串联、到处

革命，就是为了这一阶级路线——毛泽东的阶级路线而奋斗，我对你们很敬佩！”

血统论的烈火是乘着阶级斗争的东风才能熊熊燃烧的。烈火中，“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先是在学校打黑帮、打狗崽子，然后冲上社会打小流氓，打地、富、反、坏、右，一场血腥的“红色恐怖”就此拉开帷幕。

打人基本有如下形式：

一、批斗会。8月4日，在北大万人大会上，红卫兵用皮带抽打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开了批斗会公开打人的先例。8月13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斗小流氓大会，会议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主持。当红卫兵冲进体育场殴打小流氓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小流氓几乎要被打死。8月19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四中、六中、八中的红卫兵和北京市新团委、教育局联合组织了一次批斗黑帮分子的大会。这是一场为“四·六·八学潮”翻案的大会，发言者声泪俱下，听众席群情汹涌，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台，抡起铜头皮带没头没脑地抽打被批斗者。台上无人阻止，台下齐声叫好。原教育局领导孙国栋被打断三根肋骨，李晨被打得头破血流，八中副校长温寒江浑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

批斗会上打人，残酷程度当然比不上后来的私刑拷打，但却有着非同一般的示范效应。因为是有组织进行的，所以它向社会昭示了一条“真理”：十六条以及报刊上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过是一纸空文，对群众运动并无约束力。

二、校园游斗。由于中央为北大“六一八”斗黑帮事件平了反，所以各学校自发式游斗盛行，中间还夹杂着班级或全校性的批斗。游斗、批斗中，暴力成风。如四中的“八四武斗”，全校的黑帮分子和反动学生统统被拉到校园游斗，拳脚雨点般落下，泪水和血水洒满校园。8月5日，师大女附中在游斗中打死副校长卞仲耘，此后死人的事就不断发生。8月17日，101中学打死教师陈葆昆。8月19日，外国语学校打死教师张辅仁、职员张福臻。8月22日，女三中打死校长沙坪、八中打死校长华锦。

被打的不光是黑帮，还有学生。8月25日，师大女附中初三四班开会斗争“狗崽子”，十个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绳绕过脖子把

她们拴在一起,有人动手打,有人向她们泼墨水。北大附中“红旗”则统一部署在全校对出身不好的学生进行斗争。初三五班就有十几名同学遭到毒打,这些学生当时只有15岁。

三、“破四旧”。8月18日毛泽东接见之后,红卫兵冲向社会“破四旧”,抄家、打牛鬼蛇神。打击的对象很宽泛,地、富、反、坏、右之外,还有资本家、小业主、文教界人士、学术权威、民主人士、有历史问题的人以及流氓。如果说,打老师和同学还有所顾忌,那么打这些人可就肆无忌惮了。打人方法五花八门:皮带抽、木棍打、开水烫、钢丝鞭、刀剑……

四、私设监狱。从6月份开始,各中学都设立了劳改所,专门收容揪出来的黑帮分子、反动学生以及“狗崽子”。“破四旧”以后,劳改所也收从校外捉进来的“阶级敌人”,遂成为变相监狱。最典型的就是六中的劳改所。它是由音乐教室改造成的,有看守室、刑讯室、男牢、女牢,上设值班岗楼,安有警铃、探照灯,所内置有长、短刀、木枪、皮鞭、弹簧鞭等,日夜审讯拷打“犯人”。监狱墙上,有先用红漆涂写、后又用人血描摹的“红色恐怖万岁”6个血淋淋的大字,阴森恐怖至极。这所监狱先后打死过3人。四中红卫兵则将教工食堂改造成“刑讯室”,食堂连接一个很窄的小巷,十分隐蔽,外面听不到受刑者的号叫。一中的劳改所是由菜窖改造的,在那里打死过13人。此外,二十五中的“教育室”、十三中的“红色刑讯室”等等,名称不一,性质相同。

学校之外也有监狱,最著名的是吉祥剧院和东安市场(当时改名东风市场)。凡各校红卫兵抓到的“牛鬼蛇神”,想让他们死、自己又下不了手的,都可以送去。

“劣等血统”的人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那种恐怖与痛苦,经历过的人无不刻骨铭心。

错失挽救的时机

在疯狂的“红八月”,曾经有过几次阻止事态恶化的努力,可惜都被否定了。

第一次是8月6日。在天桥剧场关于对联的辩论会上,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红卫兵发出《紧急呼吁书》,呼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

严格制止乱打人。”尽管他们的矛头主要指向打红卫兵的所谓“流氓”,但也对打人的红卫兵进行了婉劝。康生当场表示赞扬。据穆欣讲,王任重把《呼吁书》送给周恩来,建议公开印刷,广泛张贴。周又呈送江青、毛泽东。大家都圈阅后,由陈伯达批交“文革”小组办公室印发。当穆欣印好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散发时,却遭到江青和毛泽东的反对。穆欣分析,原因可能是《呼吁书》和会上正遭批评的“中央八条”精神一致。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10万人的大会,把凶手捉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

第二次是红卫兵冲上社会之后,毛泽东找吴德听取“破四旧”情况汇报。吴德说:

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其实,类似毛泽东的想法,在高层领导中普遍存在。

一位副总理对农业大学党委指示:“要青年学生闹一闹,因为自1949年解放以来,城市就没有大闹过。不大闹一下,怎么能把那些坏人清出来呢?”

另一位副总理对粮食部人员谈话说:“解放十几年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服气的。这次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一起来,来个横冲直撞,又打、又斗、又抄。这次资产阶级服气了(虽然心里有些不满),资产阶级才真正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

一位老师在接见13个艺术院校、团体师生代表时说:“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党,骂我们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这一会小将们就把他们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

倒是林彪的说法，貌似附和，实含暗谏，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那时候已经“打死人”了。

第三次，吴德是这样说的：

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70多人……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发出去，当天夜里2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

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此段记述时间有误，1967年春北京没有打死那么多人，而且吴德接着又说：

“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直到11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

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是1966年11月18日发出的，通告严禁私设拘留所、私自抓人拷打。1967年的死人事件不可能1966年发通告制止。从火葬场烧人的情况看，吴德说的应该是1966年8月下旬的事。

《重要通告》发出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的人分别到六中、东安市场等地取缔私设的监狱。据戚本禹讲，他带《解放军报》记者连夜赶到东安市场，那里还在打人。一个“女流氓”被鞭子抽得血肉横飞。鞭子是用铣床旋下的铁丝拧成的，一鞭下去，白肉都会翻出来。他们命令红卫兵放人，“牛鬼蛇神”都跪在地上喊“毛主席万岁”！事后，军报记者曾写一报告，拟送呈毛泽东。陈伯达看了说：“太阴暗，不能送。”就压下了。

祸起栏杆市

把“红色恐怖”推向高潮并直接导致大兴事件发生的关键，是崇文区的栏杆市事件。记述此事的版本甚多，基本上分两种。

其一：

女十五中红卫兵在24日抄了李文波家之后，于第二天又到了李家开斗争会。李文波因对抄家、批斗、殴打不满，抄起一把菜刀乱砍在场的红卫兵。红卫兵因没有任何防备，被砍得鲜血直流。街道居民见此情景即上去劝解。急红了眼的李文波也不管是红卫兵，还是居民，见人就砍，其妻也抄起一把刀乱砍。砍伤7人的李文波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跳楼自杀，其妻被押送公安机关（公审后被枪毙）。

关于李文波之死，红卫兵是这样记述的：

李文波用菜刀砍了红卫兵之后，从楼上跳下来，义愤填膺的群众捉住他，拳头像雨点一般打了下来，这条老狗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其二：

1998年一篇署名“鸿冥”的文章，记述了当年到李家“破四旧”的一位红卫兵的回忆：“栏杆市那个小业主和他老婆，其实很老实、胆小。那时我们才上初中，年轻不懂事，三伏天把他们夫妇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老太太憋不住了，硬要下楼，被我们推倒还踢了几脚。那老头一看急了，下楼理论，我们用棍子揍他，一打流血，他急了抄起了菜刀，把我们吓跑了。实际上谁也没有砍谁，我们说他反攻倒算，也不知道怎么，后来就变成说他杀了人，把他给枪毙了。”

李文波的老婆刘文秀被押送公安局后，红卫兵要求大会批斗，并扬言要当场打死。周恩来阻止了这个大会，而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9月12日判处刘文秀死刑，同时也判处已死的李文波死刑。次日刘被处决，判决书是66中刑反字第345号。“文革”后，1981年3月26日，同样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又宣判刘文秀无罪、李文波不予起诉，判决书是81中刑监字第222号。同一法院，两种判决，个中隐情，耐人寻味。

然而，在红卫兵被最高领袖捧上云端，整个社会都沉浸在红彤彤的革命气氛中时，一个小业主竟然对红卫兵舞刀，这不啻是惊天大事。无独有偶，当天师大二附中高三（一）班红卫兵去抄反动学生曹滨海的家，双方发生争执，曹用菜刀砍伤一个红卫兵。曹被抓进公安局，曹母被带到学校活活打死。一时间“牛鬼蛇神、狗崽子翻案”的喊声响彻京城。

首先惊动的是高层,第二天,周恩来在北京红卫兵代表大会上说:“昨天我们有的红卫兵被坏蛋刺伤了,我们心里很难过,想怎么办帮助你们。”

8月26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讲:“刚从中央开会回来(看来中央专门为此开过会),讲几点:我们要保卫红卫兵,反革命杀了红卫兵坚决要镇压反革命……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打死了也就算了。”

在几个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谢富治插话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的吧?”谢答:“如果你把打人的扣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8月26日上午,在清华大学西操场召开北京“红五类”子弟大会,“声讨反革命分子杀害红卫兵的滔天罪行。”会后,各校都开始行动。

农大附中开大会,“红卫纠察队”把131个出身不好的同学拉出会场毒打。皮鞭抽、棍子打、皮鞋踩……边打边喊:“叫你们这帮狗崽子尝尝无产阶级的火药味。”

最恐怖的还是栏杆市地区,一批批红卫兵乘坐专门调派的公交车从各处赶到这里,对这一带的“牛鬼蛇神”大打出手。一连几天,大量的人被打死。

新风霞曾撰文说,8月26日到8月28日,是北京打全堂的时候。她听到一个红卫兵说:“今天北京市全面开花打全堂(牛鬼蛇神)一个也跑不了。”

复仇的气氛迅速由城里扩散到郊县,终于引发了大兴“八三一”事件。

大兴“八三一”事件

如果说城市打杀的还是资本家、小业主之类的杂牌,那么郊县清理的则是地道的“黑五类”。因此,“红色恐怖”在郊县上了一个新台阶。从8月27日到9月初,郊县掀起打杀“黑五类”分子的狂潮,最严重的是昌平县和大兴县。

8月27日,昌平县公安系统传达谢富治前一天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要“把‘黑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有的民警就向红卫兵组织

介绍了当地“黑五类”分子的情况,同时也讲了谢“打死人我们根本管不着”的讲话精神。于是昌平县开始行动了,由最初的打杀“表现不好”的“黑五类”分子,发展到消灭一般的“黑五类”分子,直至乱杀家属。十几天时间,全县24个公社就有14个公社打死人,总共打死327人。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在中越公社和黑山寨公社。

8月27日,中越公社派出所负责人召集公社副主任、武装部副部长、派出所民警和红卫兵负责人开会,布置“扫四旧”。会上宣读并印发了西城纠察队“以血偿血、以命抵命”的传单,决定全公社统一行动。当晚,燕丹砖厂声言有人搞反革命暴动,打死4人。派出所负责人赶赴现场表示支持,并说:“现在公安局打破旧框框,群众说了算,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28日、30日,公社两次召开电话会议,逐村公布打死人的数字,宣称“‘破四旧’进展顺利,打死‘黑五类’大快人心”。回龙观行动不力,会上受了批评,于是连夜打死30余人。到9月6日为止,全公社共打死144人。

闻听中越公社打杀“黑五类”,黑山寨公社公安员分别到黑山寨、辛庄两村和黑山寨中学游说,说“红卫兵打坏人没事”,“中越公社一个砖厂一夜就打死十几个人。”8月29日晚,黑山寨大队在中学操场打死“四类”分子2人。有教师问:“这样做符合政策吗?”公安员答:“怎么不符合?对地富可以武斗,这就是当前的政策。”同一天,经公安员批准,辛庄大队打死9人。随后打杀之风蔓延到望宝川、南庄、北庄等大队。打杀中提出了“斩草除根,留女不留男”的口号,因此几个月大的男婴也被打死,妇女则被逼改嫁他乡。到9月4日止,全公社共打死67人,其中未成年的孩子18人。

大兴县的打杀也是从传达谢富治的讲话开始的。县公安局根据讲话精神和市局“支持红卫兵,保卫红卫兵”的指示,在局务会议上决定,由治安科副科长张某负责联系红卫兵。

8月26日下午,张某在县公安局召开会议,参加者有河北农大园林化分校(简称林校)、黄村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和黄村镇镇长、黄村派出所民警等共九人。会上张某介绍了27家“四类”分子的情况,并分析了人都在家怎么办,家里没人

怎么办,家里有人外边还有人怎么办。成立了指挥部(设在黄村派出所),划分了战斗组。具体分工是:黄村中学包一、二、三街和高米店,林校包二、三、四街,定于27日下午3点统一行动。红卫兵问:“如果被抄户有东西弄不出来,打他行不行?”张说:“在气愤之下,打两下也没什么。”又问:“打死怎么办?”答:“打死就打死吧!”

8月27日下午,黄村开始“破四旧”,当天就打死2人。

同一天,黄村派出所指导员和公社武装部干部联合召开黄村公社各大队治保主任、民兵连长会议,指导员在会上说:“‘四类’分子不老实,打死就埋。要狠批、狠斗、狠打,打死也就打死了,先下手为强。”29日,黄村公社“文革”小组组织四个大队的红卫兵去李庄子大队打杀“四类”分子,公社管委会主任则亲自去东磁各庄大队点火。

杀人风也蔓延到芦城和天堂河公社。仅天堂河公社新立村大队就打死了53人。

到8月29日为止,黄村、芦城、天堂河三个公社共有14个大队打死人。

8月30日,天堂河公社马村大队治保主任又将全队“四类”分子及子女100多人集中关起来,设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个监狱。大队书记李恩元率十几人在大队部审问,随提随审,随杀随埋,一条龙行事。夜里11点,县委书记王振元赶到马村,在一小队猪场劝阻杀人,李恩元等根本不听。王回县委,在请示了市委之后,又带十几名干部赶赴马村。

马村的民兵在村外布了三道防线,严禁外人进村。县委的人9月1日凌晨1点赶到,冲了3次,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冲到村口第三道防线前。王振元厉声喊:“你们不让我们进村,就先杀了我这个县委书记吧!”民兵经过请示,这才允许他们排队进村。同行的张连和这样记述:

“全村被白色恐怖笼罩着,鸡犬无声。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我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捆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外运尸体……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有推出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锹,又装在车上运走了。”

王振元劝李恩元停杀,李把杀猪刀往桌子上

一拍,道:“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据吴德讲,最后还是市委派秘书长马力和卫戍区政委刘绍文、张益三去,才止住了马村的屠杀。结果是杀了34人,救出108人。

动手最晚但杀人却最多的是大辛庄公社。8月29日大辛庄公社“文革”组长胡福德到黄村串联,30日他搭乘县公安局张某的车回公社。路上胡问张:“打死这些人怎么办?”张答:“打死一个往市局报一个,市局也没有回信。”到公社吃午饭时,张某对公社干部说:“你们还等什么?等外援呢!”胡福德遂与“文革”副组长高福兴研究,决定当晚召开全公社17个大队主要干部参加的秘密会议。

会议由9人小组主持,胡、高之外还有公社副书记李自永、李冠清等。公社正书记贺云喜因为是地富出身,被9人小组关押着,也险些遭杀。会上制定了杀“四类”分子的计划,胡当场宣布:31日夜间10点半统一行动,是“拔尖子”还是“一扫光”,由各大队自己决定。最后要求与会者宣誓:严守秘密,不做叛徒。

31日夜,全公社有9个大队杀了人,公社所在地的黎明、中心、新生、宏升四个大队同时行动。高福兴亲临杀人现场督战,批评宏升杀得少(杀2人),表扬黎明杀得多(杀11户、56人)。是夜全公社共杀死110人。

从29日到31日,大兴共杀死324人(男232,女92)。被杀者,最大80岁,最小的才38天。杀死“四类”分子175人,家属子女137人,其他12人。涉及171户,有22户被杀绝。由于31日杀人最多,故后人称之为大兴“八三一事件”。

9月1日市委秘书长马力向全县做了广播讲话,市、县又向杀人的社队派了工作组,事态才基本上得到控制。

正是昌平和大兴的滥杀无辜,震动了北京市委和中央,“红八月”的恐怖活动才得以式微。9月2日,市委下达“紧急通知”,要求“用最大的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此后虽然还有打死人的事,但大规模的打杀风总算遏制住了。■

(作者为齐鲁书社原总编辑)

(责任编辑 黄钟)

救国会倡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 王国栋 王久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史称“西安事变”,也叫“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为重大的转折点。“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时社会上的各界对此事件的态度极不相同。在史学界长期流行的观点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是中共延安赴西安谈判的代表以民族大义为重,最早,或者说首先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治主张,为此蒋介石才得以被释放。

如早在1951年6月,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一文中就提出:中国共产党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应当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因此蒋介石被释放了,国内的和平乃得以实现。

此后,关于中共方面最早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观点就流行起来。

那么,历史的真相是怎样呢?

事实上,如果从当时政治社团公开发表的政治观点看,最早旗帜鲜明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政治主张的社团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又简称“救国会”)。

这个事实,也可以从历史的记载,特别是由“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办的机关报——《救亡情报》1936年12月18日的“西安事变号外”上得到证实。

至于中共赴西安谈判代表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主张,从当时的政治社团公开表态的时间上看,绝不能说最早或首先。

《救亡情报》是当时全国救国会的机关报。最初由当时上海文化界救国

会、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和上海国难救国会在1936年5月6日联合创刊发行。1936年5月31日,在上海开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决定把《救亡情报》作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的机关报。

1936年12月15日,救国会通过《为当前时局紧急宣言》。12月18日,《救亡情报》以“西安事变号外”的形式,在最显著位置发表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当前时局紧急宣言》。最早地、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迅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治观点,并强烈呼吁,西安方面应该立即释放蒋介石。

宣言明确提出:我们要求当局尊重全国的民意和平解决陕事;同时要求张杨诸将军立刻恢复蒋先生的自由和中央凯切磋商,实行抗日大计。



《救亡情报》1936年12月18日《西安事变号外》

宣言还呼吁：对于当前的局势，我们只有迫切地希望全国各方实力派，各军政领袖，在抗战救亡的大前提下，立刻捐弃前嫌，和衷共济，为全国抗战而努力，为收复失地而奋斗。我们尤其希望政府当局对于陕事，能谋迅速和平的解决，实行抗日救亡的主张，希望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一面恢复蒋先生等的自由，一面率领东北和陕中健儿，驰赴绥远，援助我晋绥将士，用事实来表示收复失地的主张。

而“西安事变”发生后一直到了12月19日，中共中央才正式发表声明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的主张。在这以前，在12月12日上午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政治局会议上，由于党内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发生两种对立的观点，故当时的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对策是暂时不发表公开的宣言，其策略是由中革军委将蒋被扣的事通知各军团，令各军团加紧准备，待命行动。

另外，根据历史记载，“西安事变”发生后，延安最初的反应是欣喜若狂，人们燃放鞭炮，举行集会，一些在蒋介石统治下备受折磨的知识分子们要求处死蒋介石，或者把他交付审判。毛泽东在一次公开的集会上说：“蒋介石对我们有血海深仇，现在是偿还血债的时候了。”他的讲话受到欢呼。

1936年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5人，发表了《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但其主张也是建议南京政府：“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的信中仍是称：“蒋介石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直到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接到西安谈判的代表周恩来首先提出的“保蒋安全”方针电报后，才在1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做出了《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才明确地提出“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如果抹去历史的尘埃，仔细阅读1936年救国会主办的全部《救亡情报》，还可以发现，该报不仅真实地记录当时中国知识界精英人士对“西安事变”时局的看法，最早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

变”，而且在抗战初期最早提出建立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也是全国救国会。

对于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虽然早在“西安事变”发生前，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并首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但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一直处在被国民党围剿的地位，所以“抗日救国的人民统一战线”（或称人民阵线）中，始终是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

而有着数十万会员的全国各界救国会早在成立初就认为，抗日救国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大事，不是一党一派所能包办的，所以主张全国各党各派各方面联合起来，组成广大的民族救亡联合战线，共同抗日救国，即：“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不问他是什么党派，什么阶级，什么信仰，只要他同意于抗战，我们就该摒弃一切私见，停止一切内争，团结起来，动员起来，建立铁似的民族救亡阵线，向我们的敌人进攻。”“我们民众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偏好，我们所拥护者为抗日救国，我们所反对者是不抵抗。”

在《救亡情报》的“西安事变号外”上，救国会执委马相伯等发表《为七领袖被捕事件宣言》，声称：救国阵线绝不反对政府，恰恰相反，它是督促和支持政府抗日，如果政府能够抗日，它必然忠诚拥护政府。救国阵线并不袒护共党，恰恰相反，如果共党不能实行其共同抗日的纲领而欲以事内战，它便坚决反对共党。救国阵线决不鼓励阶级斗争，恰恰相反，它用全力促成各阶级的协调，因为在国难时间全国人民利害虽有不同，也只有相忍为国，才能保证整个民族对日抗争的统一步调。救国阵线要求停止一切内战，因为从任何方面发动的内战都只是消耗抗战的实力，而助长敌人的进攻。

很明显，这是建立在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各党各派的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由此可见，抗战初期在上海成立的救国会所提出的抗日民族救亡阵线，与中共在抗日初期提出的把蒋介石排除在外的人民阵线不同，它是广泛意义上尽量团结一切力量的抗日战线。这是因为在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时，如果建立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统一战线，是不能够实现全民族一致对外的抗日方针，当然此后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当“西安事变”刚刚发

生后,救国会就立刻提出了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立即释放蒋介石的主张。

实际上,当年的“西安事变”发生后,整个社会上并没有出现张学良和杨虎城所最初期望的“一呼百应,揭竿而起”的反蒋局面。虽然12月16日在事变地西安发生了数万人浩大的反蒋大游行,但其他地区和社会上的绝大多数阶层的精英人士,都没有发生类似西安的大规模反蒋活动和游行。就连苏联的《真理报》在1936年12月14日发表的社论中也指责“西安事变”“显有怪异性质”,说“汪精卫利用张学良抗日部队中的抗日情绪,挑动这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称“张学良部队的叛变无疑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而《救亡情报》的西安事变号外,也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当时许多社会知识阶层的精英人士如马相伯、何香凝、宋庆龄等人对时局的真实的观点,颇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当前时局紧急宣言》称:现在正是绥远抗战已经发动的时候,正是全国民众期待各党各派一致合作把绥远抗战扩大为全国抗战的时候,而在这时候,我们国内竟发生这样的空前事变,这以整

个民族的立场来讲,实在是极大的不幸。

张学良杨虎城诸将军提出的主张是联合各党各派,实行民主政治,团结全国力量出兵收复失地,而所用的手段却是扣留蒋介石先生,实行武力诤谏,这种不合常轨的办法,当然不能为全国民众所赞同。

这份宣言还表示:我们坚决地反对任何自相残杀的内战。……张杨诸将军如果想用武力来而轻启衅端、而置其抗日救国主张于不顾,那末我们不消说是坚决反对;同时如果中央当局想用武力讨伐的方式,解决目前的纠纷,那末我们也是坚决反对。……寇深矣,事急矣!当此民族存亡的最后关头……谁要掀起内战,谁就是敌人的奸细,民族的罪人。

1936年的《救亡情报》及“西安事变”的号外,由于历史尘埃的掩藏,虽然至今鲜为人知,但却客观地记录了当时许多政治社团及人士的真实观点和历史细节。■

(王国栋为苏州科技学院教授,王久战为石家庄铁道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黄 钟)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010-84608877

SW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请认准西门子听力集团授权证书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6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7号

注:请认准西门子标识/请详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服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苏监械广审(文)第2010040048号

储安平在《光明日报》当总编

○ 皮学军

储安平(1909—?)，江苏宜兴人。抗战胜利后主编过《客观》《观察》。1949年9月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4年8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56年春，中共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后，他被委任为《光明日报》总编辑。1957年4月1日，经各民主党派协商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宣传部的批准，在章伯钧的陪同下，储安平走进了光明日报社。

改进报纸工作

从现有资料看，储接手《光明日报》总编辑后的许多办报思想和胆量，与《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的支持和鼓励是分不开的。储安平在1957年7月4日“交代”：

4月1日上午9时，章伯钧陪我去《光明日报》，他在路上向我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希望光明日报以后多登一些人的新闻。他说，旧社会的报纸很重视人的新闻，现在一般报纸都不大注意人的新闻。他又说：“现在什么事情都集中在几个人身上，报纸上也就只见到几个人的名字，这样一个大的国家怎能弄好？”

此外，他还赞成少登教条主义的东西……到了报社，各部级主任都在欢迎我们，章伯钧说：“我把储安平同志带来了，他是一个作家，增加了《光明日报》很大的力量”。

章走后，储告诉各部主任：“我到这里来工作，李维汉部长支持我，是党让我来的，党是我的后台。”后来，他也在全报社的会上说：“李维汉部长曾对周扬部长说，以后有人要批评储安平，你要为他撑腰”。这说明领导上希望我们放手搞。”

4月9日，储在报社民盟支部会上说：“4月1日来时，心情很平静而从容。和大家相处如家人感觉为什么？是否胸有成竹？有人问我是否有

大政方针？是否拉了多少稿？是否摸了底？我却什么也没有……受党的教育要表现在行动中，并需以诚意待人，向人学习……希多监督我，减少错误。”“我有信心，但不可能没有困难，做得尽力，骂也不怕……办报就在风浪之中。若是符合事实，风浪也不怕，要登。”

1957年4月1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决定《光明日报》完全由民主党派来办，并撤销党组，撤出原任党员总编辑、副总编辑。储安平开始实际掌握编辑业务。

储上班的头三个星期，和94位工作人员交谈，了解报社情况，还没有马上主持报社的日常编务（仍由总编室主任高天负责）。一番交谈后，储发现大家有一个共同愿望，“希望我们的报纸在现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5月7日，储安平在编辑部全体大会上做了《关于改进〈光明日报〉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主要内容有：

①怎样把《光明日报》办成一张名副其实的民主党派报纸。储认为：“在新的政治形势之下，我们要更进一步要求把《光明日报》办成名副其实的民主党的报纸。”“我们的报纸今后应该完成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经常宣传党的政策，号召大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要经常反映民主党派成员及其联系群众的要求。”“在讨论中，大家觉得形势发展的快，思想跟不上。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来把它查检一下子。”

②关于加强新闻报道。储安平说：“旧社会的编辑记者每日必比报：比新闻、比标题、比编排。

旧社会报纸重视新闻,采访的记者如跑一天写不出新闻就回不得‘娘家’,几天跑不出新闻要撤职,而我们现在的记者半年不写新闻。我认为,我们每位新闻记者都应该是社会活动家,他们应该目光四射深入报道,他们看的要比别人敏锐。记者要有敏感,‘新闻遍地是,妙手自得之’。新闻写得好不好,新闻多与少,决定于新闻记者的才能,今后,我们的新闻绝对不能再有依靠新华社的思想。在我还未来报社之前,章社长曾经约人座谈报纸问题,郭沫若院长说:我们的报纸要减少共同新闻(具体指新华社新闻),要增加自己的新闻。”

③版面和专刊问题。储安平说:“根据同志们的意见,保留《文学遗产》《史学》《哲学》这三个专刊。上星期已停了《民族生活》《文艺生活》两个。《政法》《科学》《文字改革》也已经同意从6月起停刊。……停办的专刊,其中有一部分材料,可以作为新闻的,就按新闻来报道,可以作为文章的,就按文章来处理。”从后来的实践看,他在任总编期间(4月1日~6月8日),相继停办了《文艺生活》《科学》《政法》《民族生活》四个副刊。

④关于编排式样和编排风格问题。储主张学习《文汇报》对新闻的敏感、时间性抓得紧、采访新闻的活泼精神、有自己独家新闻的特点。关于文风问题,他认为“主要是长,工作报告、工作总结式的味道很浓厚。这也许是受了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影响吧。总是社论首先指出……社论指出……社论接着指出……或是×××说,×××最后说。缺乏人情味,使人看了讨厌。这种报道方式,必须受到排斥”。

此外,储安平还就加强新闻报道、组织机构、工作时间问题做了一些安排。但是,他明确指出“我们民主党派的报纸当然也不是反对党的报纸”。

主张“揭露”、“尖锐”、“批评”

储安平在主编《光明日报》之前,因担任过《力报》《中国晨报》《中央日报》主笔,主编过《客观》《观察》等,故对新闻特别敏感。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后,他对该报的新闻采编、社论撰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储安平喜欢“独家新闻”、内幕新闻,要编辑、记者“不怕闯祸”。那些揭发储安平的言论就间接地反映了这一点。

1957年6月15日,张友在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上这样揭发储安平:

他曾说“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就叫新闻纸,它就是报道消息的。”不管这些消息报道出去对人民有利无利,是消息他就主张报道。他曾对我们说过,现在办报最大的矛盾就是代表政府呢还是代表人民?因为有些消息政府不准登,而政府叫报纸登的东西,据说读者不喜欢。

同一天,高天揭发储安平时也说,储安平“否定报纸指导工作的作用,反对报纸宣传政策。认为不必管什么政策。他说: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消息,党和政府不许登。报纸‘代表群众’,党和政府同报纸在这点上有矛盾。”

6月22日,光明日报学校教育部的人揭发说,储安平主张“有什么就写什么,而且要尖锐”。在民革、民盟光明日报支部联合举办的座谈会上,区至培也揭发说,“储安平强调‘揭露’,‘有闻必录’,说是要把人逼到墙角里挤出东西来”。而张友在6月15日的揭发也说,储安平采取的具体方针就是“揭露,揭露,再揭露,揭露的越多越好,越尖锐越好”。他还说储安平曾讲过:“我们的目的就是揭露,分析改进是共产党的事情。”

对于国际方面的报道,光明日报国际部的人在6月22日揭发储安平,说他“曾一再强调高级知识分子不爱看我报国际方面的文章和文化消息”,“主张多报道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党的活动,直接采用外国通讯社的消息”,“少宣传共产党和工人党”。

至于储安平在社论方面的主张,在光明日报6月6日召开的一次民主党派实职干部座谈会上,储安平就说:“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写社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光明日报过去的社论,一种是教条,四平八稳;再一种是说共产党的好话,歌功颂德。批评监督的社论没有,要写批评监督的社论,必须社务委员会支持。光明日报的婆婆多,八个民主党派是八个婆婆,民主党派有几百个中央委员,是几百个婆婆,一个婆婆一个看法,就很困难。因此,必须社委会受权。在没有受权之前,只

能用个人名义写这方面的文章”。张友在揭发储安平平时也说：“他说社论不好写，说共产党的好话，已经说的很多了，不必再说了，写四平八稳的表态度的东西，是教条主义，没有人要看的。唯一可以写的是体现对共产党批评监督的东西……”

储安平也试图去实现自己的新闻主张。6月15日，高天在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上发言揭发储安平，说储安平讲：“《光明日报》让民主党派独立自主的办，这句话说得好。但我要看看究竟怎么样，看看我到什么地方就要受到阻力不能前进（做手势）。”“我要碰”，“我要扛一扛风浪，担一担斤两。”“我要看碰上多少暗礁”。高天还揭发，有人对储安平说，重大问题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联系，他回答，“我们是民主党派报纸，用不着”。

另外，储安平还说，中共开始整风后，“党号召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帮助整风，而报纸打不开局面。”当4月21、22日《人民日报》发了天津知识分子的座谈纪录后，《光明日报》的记者们“总算松了口气，《人民日报》开了头，我们就好开展工作了”。于是，储也准备派记者到南京、上海、沈阳、青岛、成都、西安、长春、武汉、广州、兰州、青岛11个城市去召集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开座谈会。要求“参加座谈的同志根据‘放’的精神，彻底敞开，畅所欲言地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和建议”。此外，还就邀请对象、座谈会题目、会前联系等作了灵活的规定。结果，截至“党天下”发言为止，共在武汉、上海、西安、兰州、沈阳、南京、广州、长春、青岛9个城市点了“火”，这后来成为储安平的“右派”罪证之一。

“抢新闻”

储任职之初，提出要“抢新闻”。1957年5月25日，他听到九三学社有一编刊物的朋友说，北大学生出大字报（5月19日开始张贴）。马上就打电话给报社记者潘文彬，要他去采访，稿子写成后，总编办公室主任高天不同意刊发，但他执意要登，这就是5月26日见报的《北京大学学生开辟“民主墙”》。

另一遭人非议的是关于“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的新闻。

5月6~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开

了一个座谈会，研究清华大学的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和民主党派基层党组织的关系。座谈会开始的第2、3天（即7日、8日），《光明日报》都在头版头条以“讨论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讨论民主党派在高等学校的地位和作用”的大标题，对会上发言作了报道。5月31日，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在北京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座谈会并在会上发了言。6月2日《光明日报》报道说：

本报讯 在高等教育部5月31日晚上举行的座谈会上，复旦大学陈望道校长说，复旦大学已取消了党委负责制，加强校务委员会，以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的最高领导机构。他认为这样容易发挥老师的作用，使党与非党干部打成一片，把学校办好。陈望道校长并说，因为复旦大学在这个方面比较有条件，中共上海市委也认为这个办法先在复旦实行较好。

此新闻和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都刊登在第一版上。第2天，储造访章伯钧时说：“从前《光明日报》不能独立办新闻，现在我们自己搞。我们要搞，就要搞和新华社不一样的！”“今天的‘光明’发了一条关于上海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谈取消党委负责制的消息。”章连说：“好，好。毛公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已经讲了学校党委负责制要取消的事情。上海先走了一步。”

但在6月4日，《人民日报》为正“视听”刊出了《陈望道和杨西光说：复旦大学没有取消党委负责制》：

本报讯 昨日正在北京开会的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就2日《光明日报》刊登复旦大学已取消党委负责制的消息，对本报记者说，光明日报的记载与我的发言有很大的出入，事实上并不是“复旦大学已取消了党委负责制”。我在高等教育部5月31日召开的座谈会上谈的是复旦大学加强校务委员会的问题。复旦大学的党、政领导人员为了加强团结和改进学校领导工作，经过党和非党的一些同志的商量，提出了关于加强校务委员会的作用的一些办法。这些办法正送请高等教育部研究，要经过慎重的讨论以后才能做出最后决定，实行这些加强校务委员会领导的办法以后，学校还是要由党委来积极领导的，怎么能说是已取消了学校党委负责制呢？

储见此消息后,即以电报询问复旦大学的卢于道,卢回电:“校委会制,复旦有此方案,但未实行。”

6月5日,《光明日报》登出更正文章《陈望道谈加强校务委员会问题》:

本报6月2日刊载了复旦大学陈望道校长谈的该校取消党委负责制、加强校务委员会的消息后,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本报记者于昨日(4)晚上八点多钟访问了陈望道校长,请他再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他说:本报所刊新闻与他的谈话有些出入,复旦大学加强了校务委员会,但党委制并未取消。陈望道校长说: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报告时,大家就提出了加强校务委员会的方案,起初由学校的党、政负责人讨论,接着又交给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讨论,经过反复讨论后,对这个方案作了一些修改。后来,我们学校各系也讨论过这个方案,并已经把这个方案送给高等教育部。这个方案规定,校务委员会是学校的权力机构,学校的很多重要问题都要经过这个委员会讨论,做出决定。现在我们学校的很多重要问题都已经交到校务委员会讨论,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不过,这是一个制度问题,关系很大,还要请领导上来做结论,不是某一两个学校可以单独决定的。

照穆欣等一些后来批判储安平的人所说,这是一条“杜撰”的新闻。且穆欣在他的书中,还直接引用了储安平在“党天下”言论后检讨中的一些自诬语言。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当年这个新闻还是有一点悬念的。这与陈望道的重新入党有关。陈望道是中共早期党员,曾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第一书记。后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式作风退党了。6月19日,陈望道又加入了共产党,不过到1973年8月才公开党员身份。据《太白之风:陈望道传》的作者周维强推测,当年陈望道谈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时,“他任校长的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这是遵行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



漫画家肖里 1957年6月为《光明日报》画的漫画草图:“戴着宗派主义眼镜的人”

或者说是服从党的决定;而他执行这个决定,是出于对治校的考虑:“这样容易发挥老教师的作用,使党与非党干部打成一片,把学校办好”。从陈望道的入党情况看,他在《光明日报》发表谈话前就已书面提出入党请求,而中共上海市委向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吸收陈望道入党的请示报告则是在1957年5月31日,即陈望道发表“取消党委负责制”谈话的当天,这比《光明日报》发表《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一文早了两天。因此,周维强说:“这恐怕是饶有深意的吧。”

为改版的组稿与“妙文”

“党天下”发言后,储安平积极筹备在6月10日对《光明日报》的改版。为组稿,他专门写了一封信,经总编室主任高天、秘书黄卓明看过后,印刷、亲自用毛笔填好后于6月3日发给武汉、南京、上海、北京、青岛、广州、山西等地民主党派人士、高校教师等100多位文化界名人:

……《光明日报》是各民主党派联合主办的报纸,它以民主党派和文科教学为报导的重点,它的主要读者对象是高级知识分子……我写这封信,就是请您给我们指导和支持。

……为了更好地响应并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两大方针,我们诚恳地欢迎您更多地利用《光明日报》来陈述您对于国家事务的各种意见。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预出题目。由各位先生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愿意写的问题。假如能结合互相监督的方针发言,更好。我们希望文章不要太专门……最好在三千字左右。

储虑及6月10日要改版,为能在短期内收

到几篇文章,遂在一些人的公函里亲自用毛笔附了一封短信:“光明日报六月十日改版,希能日内惠文一篇,以光篇幅,务祈赐允。”

附短信的人有袁翰青、金克木、杨人、钱伟长等。约稿同时,钱伟长把他夫人和周培源夫人合作发现的小品文《施氏食狮史》寄给储,希望在《光明日报》刊出。储即复信一封:“伟长兄:妙文真妙,下周可刊出。这样的妙文欢迎续惠。”

实际上,储和章伯钧都反对文字改革,但在文字编排上,章反对横排。据章诒和回忆,4月21日在章伯钧家见面时,章说:“改革汉字是懂语言学”,“我看‘光明’可以恢复直排,或者搞局部直排。”可据储安平讲,3月20日,他与章伯钧、萨空了见面时,章说“报纸可以考虑直排”,“毛主席也说过,要是想直排,也可以试试”,“即使不全部直排,也可局部直排”。这并不像穆欣所说的“储安平和章伯钧都反对文字改革、反对汉字拼音化、反对书报横排”。

至于说储反对文字改革,这缘于钱伟长寄来的《施氏食狮史》及为之撰写的《“拼音文字”能通用么?》的未刊稿。储将该文题目改为《公开征求拼音专家请将左文译成拼音文字》:

我们坚决反对汉字拼音化,因为汉字拼音化有很多缺点,不符合我国语言文字发展的特征。为了证明我们的意见,现在抄奉短文一章,要求公诸报端,大家欣赏。并且公开征求拼音专家将它译成拼音文字,看看究竟能不能诵读。

附短文:

施氏食狮史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氏适市,适十硕狮适市。是时氏视是十狮,恃十石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试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食时,始识是十硕狮尸,实十硕石狮尸。是时氏始识是实事实。试释是事。

但这未刊文章,后也被人说成是《一篇恶意攻击文字改革的未刊稿》。

作“党天下”的发言

当储正紧锣密鼓筹备《光明日报》6月10日的改版时,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

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放出了“党天下”的“惊雷”。

据储讲,5月19日去拜访罗隆基“是想谈谈今后各民主党派如何很好地帮助《光明日报》”。可无意中谈起了一些政治问题:

“罗隆基说,毛主席那天(4月30日)对大家表示,大家对小和尚谈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我听到罗隆基说毛主席征求大家对提意见,我就想到12位副总理里没有一个党外人士这一点,我问罗,这个问题能不能谈,他说可以谈。”

“毛主席在2月27日的报告中说,对于肃反问题打算全民检查一次,我因为看到报纸上鸣放座谈中反映一些肃反运动中的问题,所以那时我也赞成由人大常委会联合政协全国委员会检查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我赞成在肃反中有意见的人,可以列举事实报告人大常委会请求检查。我对罗说,假如要在人大发言,我想谈谈这个问题。罗说,这个问题可以谈。又说宪法里面的有些地方也可以谈。……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罗隆基有修改宪法的意思,而暗示我出来发言?”

储后又在《向人民投降》中说:“可是我没有勾搭上他,倒给他这个‘勾死鬼’狠狠地利用了一场”。章诒和也推测:“可以说,储安平的‘党天下’腹稿,正是在1957年5月19日的罗宅孕育出了原始胚胎。”储后来还交代:

“解放以后,一般地说,我很少在外面说话。鸣放开展以后,也很少讲话。九三学社及作家协会来邀,都未发言,多少采取逃避的态度。一则我对发言的积极性不高,二则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谈。所以统战部座谈会开了很久,我也一直没有去。5月30日上午统战部来电话要我去,我答应去,但说明不发言。下午听说6月1日还要开会,统战部彭处长希望我6月1日发一次言。我31日上午还在报社工作,31日下午在家写发言稿,那天下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没有外出。”

是否真的要作这么个发言?据和储共事的巴波回忆:“他说,他一再犹豫,冒不冒这风险,但他要看看有没有这个雅量?”于是,他在6月1日的座谈会上作了“党天下”的发言——《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须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份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6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的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

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子子小民都能融融乐乐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会上,马寅初听完后即用手拍着椅背,连称“Very good, very good!”。此发言见报的当天(6月2日),《光明日报》编辑部就有人拍着桌子叫好:“这篇发言顶得上8篇社论!”章伯钧也说:“储安平是个勇士。他对老毛和周公提的对中央政府人事安排的意见,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党外人士都有此看法……可我们这些党派负责人,谁也没有勇气和胆量把话讲出来。老储讲了,全讲了,而他不过是个九三的中央委员。”6月2日,储安平去看章伯钧,章表态:“你昨天在统战部的发言很好。”储说:“要谈就谈些大问题,放肆得很。”“现行政治上一些人,大都只谈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要些汽车、干部、房子之类,能谈大问题的人不多。”海外,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表示敬意”。香港《新生晚报》在刊出储安平发言全文的同时,用红色花边圈着几个大字“请注意近日特稿,储安平炮轰毛泽东”。香港《真报》在6月9日、10日连载《遥向储安平致意》一文,称赞储安平不失有良心有热血的一个操觚者,他的发言,确乎有“轻捋虎须”勇气。

很快,形势急转直下,“整风”转向了“反右”,储等一批“勇士”招致了全国性的批判。

自储安平任《光明日报》总编到6月8日辞职,仅仅69天!其9年后失踪,留下了“生死”哑谜。■

(作者为吉首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 黄钟)

潘汉年主持上海政法工作二三事

○ 吴 越

1952年7月,我从部队转业,回到上海,分配在上海市行政干部学校任教育干事。全校有10个班级,每班级大约200人左右。这个学校,为上海市各区各部门培养审判员、书记员、派出所所长、民政助理员、供销社主任直到商店售货员。学员来源很杂,有调干、有转业军人,也有新招收的失业知识分子,年龄从十六七岁到五十多岁的都有。校长是由分管政法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委第一副书记潘汉年兼任。

1953年,三反五反刚刚结束,当局决定在“上海市三反五反工人法庭”的基础上建立上海市法院,由上海市行政干校的师生参加清理积案和建院工作。我作为教育干事,也带领一批学员参加了。我的具体身份,是“处理积案办公室秘书”,分管“婚姻、房屋、债务”三类民事案件。我父亲抗战前是上海市特区刑庭的法官,抗战期间辞职当律师,解放后是上海市政协政法研究九人小组成员之一。他再三嘱咐我:千万不要经管刑事案件,因为当时有许多反革命案件,属于“职业犯”,个人并不犯罪,说不清楚。不参与其事,至少自己良心上过得去。

在此期间,我听过潘汉年多次讲话和报告。例如他说:法律是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所以法律必然具有阶级性。资产阶级法律,实质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是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说出来,而总是羞人答答地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谎言迷惑大众。历史上,王子犯法,从来就没有“与民同罪”过。我们无产阶级,就是要公开地、明确地宣布:我们无产阶级制定的法律,就是要为无产阶级服务。

基于这样的理论基础,他在上海市法院所推行的,就是坚决袒护无产阶级。具体地说,资本家和工人,犯了同样的罪,例如重婚罪,资本家的犯罪,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顽强表现”,属于阶级本性问题;工人犯罪,那是由于“受到资产阶级

思想的毒害”,本质是好的或基本上好的。因此,对于资产阶级犯罪,我们司法工作者,一定要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必须无情地给予严厉的打击,绝不手软,不然,就是丧失立场了;而对于工人犯罪,我们司法工作者,一定要满腔热忱地去帮助他、挽救他,不然,就是屁股坐到资产阶级那一边去了。执行这种理论的结果是:资本家犯了重婚罪,因为要严厉打击,所以一般都判三年至五年的徒刑,送到苏北去劳改,重婚的小老婆必须离婚,而且要分给她相当数量的财产。不服判决的,允许上诉,但是结果必然是加刑。理由是:判你三年五年,已经是“从轻发落”了,如果还不认罪,还不感恩戴德,那就说明你对自己的罪行毫无认识,结果必定是改判八年至十年徒刑,作为重刑犯送进提篮桥监狱里去了。而工人重婚,一般是教育释放,也就是在法庭上批评几句,最多骂他们几句诸如“丧失阶级立场”、“沾染资产阶级习气”、“给工人阶级丢脸”之类。遇见不服气的,也不过拘留十五天。因此二者的判处反差极大。

不过也有一条政策,那就是对于重婚案子,原则上是“不告不理”。因为解放前上海有小老婆的人很多,不单单是大老板、小老板有,就是一般的职员也不少。只要大小老婆“相安无事”,没人首告,一般大都采取“暂时不管”的对策。当时上海市法院刚刚成立,经过三反五反,纠纷极多,早已经积案如山,也的确没有这样的力量来过问。不过只要是大小老婆中有一个人出来首告,就必须“严肃处理”。不要以为这种案子一定是小老婆出来告,因为真正属于官僚、恶霸强占民女做小的事情,毕竟不多,往往都是男人花心,喜新厌旧,娶了小老婆以后,反而是大老婆受气被排斥,所以由大老婆出来告状的也不少。遇到这种案子,倒不一定非得把小老婆离掉,经过三方面协商,大老婆自己愿意离去的案例也不少。处理这种案子,有两个原则:第一,对女方一视同仁,离

婚以后分割财产，一般是三等分，每人一份；第二，对男方，如果是官僚、地主、老板，必须判刑，态度不好的，还要判重刑，如果是工人、职员、小贩，离婚以后，往往不了了之。

对于潘汉年这样的观点及这种处理方法，我当年就反对。认为这是一种阶级偏见，甚至是姑息养奸。我最反对的，就是“不服上诉必定加刑”这一条。判刑的前提，是犯罪。“态度不好”，不能成为加刑的理由。一个没罪的人被错判了，还要求他“认罪”，是不是太难了点？因为“无罪而不认罪”，却要因为“态度不好”而加刑，这叫什么法律？不论是资产阶级法律，还是无产阶级法律，恐怕都难以自圆其说吧？解放后那么多的冤假错案，不都是因为执行这样的高论而造成的吗？

在法院内部，和我持同样看法的，当然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当时的上海市法院院长韩述之，也不同意潘汉年的这种论断。韩院长是地下党员，解放前就是上海法院的法官，和我父亲还是好朋友。他曾经私下对我说：“这叫什么理论，法院应该是最讲理的地方，现在反倒最不讲理了。解放前是无法无天，解放后是‘有法无法’！”——意思是：解放后“天下是打下来了，但是没有法律可依，只能谁的官大听谁的”，不是法治，而是人治。

还有一件案子：工人领袖、共产党员王孝和被国民党法院判处死刑，1948年9月30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枪毙。执行死刑的刽子手，解放后并没有逃跑。他自己认为：当刽子手，是他的职业，他上班，就是开枪杀人。至于这个人是不是该杀，他不管，也管不着。因此，他自认无罪，虽然经常杀人，却没有血债，用不着逃跑。解放之后，只要还有法院，还要判处犯人死刑，当然还要用他。但是出乎他的意料，解放以后，他被捕了。而逮捕他的理由，就是因为他枪毙了王孝和。

关于这个刽子手有罪没罪的问题，当时的上海市法院曾经有过一次或几次激烈的辩论。我虽然不是刑事庭的人员，但是我至少知道这件事情。据说韩院长就认为这个人无罪。理由就是“杀人是他的职业”，他主观上没有犯罪动机，但是以转业军人为首的对立派，则认定这个人有罪，而且应该以命相抵。理由就是：“烈士王孝和，分明就是死在他的枪下，说他没罪，死也不服。”两派相持不下，最后请示潘汉年，批示是判处死刑，立

即执行。

这件案子的处理，不仅仅关系到一个刽子手的死活，而且是牵扯到对属于“职业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如何对待的政策问题。许多已经起义或投降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个人品质很好、参加过抗战、甚至本来应该是有功的人，也因为从属于国民党，都在“四二七”大逮捕中抓起来，关的关，杀的杀。例如二战期间从日本回国抗日、破译了日军企图偷袭珍珠港的密电码的民族英雄池步洲，就仅仅因为是“国民党少将”而被捕，连破译密电码这样的天大功劳也说成是“罪行”，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韩院长的这些话、这些观点，如果仅仅跟我说说，倒也罢了。糟的是他还跟许多人说起过，甚至在大会上表态过。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韩院长的“有法无法论”和“职业犯无罪论”终于被揭发，并且上纲上线地被批判，结果是划为右派，法官变成了囚徒，被送去劳改了。

无独有偶，1954年我调到北京，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事件”而引发的肃反运动中，有积极分子从我的照相本子里发现有一张身穿国民党军官服的照片，偷走之后送到人事科去了。其实那是剧照，如果我真的当过国民党军官又想隐瞒，我能不毁掉，还能堂而皇之地放在照相本子里？为此我挨了半年批斗，一定要我交代“失去了一段反动历史”，却又不拿出“证据”来和我对质。我十六岁半参军，参军前是个高中一年级学生，什么党派也没参加过，心里坦然。批判会上积极分子和我瞪眼睛拍桌子，我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为此落一个“态度不好”，把我的出入证搜走，在办公室里关了我半年。最后还是人事干部拿着这张照片到我老家向我的老师同学对证，“误会”方才解开，并立刻“解放”了我。

为此，结合1953年在上海市法院的所见所闻，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我对新中国的法制问题提出了意见，主张“健全法制，取消运动，党政分开”，这些意见，今天看来，当然都是对的，但在当年，这可是“取消党的领导”的“大是大非”问题。于是，我在“阳谋”中中箭了。

潘汉年主持上海市政法工作期间，也有许多成绩。他创造或他批准的“民事案件集体调解”，就是一种很好的工作方法。上海解放三年多，一

直没有法院,刑事案件都归军管会管,大小纷争的民事案件,都归派出所管,实际上是根本管不过来。所以上海市法院一成立,真是积案如山,如果一件一件审理,不但几年也审不完,还可能越审越多。加上当时没有成文的法律,同一类型的案件,有罪无罪或量刑的程度,很可能会因人而异。因此,采用集体调解的方法,的确能够做到“多快好省”。当时我们办案,绝不像今天的法官那样,只知道坐在办公室里看案卷,而是必须“深入里弄”走群众路线,访问当事人和邻里甚至居委会等许多人。先做到对每一件案子都“心中有数”,然后把同类的婚姻、房屋、债务等民事案件的当事人、证人、调解人(里弄积极分子)召集到一个大会场来,拿出一件典型的案件来,让全体与会者集体讨论、充分发言,最后总结归纳出一个当事人双方都能接受的条款来,当庭宣判,然后以此为样板,让同类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表态,如果同意或能接受,就一律以此案例为范例,一次性可以解决十几宗甚至几十宗同类案件,效果很好。

潘汉年上世纪50年代初在上海主持政法工作,可以说是有过也有功,而最后他自己却被他的高论所套牢:1955年4月,他由于“说不清楚”的冤案被捕判刑,在“对资产阶级犯罪分子绝不手软”的无产阶级监狱中整整坐了十年牢。刑满以后,和他夫人一起被软禁在京郊团河农场。当时我正在团河农场劳改,一天他在河边钓鱼,我偶然遇见了他。我叫他“潘校长”,他还说我“认错了人”。等我说出我原是“1953年上海市行政干校的教育干事”,他才挥挥手,叫我赶快离开,说是他的“警卫员”立刻就要回来,别给他找麻烦。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时候,他这个“上诉就是不认罪”的始作俑者,是不是还在想:千万不能上诉,上诉就是不认罪,就是态度不好,就要加刑呢?

我甚至还在想:他当年那些高论,也不见得就是他个人的创造,很可能是比他更高级的理论家的高论吧。■

(作者为中国法学会会员)

(责任编辑 黄钟)

编读窗

也谈瞿秋白遇害

2011年第12期,贵刊刊登了秦摩亚所写的一篇文章——《瞿秋白被害,谁之罪》。我读后感慨良深——终于有人站出来在这一类问题上讲真话了!

我的父亲赵品三,当时也是中央苏区留守人员,他原先担任郝西史红军大学(即中央红军学校)特科大队政委兼校俱乐部主任,他是红军第一个剧团——八一剧团的主要创建者,被誉为红军“话剧之父”,当时在苏区红极一时,几乎家喻户晓。红军长征前夕,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要他接替冯雪峰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兼工农剧社总社长。

据他生前回忆,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去外线西征的部队会演变成两万五千里长征,不再返回中央苏区,也并不知道留、走之间孰吉孰凶。如果是像某些人所持观点,留下就无异于送死,我父亲再忠于革命他也不愿白白送死,一定会要求随队远征,他当时是有这个条件的。他之所以留下,诚如秦摩亚所说,一是因工作需要,二是因身体状况,但首先是工作需要。当时,教育部系统和工农剧社人员除个别人外基本都留守了。《红色中

华报》也把主要人员和机构留下了,红军中有名的笔杆子,绰号“韩万言”的韩进,当时是《红色中华报》的编委,他就是留下来继续办报的主力。赵品三和韩进当时都在瞿秋白的直接领导下坚持工作并参加保卫中央苏区的游击战争,他们和瞿秋白朝夕相处,直到保卫苏区的最后一战——牛岭、磨盘山之战,部队被打散,他们还先后遇到腿部负伤的刘伯坚和瞿秋白、陈潭秋等领导同志,刘伯坚当时是由警卫员背着,他说自己挂了花无法突围,想办法到附近老乡家中暂时隐蔽疗伤,让赵、韩等人赶快离开此险地,突围出去;遇到陈潭秋后陈还给了他们一些钢洋;碰到瞿秋白时,瞿秋白嘱咐他们分散突围到油山去找项英、陈毅。

其实,当时的留守人员除秦文所说的之外,还有一些重要人物,如陈潭秋、刘伯坚、蔡会文、阮啸仙、贺昌等,他们都是当时的优秀人才和重要领导干部,而随队远征的也有一些当时认为的“政治上有问题者”,例如“托派嫌疑”左权、郭化若、危拱之、李伯钊等,还有一些是中央保卫局正在审查的认为不可靠的其他人员。

而且,参加远征的人员,其遭受伤亡的比例也并不小于留守者,湘江一战就损失过半,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邓萍、董振堂、方志敏、刘畴西等一大批中高级将领牺牲在了征途上。北京读者 赵于平

辛亥革命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陷阱

○ 袁伟时

辛亥百年,那么多人,说了那么多话,就中国大陆而言,可谓盛况空前。但有些问题,总觉得没有说透。

20世纪的中国,在辉煌或屈辱背后,包括胜利和失败的后果,是一亿多中国人成了非正常死亡的冤魂。任何国家,每次大革命都会产生重要的思想和学术成果。20世纪中国连绵不断的革命,至今没有得到彻底反思,仍然在等待巨著诞生。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中国史学家冲破意识形态枷锁,写出不少杰出的论著。应该以辛亥百年为契机,继续推进这项工作。面对这次革命的成败得失,史学家应该写一部悲怆的命运交响乐,让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公民永远记住前车之鉴。

愚意以为,妨碍我们如实认识百年历史的,是中国人尚未彻底摆脱革命史观或党派史观。

扭曲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不乏先例。1904年,孙中山为刘成禺的《太平天国战史》作序说:“汉公(刘成禺)是编,可谓扬皇汉之武功……俾读者识太平朝所以异于朱明,汉家谋恢复者不可谓无人。”以华夷之辨——反满为是非标准,谱写太平天国颂;于是,以极其落后的《天朝田亩制度》为纲领,蹂躏半壁江山14年的战争,成了维护民族大义的壮举。其追随者后来则有《陈炯明叛国史》,严重歪曲了历史真相。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后,这一传统披上歌颂革命的外衣,变本加厉。有些学者至今冲不破这副枷锁,等而下之的是继续修补乃至加固这副枷锁。

革命史观的核心内容是制造革命对象,神化革命力量,遗忘革命变革的根本目的是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人际关系,从而为国家、社会和人的发展提供牢固的制度保障。这种思潮在思想文化领域流毒很广。就辛亥革命研究而言,突出

表现在四个问题上:

第一、北洋政府及其施政被妖魔化,从而制造出一个巨型的革命对象

国民党要为自己的“护法”、“北伐”寻找根据,不能公正地评价北洋时代(1912—1927年)。

把北洋政府说成是卖国政府,是地道的党派语言。北洋政府在外交上卓有建树,是中国政府通过外交谈判收回利权的开端。华盛顿九国会议(1921年11月12日—1922年2月6日)收回了山东主权并为收回其他利权奠定了良好基础。王芸生先生在1930年代客观的评述和唐启华教授的研究成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西原借款、山东问题换文是卖国的吗?学术问题需要辩论。但是,秉着《大公报》“不党不私”的理念,守护学术良知,在“九一八”事变后全民激愤中,王芸生先生仍然客观全面地评价了上述历史。以西原借款来说:

“利息低,无回扣,无切实抵押,诚借款条件之优者矣。”

“盖以二亿巨资,一无切实担保,二无高息回扣,结果强半流为滥债,无怪寺内、胜田诸人受其国人之攻击也。”至于山东问题换文,涉及胶济路沿线日本军队撤离,民政、警备交回中国等问题。“此项换文在当时言之,比较于中国有利。然当时欧战大势显然属于德败,我为参战国之一,关于山东问题,自以留待媾和大会为得计。乃当时中国与日本有此一幕枝节交涉,资为日本后日在巴黎和会中之借口,亦憾事矣。”实事求是指出此事的得失,实际是一件工作的失误,而与所谓卖国无关。

惭愧得很,我们有些史家至今没有达到

1930年代的学术高度。历史学家如果跟在政治家屁股后面指摘北洋卖国，怎样回应他们的论述？

应该确认一个学术成果：这是中外关系正在走出划分势力范围向华盛顿会议体系转化的年代。

北洋派大体遵守了三权分立体制。1924年以前，中央政府的产生和更替，大体上遵循了法定程序。有些总统如徐世昌，内政、外交都卓有建树。

尽管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20世纪言论自由最好的年代。这是中国现代学术奠基时代。这是市场经济发威，经济持续发展的年代。

第二、孙中山仍然被神化，他的言论和实践没有在学术层面上得到客观、全面的分析

孙文是革命的旗帜。但是，同任何历史人物一样，他没有避开人们自由评述的特权。辛亥革命后他的思维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几个重大决策都是错误的。这是辛亥革命胜利的成果无法巩固的重要原因。

例如，发动三次战争。

不顾党内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发动“二次革命”，对巩固辛亥革命制度变革成果非常不利，也证明他是不成熟的政治家。“护法”违法，把国民党带入死胡同。“北伐”的结果是把肇始于广州的党国体制推广到全国。

这些不是偶然的失误，跟他的思维和学识的弱点息息相关。

1. 没有与专制思维划清界限

他说：“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应该盲从我！”

这样的论断首先与实际不符。同盟会有众多领袖为辛亥革命做出杰出贡献，而在同盟会外，立宪派领袖们的贡献也不容低估。

其次，必须有唯一领袖，不能离开某个人讲共和、讲民主的语言，出自20世纪的政治人物，只能证明自己还没有跳出专制统治者的思维羈



孙中山

绊，缺乏现代政治常识。

这不是孤证。他的生死不渝的日本挚友宫崎滔天写道：“孙先生的态度有这种味道：‘其他的中国人都不行，只有我一个人行，我是中国的救星，服从我者请来。’”

2. 对现代政党缺乏认识

1914年，他亲手制定的《中华革命党总章》，居然宣布“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而在1924年制定的《中国国民党总章》则规定：“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有最后决定之权。”这些都是缺乏现代政治常识的表现。

3. 对分权制约的现代政治不理解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黄宇和教授的新著《三十岁前的孙中山》有一重大贡献：直指孙中山向往德国俾斯麦的万能政府，他讲的“民权主义”、“五权宪法”，实质是香港殖民统治式的“万能政府”。

“孙中山属意的万能政府，其实就是集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选五权于一身的政府。大别于英国的行政、立法、司法等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机制。为什么孙中山属意这样的政府？归根结底是因为他认为这样的模式更有利于把‘一片散

沙’的中华民族团结和调动起来。”

这个论断是解开孙中山言论和行动的钥匙。笔者多年来一再指出孙中山对现代政治制度和中国传统社会都缺乏深切的了解。他指责中国人一盘散沙,自由太多了。现代公民本来是一颗颗坚硬的石头,孙中山眼中成了渺小的沙子。有了结社自由,公民社会就会逐步成长,公民就会显示自己的力量,而孙中山却宣称“中国人用不着自由”,念念不忘的是把中国人继续羁绊在宗族中。他认为“外国的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足为我们的师导。”

第三、掩盖革命派的错误

辛亥革命的两大成果是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实现了言论自由。人们充分肯定了革命派在赢得这些成果中的作用。但是,他们也是摧毁这些成果的主要责任人之一。

看看这个成果是怎样被摧毁的。

1.《临时约法》是民国初年政治混乱的根源

从政治层面看,它是革命派不成熟、缺乏远见和把握不了大局的产物。

A.动机不当。

冀图把战场上和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通过自己制定的文件夺回来。孙文当临时大总统,实行总统制。选出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立即改为内阁制。

B.制宪机构缺乏公信力。

首先,这些参议员都是各省都督府指派的。“从严格意义上讲,通过都督府指派方式产生议员的方式,并不是一种选举,它仅仅是一种行政任命。”这种方式还比不上前清资政院民选议员:“资政院民选议员选举由两个程序组成,第一步是‘由咨议局议员互选若干人,’然后才是‘呈请地方督抚,再由督抚遴选若干人送资政院。’南京临时参议员的产生则是一步到位,直接由各省都督府派遣。”

其次,这么一件大事,竟不让当选总统和拥有半壁江山、实力最强的北洋派参与。

C.程序不当。

这个宪法文件不是由已经宣誓就职的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签署公布,而由已经辞职的孙文签

署颁布。世界制宪史上罕有其匹。

从法律层面看,是宪法知识不足。

A.残缺的内阁制。早在20世纪30年代,陈茹玄在其《增订中国宪法史》中就指出:“盖纯粹内阁制有二权焉:一为不信任通过权,一为解散国会权……而《临时约法》皆无之,不可谓非《约法》之大缺陷。”

B.总统、总理职权分际不明。府院之争的根源在此。

C.没有违宪审查制度。

D.没有自由保障制度。

十多年的纷争根源在于匆忙制定这个水准不够的宪法文件,在制度设计上有严重缺陷。三权分立体制,一开始就在歪歪扭扭的轨道上运行。可是,史学家们坠入意识形态陷阱而不觉,仍在盲目歌颂这个文件!

与此同时,基于《临时约法》选举产生的第一届国会,大部分议员迅速腐化。这是理解民初许多重大政治事件的前提。为什么段祺瑞要和梁启超联手,废除原来的国会,重新召开参议院,再造一个新国会?一群贪腐议员连参战案都要一再阻挠。1923年曹锟贿选,就是这些贪腐议员登峰造极的表演。联省自治运动,无非冀图摆脱贪腐和分裂,缔造一个新的中央政府架构。

2. 毁灭三权分立体制、侵犯言论自由、侵犯财产权、扑灭公民社会都是从1923年的广州开始的

自1923年孙文在广州建立大元帅府并决定“以俄为师”后,与改组国民党同时,抛弃三权分立体制便成了既定政策。

独立的司法系统被弃如敝帚。例如,1923年11月,广州市公安局抓到一位据说是陈炯明属下机关派遣的“乱党”,“由吴局长亲自研讯。据供张谷荪,年二十八岁,香山人,直认附逆不讳。经于六日,提押东郊,执行枪决云。”过两天,如法炮制,公安局又将抓获的另五名所谓乱党,“押赴东郊,执行枪决。”接着,在11月16日该局又杀了四人。广东省银行行长程天斗侵吞公款380余万元,经孙文指定人员组成的特别法庭判处死刑,“以程天斗奔走革命多年,功在民国……力向大元帅(孙文)为之讨情。昨已核准,报效军费四十万,赎罪省释。”凭口供、不经法院审判杀人,随意

指定人审判,又随意放人;司法系统乱套了。

1924年4月1日,孙中山发布大元帅令:“大理院长兼管司法行政事务赵士北着免本兼各职。”赵士北为什么要下台?赵被免,乃因其声称司法无党,不明以党治国真谛。”三权分立、分权制约这些常识没有真正在他头脑中植根。临时政府成立之日,他就对总统必须接受监督不太理解。

剥夺言论自由,连国民党的机关报《广州民国日报》也未能幸免。1923年8月30日起就不得不停刊三天:“本报之停版为不服从某部委员之检查也……至某部固一国最高军事机关,人所望而生畏者也。”所谓“一国最高军事机关”,其实是大元帅府的军政部而已。

侵犯私有财产也是在孙中山亲自领导下在广州开始的。

首先,流动资金成了猎物。各种税收,一般在原有规定外,“附加二成”。保险公司的保证金是维持正常营业不可缺少的,广州市政厅却硬向每个保险公司“提借”一万元!

其次,肆意掠夺不动产收入。房屋通常是居民财产的主要部分。1923年11月8日,大元帅孙文向广州市政厅主席(市长)孙科发出第三四四号训令,要在强迫“捐租两月”的基础上,“令公安局于广州市内,再向各房东业主,借用租金一个月份。”

再次,干脆把居民或法人的不动产没收归公。1923年开始,广州发动举报“官产”,“其中有原属民业,亦被妄报者,以致群情惶惧,全市骚然”。更荒唐的是,把寺庙宣布为市政府的公产,“市内庙观寺庵,限十四天内准坊众僧尼备价优先承领,逾期开投。”

最后,国民党是摧毁工农社团独立性的先驱。例如:

“孙中山颁布了法令,工会召集代表大会必须呈请政府认可。此外,政府还有权撤销它认为不合适的工会领导机关的候选人,并将自己的代言人、甚至不是工会会员的人,安插进工会领导机关。”

3. 革命派是破坏段祺瑞挽救共和最后努力的主要因素

段祺瑞召开善后会议,是挽救共和的最后努

力。关税会议,司法主权调查会,则是维护国家主权的重大步骤。

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是五大势力(奉系、直系、皖系、国民党、冯玉祥的国民军)微妙平衡的产物。打破这个平衡的是苏联操纵下的国民党和冯玉祥联盟。

善后会议是挽救共和的最后努力,功败垂成。段祺瑞执政一年,含辛茹苦,勉强支撑,最终被两拳击倒:

一是1925年11月22日的冯玉祥、郭松龄签订密约,23日郭松龄举兵讨伐张作霖,24日冯玉祥发出通电,要张作霖“引咎下野,以谢国人”。一个月后(12月24日)郭松龄夫妇兵败被杀。五大势力的平衡打破了。张作霖认为中央政府被国民军劫持,对段祺瑞的态度急剧转变。

二是国民党蒙骗学生,以最极端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在北京成立国民政府等口号,冲击段祺瑞维护国家主权的每一项努力。奉系军队和国民军冲突造成的大沽口事件亦被升级为反帝大事。暴民街头政治——破坏官员住宅,火烧《晨报》,步步升级,直至酿成“三一八”事件。这一事件,段祺瑞政府当然要负责。但是,在谴责开枪者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清算那种极端思维和极端行动?

段祺瑞被击倒,张作霖的军政府和蒋介石的党国体制就接踵登场了!

第四、否定四民平等,丑化或美化不同阶级

革命总要有对象、动力和各种力量的排列组合。在革命者眼中,辛亥革命后,尽管新的制度已经建立,国民(士农工商四民)不是平等的,有意无意用各种理由丑化或美化他们。

“劳工神圣”

一个流行甚久的论断:“辛亥革命失败是资产阶级软弱不敢发动工农”。这是错误的假命题。

工农发动最好的是四川保路同志军。不过,第一,同志军在辛亥革命政权易手后,其成员大都顺利回乡务农,主要是哥老会的功劳。这个帮会早已成为当地正常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了,其负面作用也是众所周知的。第二,这里的革命进程

不见得有什么特异之处。

其他地方工农也发动起来了,可没有那么幸运。广东是个典型。广东是1911年11月9日“和平光复”的。上海《申报》1911年12月27日刊登了广东都督胡汉民给军团协会(民军的联合机构)的照会:“以后各民军如有不听号令、骚扰商民及剖尸取心、残贼人道等事,即由贵协会提出公布,不认该民军为正当之军团,与众弃之。似此办法,系为维持大局治安,保存民军名誉,在贵协会当有同情也。”上海《时报》1912年12月30日署名“达观”的文章《论平民政治与暴民政治》说:“就广东方面而论,从前缉捕、巡防营勇以剿匪之故,与绿林暴客结不解之仇。反正后为民军寻衅虐杀,剖肠剜心,饮血啖肉,惨不忍闻,目不忍睹。”

工农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和后果是因时因地而异的。辛亥革命前后,工农结合起来参与社会生活的主要方式是帮会、民团、土匪和手工行会等等。不要把多数工农品质淳朴与他们参与的社会组织的作用混同。流行一时的“劳工神圣”的口号体现的是民粹情绪,不是实际生活的纪实。同任何阶层一样,这个群体也是良莠不齐的。他们被一些政党推上政治舞台后,往往展现了令人震惊的破坏力。

1925年以后兴起的工农运动,也证实了上述观点。刘少奇以其亲身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他在1937年写道:

“1927年前,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的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每日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通的。……”

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发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停业与逃跑,物价的飞涨,货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的非难,随着这种左倾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

没有法治的约束,任何阶级的群体或个人都

会做坏事,显示他们的破坏性。“神圣”颂是不能随便唱的。

私有财产和工商阶层成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替罪羊

一个似乎是无可置疑的论断是:辛亥革命所以失败,原因在于中国资产阶级力量不够强大并且软弱。

环视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它们革命或独立之际,哪一个不是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国家?不能把政治家和政党的错误,说成是工商阶层的不是。

应该大声说:中国资产阶级是辛亥革命三大功臣之一。各省政权转移,宣布独立,维持社会秩序,几乎都与当地的谘议局和商会的作用分不开。

回顾20世纪,辛亥时期是资产阶级最强大的时期。它们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武装——商团,对国内外各种与自己有关的大事,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以上海为例,革命爆发前,那里已经有一个商人支配下的自治政权:1905年11月3日成立了由上海绅商组成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后易名为上海市政公所),管理上海的户籍、警政、消防、卫生、马路、电灯、税捐等等事宜。机构分为议会和参事会,后者为执行机构,并附设一个裁判所,裁判违警事件和民刑诉讼案件。俨然一个三权分立的地方政权!那些头头脑脑几乎都是商会的领导人,商会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商团。1911年11月初的上海起义,是在上海市政公所由公所的主要领导人李平书和同盟会的陈其美等共同商议安排的。商团是民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也大都听命。进入20年代,上海商会组织更是出面召开国是会议,提出了自己的宪法草案。

商会的自主性,是被国民党所谓“商人运动”所摧毁的。

应该把历史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关键是要冲破意识形态桎梏,从世界文明发展已有水平的高度去观察自己国家的命运。离开这个坐标,历史只能是一团乱麻,前路也无所适从。■

(本刊发表时删除了原文的全部注释)

(作者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 黄钟)

重温新民主主义

——“阶级革命论”复活的知识错误与政治迷失

○ 姚力文 刘建平

在前不久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回顾和意义阐释形成了一个宣传活动热潮。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媒体手段诸如“文献电视片”之类形式上有很大进步,但知识思想体系依旧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共产党成立的叙事框架中,论说“农民阶级”之“朴素”、落后和“资产阶级”之“软弱”、涣散,最后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带来“理想和希望”,称颂代表先进生产力、掌握先进理论的中国“工人阶级”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之胜利。这种“阶级革命论”的老生常谈,如果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毛泽东时代,或者在争吵雇工能否超过“八人限额”、可否允许私营经济发展的改革开放初期,听起来还算顺理成章,但在私营经济的总体规模超过国有经济、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大谈人民民主而回避无产阶级专政的当今,平时销声匿迹的“阶级革命论”突然大行其道,即使是“纪念史学”形式的阵发性复活,也不免造成一种异哉怪哉的气氛,仿佛中国总难以逃脱或万岁强权复辟、或无产民粹蜂起之类“继续革命”的符咒魅影。

从大张旗鼓地解放思想、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转折年代过来的人都明白,“阶级革命论”根本无法面对私营经济发展、外资经济进入的现实;并且,《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了“文革”前就已经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足见新中国历史上以所谓“不断革命”、“继续革命”名义发动的阶级斗争,不仅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政治动力,倒是以新错误掩饰旧错误的话语杠杆。

那么再往前,“阶级革命论”真的能解释中国革命的历史吗?这是历史学术问题,却经常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造成困惑。只有切实地回答这个问

题,才能为改革除咒去魅,为深化改革提供能经得起辩论、有知识的思想资源和有逻辑的价值论证。而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环节,需要把握住革命的话语权和历史的主导权之所以从国民党向共产党转移的事实逻辑,在解析中国革命的长周期历史经验和世界主流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一般规律中,重新认识“新民主主义”。

阶级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是现代政治原理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起草《共产党宣言》时,如此描述人类社会的阶级化和阶级斗争现象。他们分析了当时西方社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认为:由于无产阶级“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资产阶级积累了私人财富,但“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所以,无产阶级将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然而,马恩身后的西方国家并未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因为,在科学技术发展、民主政治进步和殖民扩张带来巨大利益的过程中,工人阶级逐步脱离马恩所见的“奴隶生活”并且“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了。甚至,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二国际组织,还因为各国工人政党一遇世界大战就纷纷放弃阶级革命,争相支持本国政府打“帝国主义战争”而破产。由此,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政治学规律有力地呈现出来,“阶级革命论”作为一种历

史知识范式失效了。

民族国家是从阶级国家转型生成的现代政治共同体。中世纪的欧洲处于教会和世俗封建主联合的诸侯政体统治之下,到16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而随着工业革命造就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要求建立反映新的利益结构的政治体制,理想主义、启蒙主义和激进的民主共和思想等符合中下层愿望的意识形态广泛传播,所谓“专制之下无祖国”的政治认同意识形成。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导致人民主权原则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人民转化为“法兰西民族”,认同自由民主政治的人都是其平等的公民,而自由民主制度给人民带来了政治归属感和身份感。这种新的政治共同体就是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说:近代国家的特征形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民族”即国民的总称,国家是由全体国民集合而成、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无论民族的组成是什么,公民权、大众的普遍参与或选择,都是民族不可或缺的要害。”“民族性”就是“公民性”,族群特性、历史渊源以及语言都与“民族”概念无涉,民族主义只意味着“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是全等的”。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现代民族主义政治的发展从原理上解构了阶级革命,大众民主、国家福利以及无产者的有产化使得工人阶级脱离“奴隶”地位,工人阶级不再等同于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西方衰落下来。

新民主主义的民族革命本质

西方的民族革命和工业革命造就了现代国家。它们以高效经济能力和强大战争能力,迅速把停留于农业文明时代的“阶级国家”征服为殖民地或瓜分成半殖民地。但殖民帝国压迫也刺激了反抗、救亡形式的“民族主义”政治自觉。中国清末的思想家如梁启超等人认识到:“惟民族的国家,乃能合其权以为权,合其志以为志,合其力以为力”;民族国家发达使其国民实力“充于内而不得不溢于外”,“求扩张权力于他地”便发展为“民族帝国主义”。“能由专制政体而进化于民族国家者,则能优胜;不能由专制政体而进化于民族国家者,则常劣败。”这种以民主主义为价值

共识的民族国家理想导致了辛亥革命。

但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虽然拥有三民主义理想,却没有打败清朝军队的实力,所以胎动中的民国因易手于前朝军阀而被转基因化为武人专制的阶级国家。恰在此时,同样不能顺利实现民族国家转型而阶级矛盾激化的俄国,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余韵而掀起阶级斗争高潮,取得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胜利。为了摆脱被西方国家敌视的安全危机,苏俄利用共产国际组织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寻求与中国革命力量合作,以建立反帝亲苏政权。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纲领是纯粹的阶级革命论教条:推翻资本家阶级政权,以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和私有制,在政治斗争中“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当共产国际了解到中国工人阶级“在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很小”、“革命精神远未培育起来”之后,苏俄转向联合拥有地方实力的孙中山,命令中共加入国民党。为此,共产国际发来电报主张中国进行“国民革命”,即国共合作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这是共产党从阶级革命转向民族革命的开始。然而,孙中山去世后掌握国民党实权的蒋介石防共、疑俄,国民党军官的地主、乡绅出身也使他们反感底层农民运动,所以他们最终背叛革命合作而屠杀共产党人,中国再次跌入血海深仇的阶级分裂。

共产党被逼上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也发生了混乱,要求中共从民主革命“无间断”地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于是,苏维埃政权宣布“土地国有”和“没收一切土地”,强行“共耕制度”以训练小农的“共产”观念,这种阶级革命严重脱离农民群众,损害根据地经济。即使后来对民主革命性质和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做出了确认,但“武装保卫苏联”口号下推崇“武装暴动”、追求“中心城市”的军事“大跃进”狂想不止,随着蒋介石基本控制大局而得以集中围剿苏区,更兼共产国际代表的军事冒险主义指挥,红军战败而被迫长征。直到共产国际在1930年代中期提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后,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才全面纠正“左”倾阶级革命政策,强调党要做“全民族的先锋队”,提出“人民共和国”目标,根据地也“更名改制”,陕甘宁苏区更名为中华民国特区,苏维埃

制改为民主共和制。

到1940年代,毛泽东、刘少奇等全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思想,阐明:中国革命是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而非“一党专政”的政府,在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制基础上”发展经济,“为实现民族独立”、“为建立民主制度”的革命,其之所以称“新”,是因为它不完全被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可见,新民主主义的本质不是阶级革命而是阶级联合的民族革命。毛泽东还表述为“以反对专制主义为第一”和“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这样,中国共产党经过流血牺牲之千辛万苦,终于摸索到世界历史主流的现代化道路,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则由于其坚持一党专政、个人独裁而被人民民主所动员的战争力量打垮了。

“阶级斗争”意味着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失败

20世纪是战争与革命的世纪。通过战争与革命,殖民主义统治被推翻,主权独立、民主建国的民族主义政治成为世界潮流。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阵营国家又根据斯大林主义进行剧烈的“阶级革命”,衍生出无穷尽的“阶级斗争”,一直到1990年代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是暴力专政或消极对抗的“内战状态”,在政治学的意义上,可谓从古代阶级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失败而成为阶级斗争国家的特例。事实证明,阶级斗争导致政治冲突不得和解、经济建设浪费低效、文化教育封闭愚昧,意味着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失败。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这种国家失败。毛泽东在生日家宴上以“全面内战”祝酒,由中央文革小组的笔杆子润色为“全面阶级斗争”号令全国,造成千百万人死难、入监、流放,知识学术惨遭羞辱、践踏,国民经济跌到“崩溃的边缘”。

那么,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人民共和”民族国家怎么变异成了阶级斗争国家呢?

从共产国际、斯大林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而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固然可谓“天经地义”。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根据民主革命的人民性和

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在革命胜利之际,曾经为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避免“左”倾社会主义革命冒进,设置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两道防线。作为意识形态防线,中共中央规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大量地发展公私近代化工业”,然后才能尝试“社会主义的农业”。毛泽东强调“不要急于追求社会主义化”,说:“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他赞赏刘少奇“对这个问题很有研究”,估计“大概要准备十几年”或“几十年的工夫”。作为政治制度防线,开国法统规定了民主联合政府的宪政体制,即以《共同纲领》为宪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立法,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政。毛泽东当时欢呼“民主联合政府万岁”,认为“全民族人民大众的革命”胜利后的民主联合政府是继续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朱德还表示:“人民解放军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最忠实的支持者,而在现在它就是新政治协商会议及即将成立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最忠实的支持者。”刘少奇批评“东欧搞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也要搞无产阶级专政”的想法是“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关于《共同纲领》只规定民主制度而不涉及“社会主义的前途”,他解释说:“中国共产党以一个政党的资格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其他各民主党派一起,“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忠诚合作,来决定中国一切重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将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最高威信而奋斗”,不允许任何人来破坏它。对于它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国共产党当完全遵守它的一切规定,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至于“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对这一“很久以后的事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很可以在将来加以讨论”。周恩来也说明:不写“社会主义”才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因为“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社会主义为“最好”之后,“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

总结起来,制止“农业社会主义”这种“反动空想”的两道防线,可以用刘少奇的话概括:“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所以,中共中央

把“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写入《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刘少奇还提出:共产党员要学习“议会斗争”。

但遗憾的是,这两道防线对于党内“宁左勿右”的强权习惯势力形同虚设。东北局书记高岗和华北局山西省委忧虑农民上升为“中农”后纷纷退出互助组有悖于“集体化方向”,主张采取行政手段动摇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推进符合社会主义的集体化。刘少奇、薄一波等领导人严厉批评了这种违反《共同纲领》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错误”;岂料,毛泽东认为农民“要自由”而不想搞社会主义,便支持高岗和山西省委,排斥刘、薄等坚持新民主主义、维护开国法统权威的意见,急促启动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意识形态防线告破之后,毛泽东指示其秘书、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召集地方部门负责人会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于1951年12月把这一未经中央会议正式表决的“草案”印发各地执行。在政治学的意义上,毛泽东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决策,既僭越了政协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立法权,又剥夺了联合政府的行政权,甚至破坏了党章规定的组织纪律,把自己的权威置于党中央和联合政府之上,废置了多党协商会议立法、联合政府行政的开国法统,也使党代会立法、中央集体领导的民主集中制变成潜行的个人集权制。改革开放时代邓小平所严厉批判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一言堂”、“家长制”、“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等等恶习,在毛泽东突破新中国宪政制度而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地层中可以找到重大肇始的印证。

更加可悲的是,毛泽东发动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很快遭到农民“退社”、“闹社”的抵抗,也不能实现增产、富裕的承诺,甚至反而酿成数以千万计人饿死的大饥荒。当党内的健康力量不能承受谎言政治的道德压力,以彭德怀、刘少奇为代表的党的高级干部前仆后继勇敢地提出批评时,毛泽东发动了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全面内战”,陷国家于“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深渊。

中国大搞“不断革命”、“继续革命”之际,正是战后世界科技日新月异、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

时期。垂暮之年的毛泽东曾经感叹:“解放这么多年,吃饭穿衣问题还解决不好,怎么向人民交代?”去世前他更忧虑:文化大革命这笔“遗产”,可能要在“血雨腥风”中交给下一代了。可见,毛泽东发动“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的阶级斗争,虽然在打倒不同政见者的意义上或可谓“从胜利走向胜利”,但他最终也承认其“马克思加秦始皇”主义的治国失败了。

中国改革的共同体政治学

古代的封建制和君主专制国家是等级制,相对于国民平等的现代民族国家,称之为阶级国家。阶级国家在未及“官逼民反”、被压迫阶级降到“生存条件以下”时,不会发生有组织的阶级斗争;但在现代“阶级革命”意识形态出现之后,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发生权力主导的教条主义阶级斗争,与古代阶级国家那种权力被动的原始阶级斗争相比具有持续性强、社会破坏性大的特征,故称之为阶级斗争国家。教条主义阶级斗争为祸之惨,正如革命老干部田纪云所言:“人民公社化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多。’过去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就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精诚建设尚不易成功,乱加祸害则必败无疑!到20世纪后期,阶级斗争国家普遍因为政治混乱、经济失败而实行改革,这种改革都首先从解构阶级矛盾、停止阶级斗争开始。比如,中国的取消阶级成分、平反冤假错案、划分土地让农民恢复“单干”式家庭经营等等。很显然,阶级斗争国家的改革是向共同体即民族国家再转型的努力,“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则使这种努力具有不可逆转的理性。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的改革虽然从一开始就有解构阶级矛盾、追求和解和谐的努力,但缺乏共同体政治学的理论自觉。究其原因,在于历史研究中的“宜粗不宜细”导致学术荒疏和知识错误,不能切实吸取建国后的“阶级革命”导致国家失败的教训,也不能真正理解新民主主义的成功经验和“民族国家”的意义。

知识错误则导致政治迷失。所以,尽管刘少奇批评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脱离人民”的“特殊阶层”、萌芽了“等级制度”而倡导政治改革的思想在其恢复名誉后重见天日,尽管邓小平在1980年就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构想,但具体步骤和实际措施杳无下文,反生出一些大谈中国人民“素质低下”故政治改革必须缓行之类疑似种族主义侮辱、权贵主义蔑视的言论。邓小平曾经忧虑:“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果然,1990年代以来,以权谋私、横征强拆从行政化发展到暴力化,这意味着阶级斗争时期被意识形态化的“等级制度”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受到解构,但经济利益化的“等级制度”则由于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而潜生、构造起来。于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腐败的严重困扰,贫富分化则刺激着越来越强烈的阶级话语叙事。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学者论证打着“改革”名义而顽固“反改革”的清政府逼出了“革命”,疑似心照不宣的幽默;而有媒体竟然把“告别革命情结”的呼吁塞进颂扬烈士先贤的华章,则实在是顾首失尾的笑话了。

正大光明的改革既无须“影射史学”,也不必文过饰非。在失败的辛亥革命之民族国家理想,与冒进的“左”倾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有一个辉煌的阶段——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是中国革命成功的本土经验性意识形态,是新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根据所在。把民族的价值限定于某个政治人

物的信念,在传统社会主义时代使中国得到了惨痛的教训。改革社会主义时代必须破除信念政治,重建人民民主的责任政治。因此,新民主主义不能不成为中国改革的历史经验参照与核心价值来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是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和对新民主主义价值的再发现。重温新民主主义,找到政治迷失的历史原点,将是中国重申改革思想,重振道德勇气,重建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的可能所在。而当务之急,则有必要按照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坚决、迅速地确保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以国家的法治权威从根本上遏止剥夺农民土地、大量制造“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犯罪,切实保障具有国家政治安全意义的粮食安全和农业安全。总之,一方面在重温新民主主义的反思中确立中国改革的共同体政治学,一方面以燃眉之急的紧迫感援引新民主主义开国法统,从而避免教条主义阶级斗争名义的政治失控或原始阶级斗争规律的社会爆破,使改革真正走上中国特色、追求和谐的民族国家化道路。这是从中国人民奋斗牺牲了一个世纪的历史经验取得知识觉悟的意义上可以确认的现代化道路,也是在文明融和的世界历史发展中能够体会的与其他民族共享人类价值与荣誉的全球化道路。■

(姚力文曾任刘少奇秘书,刘建平为中国传媒大学教师)

(责任编辑 黄钟)

(上接 61 页) 王朝的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失败?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日本由 256 个多元的小共同体构成的盟邦封建体制,与中国大一统的专制帝国相比,前者自主的小共同体的多元性、小规模性与竞争性,使这些小共同体具有很强的试错自主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日本明治维新的现代化成功的概率比中国要大 256 倍。

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有新思想,需要让不同的思想在百花齐放中为我们民族走出转型困局提供新启示与新智慧。中国面对着如此重大的现代化的挑战,如此落后的一个国家,如此人口众多的超级发展中国家,它在现代化转型当中面

临的矛盾复杂性及其困难的程度,均是其他中小国家所不可能有的,这样大的转型,单凭政府官员与执政者的个人理性能力是不够的,政治家个人无论如何聪明,也不可能仅靠在办公室里想主意就应对得了,因此,从社会上广泛吸收各种民间思想营养,就是应有之义了。

我衷心希望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能在未来十年里持续繁荣与活跃,只有这种民间文化活跃与公民社会的发展,才能为中国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奠定真正的基础。■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 黄钟)

我看宪政社会主义

○ 萧功秦

作为二十多年来中国当代民间社会思潮的一个观察者和研究者,我想对宪政社会主义思潮谈一些想法。

应该说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潮是一种最新的民间学术思潮,相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的自由主义,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出现的新权威主义,90年代中期出现的新左派思潮,以及本世纪初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来说,宪政社会主义思潮确实是民间思潮中的新品种,它的出现比较晚,却有着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它与其他各派思潮所主张的价值与理念有着比较广泛的共通点与交集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与上述六种思潮相比,这种新思潮具有最广泛的包容性和可接受性。

它和自由主义,同样都强调民主、法治和宪政,但是宪政社会主义扬弃了自由主义把西方多元制度简单“拿来就用”的简单化倾向。

它和新权威主义都同样强调秩序稳定,强调以现存的历史上形成的权威作为发展的杠杆,在传统秩序的连续性得以保证的情况下渐进地走向民主与现代化,但是它不同于新权威主义的是,它更明确地以社会主义执政党的话语概念来表述这些思想内涵,这就在社会主义现存体制下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与可接受性。

同样,宪政社会主义与新左派思潮也有价值追求上的相同点,它们都强调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价值,例如强调平等、公正与关注底层利益的价值优先,强调社会主义的终极关怀,然而,宪政社会主义否定并扬弃了新左派的回归计划经济乌托邦的文化浪漫主义,扬弃了新左派美化改革开放以前的毛时代的浪漫的政治幻觉。

宪政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相比,虽然同样也强调了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结合,但是它与民主社会主义也有很大的区别,尤其更强调中国

实现民主宪政的特定历史环境与初始条件,强调宪政社会主义与北欧民主社会主义背景与历史环境方面的重大区别。

我们可以通过宪政社会主义思潮与上述各种学术思潮的比较,看到这一思潮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与现实操作的可行性。

我特别注意到,宪政社会主义理论中,有一种很具有创新性的提法,那就是,它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公意性的政党”,把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各个民主党派看作是“众意性的政党”,并根据这两种政党的性质,提出公意性与众意性政党相结合而形成的复合性政党协商政治的理念。在“公意性的政党”执政施政层面,宪政社会主义主张以政策竞争来代替政党竞争,即经过党内政策讨论、政策竞争,筛选出两个政策团队由执政党推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进行公共政策竞选,竞争国务院的行政治权。这一做法既实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也实现了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对接,完成了“治权为民所赋”的民主授权过程。在参政层面,宪政社会主义主张多个“众意性的政党”在法团主义原则指导下适度竞争众意代议机构也即现政协的议席,享有政治协商也即民主审议权力。宪政社会主义主张以政策竞争来代替政党竞争,在保持执政党的独大地位的同时,又能发挥各利益集团与阶层有序政治参与所带来的政治活力。这种社会主义的多党政治,既肯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竞争,也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在民主宪政体制中的合法执政地位,同时可以扬弃转型国家中多党竞争型的民主政治的不稳定性与高成本性。宪政社会主义理论认为这种复合性政党协商政治可以作为中国未来选举性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构架。这些有创意的新理念可以开拓人们对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与政治民主化的路径选择的

思路。

宪政社会主义思潮只是众多并存的民间学术理论和民间思潮中的一个品种,由于这种学术思潮所具有的包容性,以及它与官方的意识形态理论较大程度的同构性,因此,当官方意识形态进行进一步的创新时,它无疑是迄今为止的不同学术思潮中最有可能成为意识形态创新资源的一种学术思潮。它可以提供许多有启示性的思想元素,来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进一步创新与发展的借鉴。我个人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理论除非不发展,如果要进一步发展,那么,宪政社会主义思潮对社会主义秩序的历史意义与社会现实需要的肯定,使它具有它的特别的优势。宪政社会主义所提出的一系列具有创意的理念,可以为实现从集权社会主义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的理论创新,为推进执政党的理论建设与改革发展,提供一些民间智慧与思想选择。

事实上,执政党在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先后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三个代表论、和谐社会论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所有这些意识形态创新与重大发展,都从民间思想中获得了智慧与启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宪政社会主义的学术思潮,与其他民间社会思想一样,可以为思想繁荣与百花齐放做出贡献。

另外我自己觉得宪政社会主义的学理厚度上确实相当值得我们肯定,华炳啸先生从1995年开始就在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到现在已经有16年的思想历程了,可以说某种意义上他是厚积薄发。

而且我还觉得宪政社会主义在吸收国际学术成果方面也确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宪政社会主义理论特别吸收了新共和主义、新制度主义、新现代化理论的一些学术养分。从新共和主义、新制度主义、新现代化理论当中吸收了合理的营养,非常有助于整个理论建构上的完善。新现代化理论中有一个观点,即认为比较成功的现代化,往往发生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里,即传统的制度价值在适应现代化要求的过程中,有一个在功能上不断适应而变迁的过程,正是这种结构,才能使变革更为稳定。宪政社会主义把这一思想运用来解释,为什么不能简单地抛弃社会主

义制度,宪政社会主义对于解释从传统的集权社会主义向宪政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论基础。在宪政社会主义看来,历史上形成的革命的集权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历史上形成的既定传统与价值,只要这种制度与价值能在功能上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就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从国际社会科学学术成果中获得丰富的理论与方法启示,也使这种新思潮具有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能力。

当然,宪政社会主义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例如,宪政社会主义一方面强调经验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强调顶层设计的重要性,前者是以经验主义为基础,后者则更多地强调了理性主义的原则,这两者之间如何和谐地统一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众所周知,面面俱到,完美无瑕的方案往往是难以操作的。

另外,顶层设计的适用范围有多大?在什么边界以内进行理性的顶层设计才是合理的?顶层设计如何避免变成又一种不自觉的建构理性主义的乌托邦式的工程设计?

又如,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一党执政的情况下,如何防止个人独裁,公意性政党能否避免成为某些特权阶层的利益代表者,多党合作制下的众意性政党如何能真正起到竞争性的功能而不是花架子?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在这里也提出来,一般而言,宪政制度是在历史上多元对峙的不同利益集团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契约边界的基础上形成的,而靠理性设计为基础的宪政,如果得不到民俗与不成文习惯的支持,也很难持久。在宪政社会主义的言说中,顶层设计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但以顶层设计为基础的宪政,很容易走向形式主义。那么,在中国这样的缺乏多元制衡的条件下,如何有效地走向真正有约束力的宪政?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宪政社会主义也会变成空洞化。这类问题一定还有很多,都有待于提倡宪政社会主义的青年学者们进一步思考与探索。

民间思想的活跃,正是中国多元自主试错能力的活跃与富有生机的体现。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经常谈到的一个问题是,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清王朝变革的失败的比较。为什么日本明治维新成功,而清(下转59页)

田纪云 1988 年谈通胀

。 丁龙嘉

1987、1988、1989 三年，是当代中国改革史上印记深刻、耐人寻味的三年。1987 年之初，力主改革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黯然退场。1988 年中期，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抢购风潮席卷全国。1989 年初夏，一场政治风波震动世界，另一位中共中央总书记落下政坛。

中国改革的初期，中共中央采取的政策是“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没有预设目标模式和实施方案，边实践边总结，通俗说法是走一步看一步。1984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但是《决定》并没有对这一目标做出清晰的界定，也没有对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做出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缺乏顶层设计，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可是，此后的当代中国改革，重点已由农村转向城市，范围已由局部扩展到全局，程度已由浅层走向深入，从总体上来说是由第一步进入到第二步。

由于当代中国改革的预设目标和基本路径不清晰，又由于决策层和执行层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缺乏知识和经验，所以中国经济从整体上处于传统的计划经济已被突破、新的商品经济尚未建立起来的状况。正因如此，经济的运行呈现为起起伏伏、颇不稳定。这其中，物价快速上涨、通货膨胀成为一个考验党和政府决策层的重要问题。

1984 年至 1988 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整个国民经济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但是，在加速发展过程中，物价上涨过大，通货膨胀加剧，1985 年发生一次通货膨胀，1987 至 1988 年又发生一次通货膨胀。这一问题，实际上在严重地威胁着改革与发展。

当时经济学界不少人怀着深深的忧虑提出了抑制通货膨胀的各种建议。但也有人提出温和通货膨胀无害的看法，这种看法对决策层有一定

的影响。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则是一位清醒者。他在 1988 年 1 月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就经济形势发表了讲话。讲话中，在以大量的事实和确凿的数字说明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发展，改革向广度、深度进军之后，鲜明地指出在社会中隐藏着“某些不稳定的、甚至很不稳定的因素”，预见到“今年的前景并不太光明”，指明“当前经济工作存在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物价问题”；田纪云分析了推动物价上涨的原因，提出了控制物价上涨的措施，告诫“从现在我们的家底来看，任何大的动荡都是经受不了的”。

当前总的经济形势是“形势很好，矛盾尖锐”。“形势很好”表现为：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发展，改革正向广度、深度进军。总之，1987 年的经济工作，是大步前进的一年、成就最为显著的一年

田纪云在讲话中认为，当时的经济形势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形势很好，矛盾尖锐。”

他首先说明了为什么讲“形势很好”。

田纪云指出，国民经济确实是持续、稳定、高速发展。

在农业方面，粮食实际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统计数字是 8069 亿斤。田纪云认为这个数字是低估的。他从四个方面说明了粮食生产的情况是好的。“（一）几个主产省的主要领导同志来说我那个数字是打了折扣的，有打 10 亿斤的，有打 20 亿斤的，也有打 8 亿斤的不等，把这几个主产地区的折扣加起来，实际产量就超过 8100 亿斤。（二）现在大部分地区的小猪价格上涨，而且涨的幅度比较大。小猪价格，一向是我们判断粮食情况的一个重要标志。凡是小猪价格落市

了,甚至挑到集市上卖不出去了,粮食情况就不好了,别看当时猪肉多了、卖不出去了,实际上是要出问题了。凡是小猪价格上去了,粮食情况就好了。这是我们多年农村工作的体验。(三)现在粮食价格,总的来讲是稳中有降,特别是玉米和小麦的市场价格,是下降的。(四)去年的收购任务完成得比较顺利,现在基本完成了任务,达98%,这比往年快。”田纪云又说明了棉花和经济作物的生产情况,“棉花比1986年多收购1000万担”;经济作物,除了糖

以外,普遍有较大幅度的增产,特别是油料。田纪云指出,农业的好形势,反映在农业总产值上(不包括二、三产业),比上年增长4.1%,而非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9.6%;反映在农村人均收入上,比上年增加20多元,接近30元,达到450元以上。

在工业方面,发展速度快,结构趋向合理,效益有所提高,利润比上年增长10%,上缴利润比上年增长2%,国营企业的工商税增长4%。

在外贸方面,形势是几年来最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人民币3000亿元,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27%,其中,出口比上年增长23.4%,进口比上年下降2.8%,而且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初级产品和农产品的比重在下降,再加工品和附加产值在增加,总之,成为中国外贸史上的一个大的转折。

在市场方面,人民币储蓄和市场零售总额双双大幅度增长,前者达到3000多亿元人民币,后者比上年增长17.6%,达到5820亿元人民币。

在财政方面,比预料的好。财政赤字可以控制在计划以内。货币发行比计划少14亿元人民币。

田纪云又指出,改革正在向广度和深度进军。这表现为:“以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中心的各种改革措施,正在深入展开,并且普遍地推广了劳动报酬同效益挂钩这样的分配原则,计件工资制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分配形式。当然对这样的一种分配形式也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现在



田纪云与费孝通在一起

看来它还是比较合理的,能够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至于将来是不是还有比它更好的形式,还可以在实践来探索。资金市场、劳务市场、生产资料市场以及住房商品化的试点,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而且试点的范围也在逐步地扩大。在外贸体制没有全面改革之前,我们实行的层层包干的办法,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我觉得去年外贸取得的成绩跟层层包干是分不开的。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金融体制的改革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不少地方建立了资金调节市场,专业银行之间进行业务交叉经营、资金互相拆借;有的地方搞了一些民间金融组织,这对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田纪云告诫说:“金融体制怎么改?第一,必须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二,必须考虑怎么样才能不失控、不脱缰。”

田纪云总的观点是:1987年,是经济工作大步前进的一年,是成就最为卓著的一年。

在大好形势下必须看到隐藏的问题和某些很不稳定的因素。当前经济工作中的问题集中表现为物价上涨。推动物价上涨的基本原因是改革措施带来利益大调整,从而导致投资规模和消费基金双扩大,最终形成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造成物价迅速攀升。今年,拉动物价上升的因素很



田纪云正在谈改革开放史

多很大很硬，而抑制物价上升的措施很少很不具体很软，前景并不太光明。物价上涨，是加快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田纪云在说明“形势很好”之后指出：“在大好形势之下，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隐藏着的问题，必须看到某些不稳定的、甚至很不稳定的因素。有些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也未必不会出点乱子，也不敢保证不出乱子。小乱子难免，大乱子就影响政局。因此，对这些问题不可低估，不可麻痹，不可掉以轻心。”

他接着观点鲜明地说：“我认为当前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物价问题。我们国家物价已经连续三年上涨了6%以上，1985年是8.8%，对此，部分地进行了补偿，各地不一样，但是都有一点；1986年是6%，没有补偿；1987年预计为7.2%；根据现在的预计，1988年将在10%以上，如果不采取相应的措施，10%也打不住。如果没有有力的对策和措施，就这么一个、两个的措施出台，我认为政治上未必能够稳定住，这些措施也未必能够顺利实施。”

田纪云强调要正视“物价涨势猛而又控制不住”这个问题。他说：“1985年以后，我们在价格改革方面没有采取大的动作，但为什么物价的涨势这么猛而又控制不住？过去物价上涨，下一道命令就可以稳下，紫阳同志过去也多次讲，‘物价

上涨怕什么，下个命令不就一下子稳住了吗？我们在1985年是曾有过这么个经验。但是现在不行了，去年我们下命令下得最多，你说没作用吧，也有一点，但是作用不大。1985年那时，我们还没有活到现在这样的程度，第一，供求矛盾还没有紧张到现在这样的程度，第二，改革还没有深入到现在的程度。现在，我们的改革已经到了相当的深度，你想回去也回不去了。我们现在实际上比苏联走得深，戈尔巴乔夫一被搞下台，说回去就回去，我们现在恐怕很难回去。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

深思的一个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分析清楚了，才能对症下药，才能采取有效措施。我主张对物价问题要分析一下，为什么过去一道命令说卡就卡住了，现在就卡不住？”

田纪云分析了物价上涨的基本原因。他认为，“近两年物价的上涨，是我们放权、搞活、承包等等措施的必然趋势、必经过程。改也好，放也好，活也好，包也好，给政策不给钱也好，最后归结到一点都是一个利益的再分配问题，都归结到扩大部门、企业、个人的收益。原来由国家控制的、统收统支的那一部分，经过这几年的改革，实际上来了一个利益大调整。这个利益的调整必然反映到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扩大投资规模，一方面是扩大消费基金，而投资规模中相当大的比重也要转为消费基金，这就造成需求的膨胀，而这种需求的膨胀必然反映到物价上来。实际上我们已经连续多年消费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总分配超过总供给”。“需求大大超过供给，矛盾越来越大”。

田纪云又具体分析了拉动物价上涨的七大因素，即广东进一步搞活，三角洲进一步搞活，上海进一步搞活，外贸改革，消费税出台，企业承包，集市贸易价格上浮。

他周详地分析了企业承包对物价上涨的拉动。他说：“对承包的积极意义不可低估，而且在目前也只有采取这么一个办法。但是也必须看到承包对消费的推动，对价格的推动。如果不信，请

大家看一下马洪同志报来的一个材料,就是北京市皮革厂厂长谈他这个厂的承包的过程:四次讨价还价,多少次由浮动变为固定,固定以后又没有了积极性,又再浮动,浮动后又固定,现在已经平均固定了四级半,高的固定了九级,下一步还是无路可走,又没有积极性啦。每一次讨价还价,国家都要让一块,当然他自己的积极性也要挖一块,而这块,企业和职工是倒三七,分配的部分是七。开始是浮动分配,第二年是固定分配,第三年就再加浮动,第四年就再固定。这个厂长现身说法,讲得非常具体,我认为有代表性。我这个观点可能是错误的,但要让历史来检验。我认为承包责任制这个形式确实是积极的、立竿见影的,但是决不能把它说得天衣无缝,决不能说这个办法万岁,那样的话我们改革就不要搞了,已经完成了嘛,还完善什么?内部机制不完善,没有制约,对消费和物价有很大的推动。推动物价是为了增加消费、扩大经营,最终还是为了扩大消费。如果这个厂长在一两年之内不给职工以看得见的实惠,这个厂长就根本当不下去、根本坐不稳。我们去当厂长,同样也是这样。所以,我认为,承包对物价的推动是不可避免的。”“不管谁怎么说,我对承包持保留态度。我认为,实践将证明,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及早地加以考虑,最终是要吃亏的。”

田纪云还对“收入的增长高于物价的增长,群众生活还是提高了”的观点进行了剖析。“我们可以说群众生活还是提高的,甚至说收入的增长高于物价的增长。但是,今年恐怕这个话说出来了。就是说是收入增长高于物价增长,那么这个收入水平也是高低不平衡的,有的很高,在喜马拉雅山上,有的很低,在约旦的死海里。收入降低了的、收入没增加的、生活水平没提高的,这些加起来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昨天讲是46%。这些人的忿懑,加上其他人的忿懑,汇集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气候,而且不是一个小气候,可能是一个大气候,这个气候也可能被人利用。”

田纪云一再对物价上涨的恶果发出警告。“如果物价波动太大、涨热过猛,其结果必然是为改革设置障碍,甚至使改革难以进行。”“从现在我们的家底来看,我认为任何大的动荡都是经受不了的。前一段已经做了一点实验了,抢什么,什么光,抢什么,什么解决不了,被单也好,棉织品

也好,衬衫衬裤也好,油也好,抢什么,什么经受不了。现在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家当。我们只要把银行储蓄的1/3即1000亿拿来向我们进行冲击,就足以造成大的动荡。”“如果物价上涨到两位数,我们能不能叫稳定经济?我们能不能安安静静地在这里开会?对此我有怀疑。”

田纪云始终认为,“物价的上涨,是改革、搞活、扩权的产物,是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他说:“如果设想,又要改革搞活,又要物价死水一潭、稳如泰山,我看谁也办不到。因为没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如何做到又要改革搞活,又要保持物价基本稳定,这是当前经济工作中面临的一个难点,又是必须解决的一个难点。这对我们来说,恐怕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物价上涨,既然是改革、前进中出现的问题,就必须用改革、前进的方法去解决,必须从完善经济机制方面研究解决问题的措施,要从下决心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坚决、有效地使农业生产出现一个新的生机,制定和实施改革措施的同时考虑物价,管理、限制生产资料价格,完善增收节支机制,对人民生活采取以“活”对“活”的办法,统筹内外销七个方面加以解决

田纪云认为,在改革开放中,在加速经济发展中,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会不断发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求我们用改革、前进的方法解决问题。

他从完善经济机制方面提出了解决物价上涨的七条措施。

第一,下决心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放缓速度。他指出,“我们的速度不要搞得那么高,我认为7%、8%、9%就是很高的速度了,如果我们连续若干年保持百分之十几的速度,过若干年回头一看,保险吃大亏”。

他说,“速度过高,就意味着对原材料的需求膨胀,就意味着必须多建厂、多投资、或者多进口,多进口就要多搞外汇,多搞外汇就要收购国内的东西去卖。苏联很愿意卖给我们飞机,我想

了一下,用我们的大豆换他一架飞机,不知道要用多少列车装大豆,要用多少冻猪肉。反正我们2000年要达到的目标,如果说提前个三、五年完成,是可以研究的。但是下个世纪50年代要达到的目标,一定要在2000年达到,是办不到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在这有限的生命里面只能干一段,就像接力赛跑一样,只能跑一段,这一段我们争取跑快点,为下一段多做点贡献也就可以了。想由我们自己跑完全程,这办不到。毛主席想跑完,想一下子进入共产主义,他不是栽了大跟斗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总结了这方面的教训,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后出问题,还会出在这上面。我们一搞一件事情,就想立竿见影,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警惕。可能我这个看法不对,但是我要讲这个观点。这是一家之言,我认为对。现在上面只要一说快,下面就要快马加鞭、层层加码。我们批评耀邦同志的错误里面有这么一条,我们在实践中可不要重复这个错误”。

第二,下最大决心,采取最坚决、有效的措施,使农业生产出现一个新的生机。他不无焦虑地指出,“这是保证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发展,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一个最根本的东西,我主张专题讨论”。

他要求国务院在1988年召开一次农村工作会议,因为“农村问题很多,大家对下一步的目标、方向不明确,对下一步的路怎么走意见纷纷”,国务院“总得有个比较明确的说法,大家才能有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他不无遗憾地说:“两年没开会了,也没有中央一号文件了,大家不知道农业第二步改革该改些什么。”

他同时要求,“在农业问题上舍得花点本钱,至少不要再挖农业”;“将来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委员会必须把农业放在一定的位置上,不能再是工业计委、项目计委了。”

他建议大城市的主要副食品供应一定要自己搞点规模化经营。他说:“如果我们这么大的城市自己一点自给的手段都没有,一点调节供求关系的手段都没有,嘴巴完全挂在别人的裤腰带上,完全受自然气候的摆布,城市供应永远稳定不了。”

第三,制定一切改革措施,必须考虑物价。他说:“负责制定改革措施的同志和负责实施改革

措施的同志都必须同时负责物价问题、市场问题、人民生活问题。不能只管拉屎不管擦屁股,拉屎和擦屁股要一致。”

第四,下决心、冲破一切阻力,管理生产资料价格,限制计划外重要生产资料价格。他说,“这要触动一部分部门和企业的利益”,“但这是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

第五,完善增收节支机制。

他指出:“增收节支只是讲一句空话不行,那样,既增不了,也节不了。”他建议财政部,“采取一点具体措施,不然,大家像割肉一样,今天割你一块,明天割你一块,你都认了,最后你认不了了,一下子暴露出一个大矛盾,还得把这个矛盾交给总理。”他又指出:“我们刚给各省动了手术,给他补了一点,过不了一年他又要求动手术,下一次再动手术那可就不好办了。据我了解,现在省里面很困难,想再从省里打主意来补中央的窟窿,至少两年之内是根本不可能的。广东那么肥,割一、二亿都割不动,何况那些穷得叮当响的省。中部、西部那些省有什么油水?我们现有1000多个县是赤字县,相当一部分县的工资要分三次发,这要在中央机关,早就闹起来了。”

他同时建议:税收要采取硬措施,杜绝偷漏税;要硬化资金税和个人收入调节税;财政方面要出台引导消费的措施,抑制高消费。

第六,对人民生活要以“活”对“活”。他针对“用调整工资的办法来解决人民生活以适应物价上涨问题很困难,这一步走不出去”的困境,建议“采取一些搞活的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第七,统筹内外销。他说:“我主张今年对关系人民生活的主要副产品、纺织品严格按计划出口,不准超计划,是不是要减一点,都值得考虑。现在国内市场太紧张了。至于进料加工,不限制,多多益善,国内原料出口要服从国内市场的需要。”

后来的实践结果如何呢?1988年通货膨胀高达18.5%。1989年春出现了北京政治风波。历史可供借鉴。但愿今人能从这篇讲话和这段历史中汲取一点营养,不要出现后人哀之而复哀之的现象。

(作者为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杨继绳)

1973年周恩来为何挨批

○ 金伯雄

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利用“批林整风”运动的机遇，尽力倡导批判极“左”思潮，深得人心。但是，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进行，不可避免地要牵连到江青。“文革”之初，《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出笼，曾经为“文革”鸣锣开道，江青更曾因有“林彪同志委托”而得意洋洋。而且，如果要认真深入地批判林彪，这就势必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因此，江青极力阻挠，毛泽东也不能容忍周恩来继续批极“左”。

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组集中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张春桥、姚文元甚为不满，说是“右倾回潮”，要批《人民日报》。12月5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因不同意张姚的做法，致函毛泽东，提出要继续批极“左”。但是毛泽东不同意。12月17日，他召见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点名批评了王若水，说还是“要批极右”。于是江青集团有恃无恐，寻找机会反击周恩来等老革命的所谓“右倾回潮”。

一篇内参文章惹了祸

1973年6月苏联的勃列日涅夫访美，同尼克松签订了《美苏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美苏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协定》《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核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等13个协定。

6月25日，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意见，约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时表示：“我们对美苏签订核协定等持怀疑的态度。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在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不丧失立场。”26日毛泽东看到周恩来的谈话记录后，赞同周恩来的表态，说“这下腰杆硬，布鲁斯舒服了。”

美苏会谈还在进行之际，周恩来就提醒外长姬鹏飞说，美苏关系问题是个大事，要注意分析、研究，提出看法。姬鹏飞随即指示美大司司长林平落实，林平召集主管美国的副处长张再和苏欧司主管苏联的处长田曾佩商讨、研究后，由张再写了一篇调研文章，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6月25日刊登在外交部的《新情况》153期上。文章简要介绍了美苏会谈的情况并分析和评论了美苏签订协议后的国际形势，认为美苏会谈的“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文章最后指出，美苏两家欺骗不了世界人民，要想主宰世界也做不到。

《新情况》是外交部新闻司编印、评述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内部刊物，供中央领导和有关外事部门，以及外交部内部参考。

周恩来26日看到153期《新情况》后，觉得这篇文章写得不错，表扬了几句。当时美大司的人还挺高兴的。殊不知已经闯了“大祸”。

当毛泽东看到这期《新情况》后，对文章中提到的“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的提法，很不以为然，严厉批评了这篇文章。

7月3日，周恩来得知毛泽东的态度后，立即写信给外交部领导和美大司，主动承担责任，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并指示采取补救措施。外长姬鹏飞随即给毛泽东写了检讨报告。

7月4日，毛泽东没有找周恩来，却约来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以非常严厉口气，再次批评153期《新情况》，他说：

“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国“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我

看多少西移一点吧！”我“经常说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当时说的是‘乔老爷、姬老爷’，后来的正式文件上改为‘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上他们的贼船。”“凡是这类屁文件，我照例不看，总理的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引自《毛泽东传》和《周恩来的晚年岁月》）

在得知毛泽东这个谈话后，周恩来又在姬鹏飞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上加了一句：“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法有关。”

张春桥听到毛泽东的谈话后，当晚就打电话给周恩来，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谈话内容。7月5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检讨，并主动承担责任。当天周恩来将他的检讨和7月3日他给外交部领导的信一并上送给毛泽东。7月14日周恩来又主持写了《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15日送交毛泽东和政治局成员，并通报了中央各部门、各省市等。至此，《新情况》153号事件总算告一段落。

按常例，在供领导参考的内部刊物上发表的调研文章，如有不妥，指出就是。没有必要这样小题大做。但是这次，一个副处长的一篇调研文章，成了冲击周恩来和外交部的大问题。这是周恩来掌管外交以来第一次因为一篇调研文章而不得不反复检讨。

对这样一次意想不到的事件，人们自然会思考，为什么毛泽东对一位处级干部写的内部调研文章，竟如此严厉地批评？并且是避开周恩来，而首先找张春桥和王洪文谈这个事。原来，周恩来在美苏关系问题上的一些看法，同《对尼·勃会谈的初步看法》一文，不仅基本观点相同，而且一些语言表达也相似。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对美苏争夺与勾结问题的看法上是有不同的。但为什么借此来警示周恩来呢？更主要的因素是，毛泽东对周恩来在“批林整风”运动中不懈地批判极“左”思潮，纠正某些“文革”错误，感到不满和担心，认为周恩来“右倾”，担心“右倾回潮”，所以要敲一下警钟。

不久，新的更严重的事件又发生了。

误传周恩来对外谈话说错了话

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第六次访华。期间，周恩来和基辛格举行了多次会谈。

11月12日，毛泽东会见了基辛格。基辛格说：“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指苏联）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按毛泽东的理解，基辛格这番话的用意是，如果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而不是美国深感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这使毛泽东感到不快。因为这不合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分析。

在同基辛格的会谈中，周恩来都是按照事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的方针和口径谈话的，没有越雷池一步。但是，即使如此，仍然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11月14日凌晨，周恩来、叶剑英同基辛格举行了第4次正式会谈，商定了“会谈公报”的措辞。结束会谈前，基辛格试探性地问道：如果苏联准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加以摧毁的行动，中国希望美国做些什么？周恩来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至此，会谈已经结束，基辛格将在15日上午离华回国。然而，基辛格却在离开前几个小时，突然提出要拜会周恩来。这时，周恩来刚刚入睡不久，被工作人员叫醒后，他考虑不见不好。于是，他想用电话请示毛泽东，是否应基辛格的要求会见？他让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询问毛泽东是否已经入睡。对方回答：“主席才睡。服了几次安眠药才睡觉的，说什么现在也不能叫醒主席。”所以，周恩来没有叫醒毛泽东，决定按照毛泽东已经同意过的会谈口径，应邀会见基辛格。会见时，基辛格再次提出上述那个问题。周恩来则按照原定的会谈口径回答，此事需要进一步考虑，等以后再说，并强调一切需请示毛主席再作决定。这是周恩来一贯遵循的原则。周恩来的

上述回答在《基辛格秘录》一书中也得到了印证。书中的“会谈备忘录”一节写道：“周总理：而且因为这是一个十分具体和十分复杂的问题，在同你方协商之前，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但是，不知出于何种缘由，参与会谈的两名工作人员却认为，周恩来在会谈时说错了话，右了。毛泽东听了她们的汇报后，抱着对周恩来的某种错误的成见，听信了这种误传，怒火中生。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犯了错误，要求批评他们对美外交的右倾错误。

11月17日，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应召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毛泽东对这次中美会谈提出批评意见。他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他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批评周、叶。

当天晚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这次中美会谈的批评意见，并介绍了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自以为“倒周”时机已到，攻击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姚文元也从旁帮腔。周恩来忍无可忍，当场予以驳斥。

会后，18日，周恩来向毛泽东书面报告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表示自己在这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但是，毛泽东进一步指示：由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周恩来、叶剑英的“右倾错误”。除了政治局委员（当时与会的在京委员有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李德生、李先念、韦国清、纪登奎、吴德、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人）外，毛泽东还指定了其他参加的人员有：刚刚（当年3月）复出、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外交部的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和仲曦东，黄镇（时任驻美国联络处主任）；以及有关的翻译人员罗旭、章含之。毛泽东的联络员王海容和唐闻生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



周恩来总理 1965 年访问坦桑尼亚时与使馆人员合影

指示。会议就根据她们传达的指示，对周恩来进行批评。

政治局的会议，从11月21日到12月初，每天晚上，持续开了十几天。与会人员按照毛泽东（王海容和唐闻生传达的）指示，违心地或非违心地，发言批评周恩来。

会上，江青、姚文元攻击说，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他们还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泽东。会议的末了，江青竟提出，要求会议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报毛泽东。

在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年代，我党的政治组织生活本来就很不正常。这次最高领导人一发起，召开这样一次奇特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来批评国家的总理，实在是太不可思议的事。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曾经谈起过当时的会议情景。他在《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书中写道：

“‘这哪里是什么帮助总理啊？他们明明是整总理！他们是想要打倒总理啊！’说话的是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刚刚从大厅里端着托盘出来，将盘子往桌上一放，就边说边用衣袖擦眼泪，起先只是唏嘘声，一会儿抽泣起来了。”“我好不容易把这个抽泣的给劝住了，又来了更厉害的丫头……”

小赵。她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也是一面哭一面气愤地说:这个老太婆成天不工作,看电影,游山逛景。总理一天到晚忙着为人民。张大夫,你还不知道呢,他们白天睡觉,晚上来开会整总理。他们开完会回去,一起喝红葡萄酒庆贺干杯呢!”

“周恩来挨批期间,却由王洪文主持会议。周恩来在家等候通知去参加会议,不必再提前到会场去。散会时,他亦‘知趣’地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因为有人留在那里商量下一步对付周恩来的办法。”

这次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政治压力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与会人员都不得不发言表态。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道:

“会议中,与会者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对周恩来进行了批评,周恩来本人也进行了自我批评。而江青和张春桥等人却以为‘倒周’的时机到了,想借这一机会打倒周恩来。他们对周恩来进行了肆意诬蔑的批判。江青甚至危言耸听地说,这是继林彪事件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迫不及待要取代毛主席’。”“邓小平刚刚恢复工作,连政治局成员都不是,只是一个列席会议身份。在会上,他一直沉默,没有发言。在所有的人差不多都发了言之后,到了最后一两天,他发了一次言。发言一开始,他不得不按毛泽东对每一个与会者的要求批评周恩来。但寥寥数语之后,他即把话锋一转,开始讲怎样看待国际战略形势的问题。”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持续开到12月初的时候,毛泽东似乎感到,江青一伙要乘机“倒周”的用心。江青等提出所谓“十一次路线斗争”,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政治阴谋。无疑是要把周恩来打入王明、张国焘、林彪等人的另册。这显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他对周恩来的方针是:“批评一下可以,打倒不行”。

于是,毛泽东决定制止江青一伙的借题发挥。12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外宾之后,先后与周恩来、王洪文等人谈话。他说:“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不是总理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于江青提出要把她和姚文元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要

求,毛泽东明确指出:“增补常委,不要!”毛泽东的这番话表明,他既不能容忍周恩来持续批极“左”,也不容许江青一伙“倒周”。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批周”风波已经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了。

毛泽东这次谈话后的第三天,即12月12日,他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他说:“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毛泽东批评“政治局不议政”,显然是针对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军委不议军”,则是冲着“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的,但语气已有所缓和。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对这次“批周”的小结。

至此,这场颇为惊心动魄的风波渐趋平息,周恩来终于又渡过了一场劫波。

据权威人士说,由于中央档案部门没有保存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对于这个事件的历史,没有完整的档案记录。这似乎将成为一个历史空白!已经过去快40年了,许多当事人始终守口如瓶。现在只能从个别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中窥见一斑。一位参加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后来回忆说:“尽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一个被卷入的人能够蔑视权威,主张公道,但毕竟作为自我良心的剖析,我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而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事,伤害过好人。尤其是在周总理蒙受屈辱时,我们并未能为他做一点事减轻他的压力”,这一点感到“尤为沉重。”

但是,在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思维里,这样的“批一下”似乎只是“家常便饭”而已。

1974年的2月22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后,毛泽东问周恩来:“总理,你怎么样了?”周恩来答:“还可以。”“没抓好大事。”毛泽东接着说:“被人整得不亦乐乎吧?”周恩来笑着说:“没有。”“自己犯错误,刚才在汽车上我还说,抓大事不会抓,常常抓了小事。”

但是,江青一伙没有等闲视之。他们在随后的“批林批孔”狂潮中,继续影射周恩来,利用“评《水浒》”之类题目批“投降主义”、“卖国主义”、“当代大儒”等,矛头都是直指周恩来的。■

(作者为外交部退休大使)

(责任编辑 黄钟)

胡耀邦 1983 年湘西之行

○ 章发林

1983年2月15日清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乘专列来到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视察工作,虽然只停留了一天,但每到一处,他都向有关同志殷殷垂询,了解各方面情况,对一些疑难问题,发表自己诚恳的意见。

座谈会与迎春会

这天上午胡耀邦听取了州委州政府负责人的汇报。

胡耀邦首先问:“自治州主要有哪些少数民族?”

州委书记宁生答道:“主要是土家族和苗族,土家族九十多万人口,苗族有将近六十万人口。”

“今天下午到苗家去看看。”

“好,过年到苗家去,对他们是个很大鼓舞,他们会盛情招待客人的。”

胡耀邦摇摇头说:“不要招待。要喝酒的,就自己带酒去。到了那里,不要一扫而光哦。”

胡耀邦一一询问了与会者的姓名、年龄、文化程度等情况。接着,宁生汇报了湘西自治州的基本情况。汇报结束后,胡耀邦说:“我问你们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们自治州的自主权有多大?”

宁生回答:“我们搞了个自治条例,搞了几年,原来要中央批,新宪法规定由省里批。另外,省对州实行财政包干,一九八一年度州里有机动财力一千四百万元。农业税民族减免九十多万元。”

胡耀邦又问:“那你们的自治权力就是一千四百万加九十万咯?老根据地有什么补助?这里可能还有点补助吧?”

陪同胡耀邦视察的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回答:“财政部对老根据地计划拿两亿元。”

胡耀邦说:“第二个问题是,苗族和土家族的

房屋怎么样?我到过四川的彝族地区,贵州的苗族地区,那里住的条件太差了。苗族、彝族、布依族过去住在高山上,住房太差,起码要风吹雨打不会生病吧。有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房子也怪,什么都是木头,地板、窗子全部是木头的。要提倡盖砖房、砖木结构嘛,节省点木材。当然改变这个结构也不是容易的事,光一般号召不行,要进行具体指导。搞点典型示范嘛。少数民族的服装,为什么从明朝、清朝戴那么些首饰,服装上镶有金子、银子呢?那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在历史上,汉族打他,他就跑,全部家产都在身上,一起带走了。自治州少数民族三十多万户,没有房子住的,房子风吹雨打,容易生病的有多少?百分之五还是百分之十?要搞点调查。解放三十多年了,衣食住行总要解决好嘛!”

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说:“自治州干旱后吃水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房子问题要调查一下。”

胡耀邦动容地说道:“少数民族的住房问题一定要解决。连个栖身的地方都没有。你看怎么办?只有百分之几也好,你要靠他自己是难以解决的。从全国来说,蒙古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的房子问题已经解决。还有彝族、苗族、布依族、土族,这些民族的房子问题还没有解决。三十年解决不了。四十年!八九年就是建国四十周年了。顶多一千万人。五口之家,二百万户。有二十个亿就解决了。国家一年拿一点钱,地方帮工。要想想这个问题。调查一下,有多大个面,怎么个搞法。在陕北,中央每年给五千万,听说有百分之二十的户住上了砖瓦房,到一定的时候要减少下来,转移到别的地方。解放四十年还解决不了住房,不好说话。实际上不会有二百万户,这个要先调查一下,六五搞不完,七五搞完。前几年有些地方把钱拿来盖招待所,盖参观点,这很不好。我们少数民族地区要为少数民族办点实实在在的事。我

想,房子问题比办小学更重要,要有个窝窝。房子不解决,你强迫他儿子上学?”

胡耀邦接着说:“第三个问题是,山区经济搞活问题,除放宽政策中央已经解决外,现在最重要的环节是什么?我想,就是发展商业专业户、商业联户、长途贩运专运户。我主张边远山区要发展一批商业专业户。很多山货供销社怕赔本不经营,就是改为集体,也不一定经营。边远山区要发展一批运输户,把山货运出去,把日用杂品运进来。自治州六十万户,你发展一万户,或者挑,或者背,几户联起来买汽车,成为商业联户。你发展几千户,你们六十万户,发展六千户只有百分之一,改变不了社会主义性质嘛。解决流通问题光靠国营商业不够,加上合作商业还不够,还要发展个体商业。发展个体商业主要是在山区。讲效益,有生产效益,运输效益,保管效益,销售效益。现在只讲一个运输效益,其他三个效益都不讲。发展个体运输户,就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商业的运输效益。这不是简单问题,是提到理论上讲呀。你们讲的个体商业户是集镇的饮食服务业个体户,不是运输专业户。运输专业户不搞起来,饮食服务业专业户也发展不起来。我从海南岛一路走,饮食店寥寥无几。过去有十里铺,三十里铺,三十里一个店嘛。你不发展运输专业户,饮食服务业专业户也发展不起来。当然要采取自愿的原则,自负盈亏,给他发个营业执照。我家在浏阳,我父亲就是挑脚的。挑一担谷子到东乡卖掉,挑一担煤回来,来回几天,只得一块光洋,那好辛苦啊!以前,我们把长途贩运叫剥削,其实是很辛苦的。有的用船装,靠自己拉纤,船夫是很辛苦的。赶马帮的,赶毛驴的,推车的,都是很辛苦的,叫做卖苦力。要发展这些东西,使马路上络绎不绝。”

胡耀邦最后鼓励大家:“听了宁生同志的汇报,你们的工作搞得好,这几年变化大,前几年还吃不上饭嘛。”

在这次座谈会上,胡耀邦总是放心地让别人说话,动员别人说真话。

下午2点30分,胡耀邦来到州政府招待所,健步登完109级楼梯,来到房顶平台,观看吉首市各族人民正在举行的迎春盛会。迎春队伍里,有狮子队、舞龙队、扎春,还有民间文艺表演,场面十分热闹。当迎春队伍锣鼓喧天,载歌载舞,秩

序井然地经过面前时,胡耀邦十分高兴,不时发出愉悦爽朗的笑声。陪同人员几次提醒,早春天气寒冷,不如早点离去。胡耀邦却一再说,还没有看完,还没有看完。就这样,在微微寒风中,年近古稀的胡耀邦兴致勃勃,一直站着看了35分钟,最后离开时还高兴地说:“现在生活好了,春节搞个迎春游行盛会,让大家热闹热闹,这个办法好。”

耀邦新春访苗家

下午3点15分,胡耀邦来到吉首市寨阳公社寨阳大队寨阳生产队,访问苗族社员杨昌南一家。寨阳生产队离吉首城区只有十公里,是个典型的苗族村落。杨昌南的家,是一栋非常古老的木板房,刷了桐油的杉木板年代一久就变成深黑色。走到大门口,胡耀邦看见大门两边门框上贴着一幅“春回大地风光好,福满人间喜事多”的对联,高兴地手指口念,并赞许说:“这副对联写得好,字也好,意思也好。”

进屋后,胡耀邦看见楼板上挂满了一簇簇的干包谷,堂屋里摆着缝纫机、自行车,问杨昌南:“这些都是你家的吗?”

杨昌南回答:“都是我屋的。”

胡耀邦来到火塘边,看到火炕上挂着100多斤腊肉,火塘边的桌子上摆着炒米、糯米糍粑、糖馓和柚子,十分高兴地连声说道:“好!很好!”

杨昌南请胡耀邦等一行客人坐到客位上,杨昌南和他的妻子、孩子们陪坐在胡耀邦身边,村里的女社员田忠花、石金连、石绍玉、杨明珍、杨三英、石登妹等人,穿着湘西苗族特有的缀满银饰的花围裙,笑盈盈地围拢来,在胡耀邦周围就座。

杨昌南请胡耀邦品尝苗家的糖水泡炒米、糯米糍粑、糖馓和柚子。这时杨昌南的二儿子杨春生刚好从吉首市看完迎春会赶回家,一进门就认出是胡耀邦在自己家里做客,他十分激动地说:“啊!是总书记胡耀邦同志。”

耀邦亲切地问:“你怎么会认识我?”

杨春生回答:“我经常看报看电影,所以认识你。”

胡耀邦要大家一起吃,还风趣地说:“我们都吃了,好吗?”

杨春生机敏而朴实地脱口回答:“好!党的政



耀邦新春访苗家

策好,越吃越有。”

胡耀邦问:“你们家多少人?”

杨昌南回答:“全家七口人,四个劳力。”

“今年承包了多少田土?”

“包了六亩二分田、二亩五分地、五亩桐林、三亩责任山、还有四亩自留地。”

“去年收多少粮食?”

“粮食七千五百斤,上交八百斤。”

“上交八百斤,其余都是你的。钱呢?”

“纯收入三千二百元,现在有存款二千四百元。”

“多种经营抓的什么项目?”

“搞缝纫、基建,还养猪。”

“长途贩运搞不搞?”

“没有搞。”

胡耀邦笑着对在座的人员说:“他怕。”

杨昌南回答:“搞不得。”

胡耀邦说:“可以搞。”

稍后,胡耀邦关切地问杨昌南及其家人:“你们最高兴的是什么事?”

杨昌南、杨春生父子异口同声地回答:“党的政策好,合乎我们的心愿。”

胡耀邦听了,会心地点点头。

按苗家习俗,春节有贵客来访是件大喜事。杨昌南摘下自己小女儿脖子上戴的银项圈,亲手给胡耀邦戴上。

眼看着天色将晚,胡耀邦同志等一行人即将

离去。此时,一位在座的苗族妇女咚咚地敲起苗鼓,用清亮的苗歌唱道:

“欢迎爱好歌言做(欢迎客人时我唱一首歌),

所爱欢迎稿肚有(高兴时我把心里话说出来)。

腊卜党朗政策放宽腊吉汝(我说的是党的政策很好),

群众人民吉年周(广大人民群众都非常欢喜)。

玛能卜那生产得到大丰收(现在我们生产得到大丰收),

生活富裕吉年透(生活好了,内心的喜悦无可比拟)。”

大庸春夜话桑麻

下午四点三十分胡耀邦乘专列离开吉首,北上大庸(今张家界),宁生也跟随前往。

晚上七点五十分,已是暮色深深,专列停靠在大庸火车站。在专列上,听了时任大庸县委书记黄有为关于全县经济工作情况的简要汇报后,胡耀邦问他:“八五年总产值搞到两亿元行不行?八七年可以吗?”

黄有为回答:“完全有可能。”

“完全有可能,怎么搞上去呢?”

“靠多种经营搞上去。”

“多种经营有哪些项目?”

“主要有油桐、油茶、苕麻、水果、茶叶等。”

“水果有哪些品种?”

“有菊花心柚子等。”

“什么是菊花心?”

黄有为解释说:“菊花心柚子原产大庸,因其顶部花纹酷似菊花而得名,果肉淡红色,清香味美,甜酸适中,可与广西沙田柚媲美。”

毛致用插话:“还可以种棉花、苕麻。”

胡耀邦问:“苕麻不是销路不好吗?”

黄有为回答:“大庸的苕麻纤维支数高达2585,是良种,不愁没有销路。”

“你们县去年养多少头猪?”

“去年是二十五万头。”

胡耀邦说:“饲料工业发展以后,农民养猪又

劳动直属营的军队右派

○ 陈 挺

—

1957年4月,毛泽东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曾许诺:“不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组织处分。”仅仅半年多时间,1958年春全国反右派运动结束时,就划定了右派约55万人。“阳谋”带来的阴影,也笼罩着军队,在全军的军官队伍里,据说划出了约6000名右派。其中属于军委直属单位及各军事院校打出来的右派中的320人,于1958年4月下旬,被陆续遣送到山西修建太谷郭堡水库。

郭堡水库建在太谷县的象峪河上游,位于东沟、小西沟和佛峪沟三流会合处,计划建一座集

灌溉、防洪、养鱼、发电为一体、容量为3000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1958年正处在大跃进的岁月,在号称“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形势影响下,太谷县委提出:要求水库工程在1958年年底竣工,并做到当年受益。就当时的设备条件和技术力量而言,这是个非常大胆而困难的设想,但郭堡水库却成功了,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郭堡水库来了这不同凡响的320名右派。

这320人,按照到达水库时间顺序,编成了三个锻炼大队。

第一锻炼大队:由原海军直属机关、装甲兵、炮兵、工程兵及驻山西第十、第十二航校、山西军区的135人组成,大队长彭承榘,副大队长周湘生、戴沂蒙、张丕泉。

赚得肥料,可以肥田。两工加一长,不愁钱和粮。工,就是食品工业和饲料工业;长,就是长途运输,腿要长一点,要把商品搞活,不要几年就富起来了。”

晚上八点二十五分,胡耀邦乘坐专列离开大庸火车南站,取道石门赴长沙。在专列上耀邦还向宁生仔仔细细询问了湘西自治州的情况。

湘西之行后的一个小插曲

胡耀邦这次到湘西视察之后还有一个小插曲:

湖南湘西只是胡耀邦此次出京视察的其中一站。他此次视察三省的消息,广东、湖北都很快见报了,唯独湖南没有见报,群众有些议论。为此,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主任的周治甫电话请示了新华社副社长曾建徽。

曾建徽说,广东见报是特殊情况(正值春节),湖北见报是抢新闻,是错误的,已进行了批

评。为此,曾建徽又向耀邦同志汇报,说湖南要求见报。胡耀邦回答说,不要登报了。因此,对于胡耀邦这次到湘西视察的消息,《湖南日报》和中共湘西州委机关报《团结报》都不再登载了。

胡耀邦回京以后,在他的关心下,1984年2月5日,农牧渔业部和湖南省联合投资,在吉首的丹青、泸溪的麻溪口、龙山的八面山建立了新的草食畜牧业基地。1984年9月30日,国家开始拨付粮、棉、布,用于帮助湘西州修建水利水电工程。当年11月,永顺县勺哈乡装机8000千瓦的马鞍山水电站因此得以破土动工。1984年11月19日,湘西州农业税从1984年起全免五年。仅1985年,国家就投资扶贫款近百万元,在湘西州各地共兴建人畜饮水工程69处,解决了1万多人7000多头牲畜的饮水困难问题。■

(作者为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局干部)

(责任编辑 黄 钟)



1958年12月郭堡水库竣工,鍛炼大队全体人员留影

第二鍛炼大队:由原空军直属机关的105人组成,大队长沈保民。

第三鍛炼大队:由军委三总部及直属五院、防化兵学校的80人组成,大队长陈挺,副大队长周宏达、华涤。

大队下设中队和小队,每个小队10人左右。各级干部都是由组织上从这320人中指定的。

这320名右派中,原系党员的有92人,原系团员的有135人。许多人原来在部队时都是政治、军事、技术、文艺等方面的骨干和人才。有几位少年时即从军,是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年轻的老八路、新四军干部,在抗日及解放战争的战场上,都曾印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是陈挺、周宏达、戴沂蒙、张丕泉、常征、陈广、张文炜、聂荣廷、郑淑芹……还有留学苏联军事院校,刚刚回国就积极参加整风的,如朱兆极;驾机起义,为建立人民空军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何健生;不久前还在朝鲜战场立有战功的飞行员杨时瑞、坦克手唐廷雄;活跃在部队文艺界的著名诗人公刘,音乐家欧阳枫(李祯祥)、陈志昂,舞美设计家赵森林……全部人员中大部分是在建国前后参军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初、高中生到大学毕业、留学的都有。从年龄上来看,从20来岁到30来岁的占了绝大多数。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集体,排起队来很像兵却不是兵,因为没有领章帽徽,政治待遇上像犯人,却又不是犯人,他们干活的积极性不但犯人无法比拟,而且远远超过了一般劳动者。他们积极热情,拼命干活,只怀着一个可怜的期望:早一

天能被承认是“人民”。

二

有这样一个传说,据说在1958年初,反右运动结束以后,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笱曾要求国防部长彭德怀支持部分技术力量,以修建郭堡水库。部队当时没有转业干部可派,就将这320名正待处理的军中右派支援了山西。从当时郭堡水库对鍛炼大队的使用来看,这个传说也许是可信的。三个鍛炼大队在水库建设中,确实发挥了技术骨干的作用。如苏祖德、陈维衡参与了大坝的设计,朱文明指挥大坝施工,唐廷雄、葛福两位坦克兵则驾驶着拖拉机、碾压机驰骋在大坝上,乌维达、赵森林、邢从周等从事机械维修,李淑琴负责质量监控,可以说,水库建设的每一个重大环节,都有鍛炼大队成员的贡献。他们不但亲自参加工程管理及技术设计,同时还培训来自各县的民工,使得工程的进展有了更可靠的保证。

郭堡水库工地总指挥是太谷县副县长要进之,政委是太谷县县委书记靳广杰,他们都是老革命,经历过政治运动的风雨,对于我们这些“犯了政治错误”的人是理解的,相信我们能够通过劳动改造自己,因而,在劳动中,大胆放手地要我们进行自我管理。

三个鍛炼大队中,除少数人参加技术工作外,绝大部分人还是从事与土疙瘩打交道的劳动。如铲土、装车、拉平车、上坝、卸车等等全是力气活。可以说在水库上任何艰巨的劳动场合,都

少不了这些穿着褪色的军服,咬着牙、挥着汗干活的右派们的身影。

随着形势的发展,来水库的民工越来越多,最多时据说曾达到上万人,附近各县都按照民兵连的组织形式,投入到水库工地上来,有些公社青壮年强劳力另有他用,但又不死不派人,于是派了些老婆婆老妈妈和十六七岁的小姑娘来充数。另外又调了不少的劳改队,在水库旁安营扎寨。实际上玩的就是人海战术。任何有头脑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整个水库建设中没有一支强劲的突击力量发挥作用,想按预定计划建好这个水库是不可能的。这支突击力量,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其中就有似军非军,似民非民,似囚犯又非囚犯的这三个锻炼大队。

三

在修建水库的过程中,三个锻炼大队都留下不少生动的故事。

先说一大队,郭堡水库大坝合龙后,一部分归国志愿军将来太谷参加建设,太谷县决定在乌马河上再修一座小型水库——庞庄水库,一大队副大队长戴沂蒙带领10多人先期前去搞测绘和设计,他们组成一个小分队,住在庞庄村口,分测绘和设计两个组,安顿下来之后就干了起来。地形测绘之精确,设计图纸之严整,在省里博得一

致好评。当时主持水库工作的要进之知道后,亲自赠送一大筐太谷饼以示慰问。几位打前站的归国志愿军领导同志,更是深受感动,看完设计后,有位领导拍着老戴的肩膀轻声说:“你们的情况我们都知道……谢谢……再见……”他们走后才发现他们悄悄留下了两条香烟。

又如二大队,其主要组成人员来自空军部队,当时适逢全国各地都在大放卫星,一位太谷县的工业口负责人知道锻炼二大队来自空军,其中有会造飞机的人才,他心血来潮,异想天开地提出太谷县要放特大卫星,要造架飞机飞上天!于是他去二队挑选了15个人,集中在太谷铁厂,讨论和研究造飞机。这15人明知困难很大,但迫于形势,只好表态要以最大的努力来完成任务。以黄养光、吴亦寿、余慰明、林大任、徐力等5人为主,黄、吴二位任正副组长,加上其他10人,由原空军订货部的李基地回空军去求援,空军订货部热情支援了一台发动机、一副机轮和一些仪表等,就利用铁厂仅有的几台打铁炉和皮带机床,因陋就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用手工制成了一架飞机,听起来仿佛是天方夜谭,但确实确实是架能飞的飞机。

1958年12月20日11时20分,由昔日的战斗机飞行员、二队的杨时瑞驾机飞上天空,飞行了29分钟,圆满完成试飞任务。《山西日报》上还登载了有关自制飞机上天的新闻报道,但又不说明是谁造的。因而民间盛传:三个农民造出了飞机。现在想想,有点后怕,如果这架飞机飞不上天,或者上了天却又栽了下来,这15位造飞机的战友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

再说三大队。1958年8月,大炼钢铁的火焰燃遍全国,郭堡水库分出部分劳力,转向找矿石,炼钢铁,第三锻炼大队首当其冲。大队长陈挺,根据他幼年找金矿的经验,煞费苦心,终于找到了可以投入冶炼的矿石,这一发现,使工地总指挥大喜过望,当即表扬三大队为太谷县找矿石立了头功。随后副大队长周宏达和队员赵森林用坩埚最先炼出一块仅重250克的生铁。这是太谷县炼出来的第一块,为此,县里开着披红挂绿的汽车到省城去报喜。

随后,又砌出一座一米多高的小高炉,



大炼钢铁时水库工地上的小高炉群

几经周折，终于从这座小高炉里淌出点铁水来。各队纷纷效法。采矿、运矿的队伍迅速扩大，既有三个大队，也有民工。很快紧靠大坝下面广场上竖起一排小高炉，营造了顺应形势红红火火的氛围。

出了点生铁，就考虑炼钢了。传说，炼钢需要枣木，于是就兴师动众，大砍枣树，不管是谁家的一律砍下作贡献。胡折腾了一顿，只炼出来一些不成形的碎渣。大炼钢铁不仅本身劳民伤财，而且殃及了农民，秋收季节颗粒未收，这是导致以后发生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之一。

1958年12月底，郭堡水库按计划及时竣工了，三个锻炼大队的“劳动锻炼”也宣告结束。1959年元旦后，全体人员集中到太谷县招待所作劳动总结，有10人被当众摘掉右派帽子，其用意不言而喻，是敦促其他人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中来。然后无论摘帽与否，统一分配到当时的晋中地区各县（包括阳泉市和后来吕梁市的大部分县）及太原市工作和劳动，继续改造。

四

当劳动正处于高潮时，从河南省参观回来的郭堡水库工地副总指挥曹汉英，很欣赏河南用捆绑、打骂的办法强化劳动，在他召集的大队长会议上，批评我们锻炼大队右倾、心慈手软，连打人都不敢。他决定在工地展开批斗，要找几个对象以现行反革命罪来逮捕法办。

一天晚上收工后，批斗会开始。第一个被批斗的人叫徐中行，原是文化教员，在水库劳动中干活还是卖力的，只是牢骚话多，批斗他的主要罪行是在建高炉时，他敲的弧形砖碎的多，浪费大，诬陷他是有意破坏，被当场逮捕。后来听说他竟然冤死在狱中。接着批判了刘惠民和张世彩，也是小题大做，批斗拖到深夜，劳动一天的人们感到疲倦，批不下去了，只好收场。但刘、张二人照样被逮捕押监。

在建设水库期间，这三位战友突遭横祸，是一些水库负责人事前策划和安排的，也是来郭堡水库的320人中最先受到迫害的。但当时大家都还没意识到这已是一个信号，说明了厄运将长久

地附着在这些右派的身上，避也避不开，甩也甩不脱！

从1959年初水库工程结束以后，晋中各县陆续都有不少战友被摘了“右派分子帽子”。本来大家对摘帽都寄予极大的期望，在想象中，摘了帽就是回到人民队伍，所有的屈辱都将一扫而尽，降了级的以后可以再升上去，荒废了的业务以后还可以拿起来，想到了甜美处，则觉得恢复党籍、团籍、军籍也是指日可待之事。但现实是残酷的，1958年以后，运动不断，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中，一开始的打击对象总少不了右派分子，已摘帽的被称为“摘帽‘右派’”，同样在打击之列。在一些自封“左”派的人们眼里，无论摘帽与否，右派仍是右派，永远是一些没有做人尊严的政治贱民。

在这不幸的320人中，据近年不完全统计，已辞世者约占全部三个大队人员的四分之一以上。其中很多人都是非常悲惨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如佟惠林，水库建成后他被留在水库工作，在“文革”中，因不堪受辱，最终饮恨跳入自己建造的水库淹死；还有帅学立，水库建成后先是留在水库工作，“文革”中被遣返贵州老家，因出身不好挨批斗后又送回山西，往返三次。在水库身无分文，不得安身，无可奈何，投水自尽。

在“文革”中，分配到各地的右派们在其所在单位无不成了被斗争的对象，被迫害致死或经不住折磨而自缢的，有朱士增、孙友乙、吕惠民、徐恭寅、谢金星、张宇洲……曾在朝鲜战场上，奋勇战斗的坦克手唐廷雄，“文革”中不堪凌辱而惨烈地头撞钢刃自杀……“文革”中没有死的，活着也极艰难，不少人有戴两次右派帽子的经历，陈挺、张英敏还戴过三次右派帽子。至于再次戴了右派帽子后又加戴反革命帽子或坏分子帽子的，那就更是大有人在了。

1979年底，改正的一刻来临了，当然，人所周知，改正不是平反，这里面有什么玄虚，不是我们说得明白的，但我们深信历史是公正的。■

（此文由陈挺执笔，由陈通鉴、余慰明、章士寰、黄养光、江铸原、周永熙等同志提供资料或参与修改。）

（责任编辑 黄 钟）

新四军首长轶事

○ 陶泊 口述 陶京天 整理



创刊初期的《江淮日报》报头

刘少奇为《江淮日报》题写报名

1940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新的机关报《江淮日报》在苏北盐城创刊。该报由原《抗敌报(江北版)》改成,刘少奇兼任《江淮日报》社社长,王阑西任副社长兼总编辑。《江淮日报》是继延安《新中华报》、重庆《新华日报》后,我党公开出版的第三份日报。

筹备过程中,王阑西提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意为《江淮日报》题写报名,由时任刘少奇秘书的刘彬安排。题字那天,是吴江和我两个人去的。当时,刘少奇兼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政委,驻地在盐城泰山庙(后为新四军重建军部所在地)。刘少奇和陈毅都住在那个院子里的上房,办公兼住宿。

刘彬把我们领进屋时,陈毅也在,刘少奇笑着招呼陈毅说,“陈老总,你的字写得好,还是请你题这个字吧。”陈毅连忙摆手,“不行、不行,华东老百姓要的还是你这个名气嘛。”

记得当时刘少奇用毛笔把“江淮日报”四个

字一组一组地写在了好几张纸上,最后都交给我们,让我们回去自己选用。到了正式出版时,《江淮日报》报头用的那四个字就是用刘少奇写在不同纸上的字拼接而成。

刘少奇在皖东和到达苏北初期,一直化名“胡服”,不过,在题写报名时他并没有署名“胡服”,所以,《江淮日报》创刊时的报头没有署名。至于后来有没有过署名“胡服”的《江淮日报》,我记不起来了。事实上,《江淮日报》创刊后仅一个多月,就爆发了“皖南事变”。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中央公开宣布刘少奇为新四军政委,从此,他就不再用“胡服”这个化名了。

《江淮日报》创刊后,初期为铅印四开两版,后改为四开四版。发行量从最初4000多份增加到1.5万份。除了发行到华中、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还通过各种渠道传送到上海、南京等沦陷区城市和重庆,甚至香港、东南亚的华侨社团也能看到《江淮日报》。

当时,我任发行巡视员,整天在外面跑。报纸创刊不久,王阑西就交给了我一个任务,那就是设法将刘少奇题写的报头原样放大,刷到盐城周围的一些城镇去,以扩大报纸的影响。我记起读私塾时曾经看到先生用画方格的办法临摹大字,于是,也就照葫芦画瓢地试了一番,放大后的效果不错。我用几张旧报纸加糨糊做成硬壳,再用剪刀挖去临摹放大后的字,造好“模具”。利用外出发行巡视的机会,我带着一个勤务员,提着用白灰水调制的颜料,像写抗日标语那样,把放大的“江淮日报”这四个大字刷到了盐城周边的东沟、李堡等地的墙上。

1942年到1943年,我在新四军政治部参加了“整风”学习。记得有一次上级在传达“反对党八股”时说,毛主席对传统汉字中把“工”字的那

一竖拐了个弯,把“人”字那一捺加了三撇很是反感,认为这是知识分子故意写得让老百姓看不懂……大概是曾经反复临摹和放大刘少奇题字的缘故,我对“江淮日报”这四个字特别熟悉,以至于马上联想到刘少奇写的“江”字中的那一竖的确拐了个弯。不过,对毛主席的这个批评,我当时却不以为然,觉得刘政委写的那个字也很好看。那时,党内和军内还远没有形成后来变得十分严重的个人崇拜,对领导人更多的是尊敬,而不是崇拜。所以,年轻的我很自然地就“不以为然”了。

穿长衫的陈军长

一天清晨,我还没起床,就听到院子里有人在乒乒乓乓地打篮球。起来一看,原来是穿着蓝布长衫的陈毅军长正在和报社电台值夜班还没休息的同志们打篮球,边上站着个警卫员。

提起陈毅军长穿长衫,当时曾有过不少议论。按理说,新四军军长当然应该穿军装,可是,陈军长却常常穿着一件蓝布长衫。于是,很多“文化人”(那时对知识分子的称呼)和当地士绅便将此举理解为共产党“礼贤下士,平易近人”,一时传为美谈——这也许恰恰是陈军长在统战方面的高明之处吧。

每天两顿饭的三师

1941年7月,日军对我盐阜根据地大举扫荡,上级要求精简机关,《江淮日报》停刊。截止到7月22日,《江淮日报》仅出版了八个月。报社人员被分散调往各部队和盐阜区,我和部分同志调到了新四军三师。据说是黄克诚师长向华中局提



《江淮日报》部分同志合影,1941年春摄于苏北盐城

出,希望要些“文化人”来加强部队建设。三师是“皖南事变”后由八路军115师南下的五纵队改编而成。我对这支部队最初的印象是,这些来自北方的指战员军容严整,清一色的“汉阳造”,比新四军一些老部队的装备还好。

我分配在师政治部,主任是吴法宪,江西人,个子不高,剃个光头,很平易近人。他经常和我们这些年轻人一起打排球,不时被挤得跌跌撞撞,也不生气,接着打。不过,让我这个南方人很难适应的是,三师一直按照北方八路军的习惯,每天只吃两顿饭,早上太阳老高了还不开饭,傍晚天还没黑,肚子就咕咕叫了,实在吃不消。

新四军政治部的三位主任

1941年1月重建新四军军部,中央宣布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此前,我在江北军政干校学习时,时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常给我们上课。虽然他的福建话不好懂,也不用讲稿,但他没有大话套话,生动平实,娓娓道来,我们爱听他讲课。记得1940年盛夏的一天,他上党课,讲十年内战(即后来所称的“土地革命战争”)除午饭午休,讲了一整天。他摇着芭蕉扇滔滔不绝,学员们听得兴致勃勃,那情景至今难忘。后来,我毕业分配到了江北政治部,主任正是邓子恢。不过,重建军部后,邓子恢一直留在淮北的四师,没有到

广西昭平公社化与大炼钢铁

○ 胡 辉

我 1998 年退休时，在广西昭平县从事了 43 年的农村基层工作，亲身经历了公社化、大炼钢铁，吃够了极“左”的苦头。

1958 年 3 月 14 日，在一片锣鼓声中，广西昭平县 10 个区成立了 10 个人民公社，全县 5.4 万户农民一起入社。

人民公社一成立便大刮“共产风”，把农民所有的土地、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全部入社，社员的自留地、零星果树、家畜等收归社有，甚至连锅头、碗筷都归公，大办公共食堂，一切资源和劳力由公社统一调配，统一指挥，统一使用，而且实行“政社合一”，随意无偿调拨物资，农民成了真正的无产者。

1958 年 3 月 24 日，昭平县 10 个人民公社

又合并为上游、东方红、跃进、五将等六个大公社。全县成立总社，共 308 个大队，3086 个生产队。

全县办了 218 个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大家同声歌唱：“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那时干部和群众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一切行动听指挥，按军事化组织，战斗化行动，用大兵团作战的方法指挥生产。公社党委书记一声令下，要社员在高山顶上种玉米，寒冬腊月种木薯，大寒季节浸播谷种，挖田三尺搞深耕，挑沙担泥进田改良土壤，办万头猪场等等，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苦干、盲干、拼命干，做了许多蠢事，大家有苦难言，恐惧不安。

职，因而政治部的很多同志都没见过邓主任。

后来，从皖南辗转来到苏北的原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代理了军政治部主任，可也是很久没有到职。直到 1942 年，在军政治部的新年晚会上，大家才第一次见到饶漱石。当时饶漱石讲了一段话，七十年后我仍然记忆深刻——他说，“1941 年是个倒霉的年头，国际上，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打到了莫斯科城下；国内，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新四军吃了大亏；我个人，皖南事变时，带着一个警卫员，钻到苇塘子里，躲了三天三夜，直到敌人撤走才爬出来，结果落了一身的关节病……”记得他还跟大家开玩笑说，按照他家乡的风俗，只要能赶回来过春节，就算是全年都在家了。不过，当时饶漱石已经担任了华中局书记，再也没来政治部。

再后来，谭震林担任了军政治部主任。当时，军政治部驻在一个四周有水沟环绕的地主土围子里，房子特别紧张，秘书长邓逸凡好一阵张罗才给谭震林安排好办公和住宿的地方。谭的秘书

被分配和我住在一个屋。除了行李，他还带来一个皮箱。见我好奇，便打开让我看，原来里面装的都是些书，其中有上海新出版的《鲁迅全集》，上面还有谭震林的签名。他对我说，这都是谭主任的书，以后你也可以看。谭震林和军首长吃小灶，邓逸凡让谭的秘书和我一起跟着他吃中灶。邓很细心，手也很巧，能自己做酱花生米，不时拿出来给我们尝尝。

谭震林刚来时，邓逸凡让政治部机关搞一个欢迎会，从皖南军部来的吴强便提议，由他教我们几个年轻人唱《繁昌之战》（曲再之、吴强作词，何士德谱曲），因为 1939 年皖南繁昌的五次对日作战就是谭震林（时任新四军三支队副司令员）指挥的。歌词里那段“谁说我们游而不击，谁说我们不能打大仗……”多年后仍印象深刻。可是，没过多久，谭震林就带着秘书离开军政治部，去了淮南的二师，他的《鲁迅全集》我也没看成。■

（口述者曾任国家民委党组成员、秘书长）

（责任编辑 黄 钟）

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钢的产量翻一番,达1070万吨,1959年达2700万吨至3000万吨。为此,在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热潮。

广西区委闻风而动。1958年9月8日发出《立即动员全党全民发展钢铁工业的指示》。昭平县委不甘落后,坚决执行,于1958年9月10日召开各公社党委书记紧急会议,传达贯彻这一指示。会议决定,迅速行动起来,集中领导、集中人力、集中物力、集中时间,以战斗姿态投入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县里成立了钢铁指挥部,县委书记孟占川任总指挥,副书记何国元任副总指挥,昭平县大炼钢铁的重点在樟木三江钢铁厂、昭平红旗钢铁厂、马江公社清州烧结铁基地。

那时,我是昭平县农业技术中心站站长,也被调到红旗钢铁厂后勤部当办公室主任,负责大炼钢铁的后勤工作,指挥砍树烧炭、挖矿石、采煤、调物资、食品和原料供应等。后勤部长、上游公社党委第二书记张壮谋带领1500人到西湾挖煤。东方红公社党委第二书记谭志华,带领2600人到临江冲、黄垌林场砍树烧炭。为取青砖建高炉炼铁,全县把260多间青砖瓦房和祠堂庙宇拆掉,建造炼铁土高炉123座。9月16日,全县15万多民工和中小学生对军事化行动奔向钢铁基地。

炼铁高炉风箱,需要大量鸡毛,下令叫我通知各公社社员养的大鸡全部送钢铁厂杀掉,取鸡毛造风箱。不知杀了多少只鸡,仍不能满足造风

箱用。鸡毛不够,就用人头发代替。何国元和老县长林宗绍自己带头,先把头发剃光,跟着大家都把头发剪光,取毛造风箱。那时男人成了光头“和尚”,女人剪成短发变男妆。

总之,为了大炼钢铁,不惜代价,日夜奋战。在大炼钢铁时,昭平县毁坏森林48万多亩,临江冲、黄垌林场的水源林全部砍光,烧炭3500多吨供炼铁用。把农家所有的犁头、锄头、生铁、锅、斧等,都全部收集起来送去炼铁。15万民工苦战了两个半月,全县才炼出320吨烧结铁。

到1959年3月,粮食开始紧张,公共食堂每人每月只配25斤原粮(包括搭配红薯、芋头杂粮在内),公共食堂越办越差,社员吃不饱。上头三令五申,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一定要办下去,不许解散。只好推广“双蒸饭”——把口粮放进盅加满水蒸熟后,再加水重蒸。没油没菜,大家用盐水送饭,还是吃不饱。后来,公共食堂无法办下去,自动散伙。一无所有的社员,各自回家,不得不用野草、树皮、木叶、黄狗头、神仙土、禾秆糍、老糠粑、小球藻当口粮充饥。

到1960年春,普遍出现干瘦病、浮肿病。据当年统计,全县得浮肿病、干瘦病的,有1.18万人,以公社为单位集中治疗。昭平县委书记纪一民、副书记何国元、翟韵庭、戴希纯经常到基层看望病人,并调拨大米23.2万斤、白糖5400斤、米酒7500斤分到各集中点给病人使用。尽管县委采取了措施,全县仍死亡8146人。■

(责任编辑 黄钟)

(上接第86页)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产物,因为当时的统治者动辄使用暴力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正当诉求,马克思赋予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使命、职能就是用暴力来对抗暴力,镇压资产阶级制度的动乱、内战等,这是它具有的唯一的正当性。既是专政就会有不受监督的无限权力,掌握这种权力的人不可避免地会成为独裁者,为打击异己、滥用权力、残杀、迫害昔日的同志、战友以及普通民众,这是前有罗伯斯庇尔,后有斯大林为证的,民主共和国则既能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和使命,在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来对抗执政的工人政党

时即可宣布实行紧急状态以应对之,事件平息后即可取消之,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并不需要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长期剥夺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民主共和国保护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形成了对执政者有力的监督,使之少犯错误,犯了错误也能得到及时的纠正,不致形成专制独裁。所以在实质上恩格斯是提出了一个取代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方案,实践已证明,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已为实践所淘汰了。■

(作者为江南大学退休教授)

(责任编辑 黄钟)

马克思主义发展有三个阶段

○ 吴启文

马克思主义是否有前后期之分的问题,是一个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在其创始人的思想发展中是否有重大变化的问题,目前出现了两种观点,其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前后期之分,后期思想否定了前期思想中的基本观点: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理论。其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前后一贯的,没什么重大的变化可以区分出前期与后期来。前者片面夸大和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前后思想之间的差异性,后者则片面强调了前后思想之间的一致性,本文认为必须既看到其前后的连续性、一致性,又不能忽视和低估其前后思想之间的重大变化,既要承认马克思主义后期有重大变化,又不能夸大到后期完全否定了前期的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中经历了三个阶段,下文将陈述这样区分的理由。

一

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阶段为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的准备阶段,他们还没有完全摆脱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尚处在人本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的阶段,其基本观点是认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共产主义就是主张消灭私有制来使资产者和无产者复归于人的本质的一种学说,恩格斯在其1886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写的序言中所批评的就是这样一种共产主义理论,决非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创建的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理论。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第二阶段是从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开始的阶段,即克服

了人本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创建了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阶级斗争学说,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以生产资料社会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其代表作就是所谓三大名篇:《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创建和发展的阶段。

第三阶段是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独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阶段。恩格斯经历和看到了马克思所没有经历和见到的新的实践和新的事实,他必须用它们来检验他和马克思共同创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过去确立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反思,加以补充和修正。恩格斯本来就是一位思想敏锐的独立思想家,他早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曾对马克思产生过重大影响,然而恩格斯一直对马克思非常推崇和尊重,总是把他们共同创建的成就归功于马克思,自己甘愿充当“第二提琴手”。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再次确立了他独立思想家的地位,恩格斯在他最后十余年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充分展示了他的忠诚、谦虚、务实、勇于自我批评的个性和个人魅力,他解决了马克思在世时没有遇到过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大问题,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不可缺少、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阶段。

二

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区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间是没有多大争议的,唯一要明辨的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序言中所批判的是哪种共产主义理论的问题。序言中的那段有不同解读的话是这样写的:“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

论观点 和我现在的观点决不是完全一致的……例如本书 特别是在末尾 ,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 :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 ,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里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 ,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 ,甚至还要更坏。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 ,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 ,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现在也还有不少人 ,站在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立场向工人阶级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 ,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 ,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 ,披着羊皮的豺狼。”很显然 ,恩格斯在此批判的是企图通过阶级调和与阶级合作来实现社会革命的那种共产主义观点 ,这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观点 ,文中说“本书……的总的观点 ,和我现在的观点决不是完全一致的 ,”“例如本书 ,特别是在末尾……”。表明他批判的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观点 ,决非三大名篇中的观点。这个观点与“我现在”即 1886 年时的观点是不完全一致的 ,1886 年的观点是什么样的观点呢 ? (1)在 1887 年出版的美国版序言中 ,与包含了写有上述那段话的附录同时与读者见面时 ,读者看到了恩格斯的这段话 :“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便实现整个社会对一切生产资料——土地、铁路、矿山、机器等等——的直接占有 ,供全体为了全体利益而共同利用。”(2)在 1893 年 5 月 11 日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中说 ,“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手里时 ,我们就心满意足了……”。(3)在 1889 年 12 月 18 日给丹麦社会民主工党的革命派格·特里尔的信中说 :“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 ,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 ,在这一点上 ,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仅此三条已足以充分证明 ,认为恩格斯在 1886 年写那段话时已经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否定了共产主义理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张光明在《炎黄春秋》2011 年第 11 期上写的文章中对上述曲解恩格斯观点的批评是正确的 ,但他从否定论据上推至否定论点 ,不承认马克思主

义有前后期之分 ,这是缺乏根据的 ,论据引错了不等于论点也全错了。张先生忽视和低估了恩格斯晚年的思想转向 ,这个思想变化对当时及其身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假如恩格斯晚年只是不断重复马克思在世时他们共同创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 ,那就的确没什么理由认为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第三阶段 ,或者说前后期之分是缺乏根据的。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所作的补充修正中 ,提出了许多新论点 ,其重要性足以构成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即第三阶段。

三

恩格斯晚年对他与马克思共同创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四个基本观点上做出了重大的补充和修正。

1. 从不断革命论到不断发展论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与其他政党、团体的竞争中 ,为了争取更多工人群众的支持 ,难免会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过激主张。在 1850 年《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提出 ,“假若小资产者主张赎买铁路和工厂 ,工人就应该要求把这些铁路和工厂作为反动派财产干脆由国家加以没收 ,不予任何补偿。假若民主派主张施行比例税 ,工人就应该要求施行累进税 ;假若民主派自己主张施行温和的累进税 ,工人就应该坚持施行累进税极大而使大资本家必遭覆灭的累进税 ;假若民主派要求调整国债 ,工人就应该要求宣布国家破产。这就是说 ,工人的要求到处都必须针对着民主派的让步和措施来决定。”“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 :‘不断革命’”。这是争夺对工人运动领导权时的一种策略 ,即总是要提出比对手更激进更有损于资产阶级 ,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利益的政策、口号来 ,用以彰显自己比对方更先进更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马、恩提倡的就是“向左、向左、再向左!”越激进越好 !在符合社会的实际及其发展趋势 ,符合群众愿望的情况下 ,这是可以有效地提高共产党的声望 ,战胜其他党派的 ,但是假如把它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原则 ,就很可能背弃实事求是的原则 ,超出现实的可能性 ,脱离群众 ,造成巨大的恶果。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

时称：“纲领的政治要求除了陈旧的、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如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军队等等之外，没有任何内容。”他还指责纲领中有关“平等的国民教育”、“科学自由”、“信仰自由”等条目。他承认这些要求在其他国家中已实现了，但德国尚未实现，既然如此，就不应指责它是“民主主义的废话”，放在党纲里就没错。马克思之所以要如此说，就是故意要贬低拉萨尔派，指责他们没超出资产阶级的要求，以此与拉萨尔派争夺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上的领导权。马克思的这一过激言论影响不好，后来终于在《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批判》中，恩格斯有机会对此作了修正，他写道：“德国落后的政治制度妨碍着它为……人类的斗争。首先它必须为运动争得自由的场所，必须扫清大量的封建主义和专制制度残余，一句话，就是必须完成德国资产阶级政党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由于过于怯懦而不能完成的工作。因此，它至少在今天应该把其他文明国家里已经由资产阶级亲手实现了的各种要求也写进自己的纲领中。”

不断革命论的实质首先是没有把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斗争放在足够重要的首要位置上，而是急于提出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经济要求来，削弱了反封建争民主的斗争；其次是认为一旦民主革命的任务完成，就应马上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间不应有停顿，忽视了社会主义革命要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这无异是认为那些还存在着大量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就已经成熟了，可以用社会主义来取代资本主义了。普遍的情况恰好相反，这样的国家一定是尚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还远没有成熟到需要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恩格斯晚年深刻反思了这一问题，他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完成了反封建专制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后，资本主义尚有很长一段时期是处在有力地促进生产力发

展的上升时期，远未达到“垂死的”阶段，此时最应做的事不是“不断革命”，把社会主义革命提到日程上来，而是应当踏踏实实地为改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地位，为促进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行长期的渐进的工作，以等待最后的“决战”时期的到来。因为“既然它还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地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又一个的阵地……”他明确地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恩格斯晚年的思想转向，意义重大，第二国际正是遵循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开展工作的，因而取得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无法企及的显著成就。

列宁在批判俄国民粹主义时是马克思主义的模范生，他指出：“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可以不经过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的道路，而经过其他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坚定不移地排斥这类梦呓之谈的。”他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要最坚决地扫除旧制度的残余，即农奴制残余（属于这种残余的不仅有专制制度，而且有君主制度），要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这是完全符合唯物史观的科学的论述，按此论点，民主革命成功后应当有一个让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的时期，不可能马上就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然而列宁在1917年却实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企图尽快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折不扣地奉行了不断革命论，他为此辩护说，“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列宁在这里把自己一再严格加以区分的两种革命放在一锅煮，毕其功于一役，完全忽视了社会主义革命要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他经过四年的探索和实践，尝到了苦头，终于决定改弦更张，实行新经济政策。他写道：“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的分配。现实生活说

明我们犯了错误,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容许资本主义有限度地发展,这一方针仅仅实行了8年,斯大林就迫不及待地在1929年用高强度的无数暴力,消灭了一切尚处于早期阶段的资本主义因素,向社会主义过渡,完成了俄国民粹主义者跨越资本主义的梦想,所以斯大林就成为民粹主义遗嘱的执行人,直至数十年后斯大林模式轰然垮台,终于受到了历史的惩罚。列宁、斯大林在俄国推行的不断革命论在中国被复制,1956年所完成的“三大改造”,正是列宁评论孙中山时所说的:“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而实行‘社会革命’等等,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人们违背自然规律破坏了生态平衡就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于是人们必须寻找补救措施,社会亦然,中国和俄国如今在社会领域中所实行的政策就类似于“退耕还林”。

2.从“剥夺者被剥夺”即把有产者变为无产者到把无产者变为有产者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已敏锐地看到了股份制中已孕育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并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这对我们如何正确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有着重大的意义。

(1)在股份公司中资本的性质已发生了变化,私人资本已转化为社会资本,“在旧形式内,社会生产资料是当作个人的财产出现的,那种和旧形式相反的性质在股份公司已存在。”(2)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已经分离,“在股份公司已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须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所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3)马克思肯定了股份制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是走向社会主义新生产方式的一个必要的“过渡点”,同时,他又指出它并未改变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的分离状况。改变这种分离状况的是由工人们自己组建的合作工厂,在这里“资

本和劳动的对立在那里扬弃。”“组合的劳动者已经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增殖他们自己的劳动。”换言之,劳动者有权参与分红,拿股息,因为这是劳动者自己创造的剩余劳动。马克思的理想是借助于信用手段,使合作社“可以或大或小的民族规模来实行逐渐的扩大。”这不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了吗?可见马克思是把合作企业当作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细胞来看待的。马克思没能看到的是股份制经历一百余年的发展,股份制企业与合作企业的区别已没那么大了。因为工人往往握有本公司的股票,是他们所在工厂的股东了。由此可见,马克思并不是要消灭所有的私有财产,让所有的人变成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而是要让所有的社会成员变成有产者,他所要消灭的只是能占有剩余劳动的那种私有财产。当股份公司的股份由全体劳动者包括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所占有时,也就消灭了对剩余劳动的剥削,而是由创造它的全体劳动者占有了。这里有一个重大问题需要解决,在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个人有权获得他们在劳动中创造的增殖部分吗?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工人合作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后明确指出:“在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及与其相应的社会生产形式上,怎样自然而然,会有新的生产方式从一种生产方式发展出来,形成起来,没有那种本来就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出来的信用形式,合作工厂也是不可能发展出来的。”可见马克思从实际出发,毫不含糊地肯定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生长出来的。斯大林主义有一个与马克思完全相反的教条,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绝对对立的,所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绝对不可能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孕育出来,在人类历史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都能在旧社会中生长起来,唯独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必须用暴力夺取政权并用暴力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然后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全新的社会主义来。这就为他们完全抛弃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发展中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为他们推行空想社会主义,随心所欲地闭门造车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据此,他们不是去完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因素,而是撇开股份公司和合作企

业,去搞全民所有制的所谓国有企业,以取代私有企业,它虽然消灭了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同时也消灭了劳动者个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对剩余劳动的所有权,而由苏联政府取代了原来的资本家,独占了这两种所有权,苏联式的国有制并未能改变这两种所有权与劳动者分离的状况,所以,由政府管理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并不具有马克思所要求的真正的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苏联模式未能实现马克思所要求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想。

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在我国也长期存在着混乱,除了照搬苏联的国有模式外,还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入股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合作社称作“初级社”,只有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完全归公,即剥夺了劳动者对生产资料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后,只按工分来分配的合作社,才被称为“高级社”。这是一大颠倒,那“初级社”恰好具有最充分的社会主义性质,它才是真正的高级社,因为它体现了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要求。不论是苏联的集体农庄还是中国的高级社、人民公社,由于劳动者没有自主权,他们的劳动不能“增殖”,生产效率极低,终于走向灭亡!

这些出自《资本论》第三卷的理论观点是马克思生前在1865年的初稿中即已提出了,为什么要把它放在恩格斯独力工作的阶段呢?这是因为它是恩格斯费尽心力整理好马克思的初稿后才于1894年出版的,人们至此才知道马克思的这些观点的;其次,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成为恩格斯和平过渡论的重要的现实依据和理论基础。

3. 从暴力革命到和平过渡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中谈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从表面上看,恩格斯晚年重提这一问题似乎并无什么新意,以致张光明先生说,他只是“对利用议会和合法斗争的策略寄予了比以往更多的注意和更高的评价。”“从根本上没有放弃原来的东西。”张先生只看到了“更多”、“更高”的量的差异,没看到其中重大的质的区别,恩格斯在这一问题上提出的新见解有如下几点:(1)恩格斯在《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明确了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各有其适用的条件,暴力革命是针对专制政权的,和平过渡则只适用于有普选权的民主共和国,在专制政权下大谈和

平过渡就是机会主义,而在民主共和国坚持暴力革命就是为资产阶级帮了大忙。(2)过去谈和平过渡只是一种理论上探讨和假设,从未想到要去实行过,相反的他们强调的重点总是暴力革命,批判和平过渡是幻想。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不仅把和平过渡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而且付之行动了,即要把它贯彻到指导行动的党纲中去了。现在强调的重点变为和平过渡了,在他去世前的5年间至少有5次反对暴力革命,认为“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他赞同德国社会民主党把反对议会斗争坚持暴力革命的“青年派”的几个首领开除出党。(3)过去是把暴力革命看做是普遍规律而把和平过渡看做是个别的特例,召集是把议会斗争、和平过渡看做是通则,而把暴力革命看做是特例、看做是两手策略中的备用手段了。如此重大的思想转向怎能视而不察、等闲视之呢!

四

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到承认现有的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恩格斯说,“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一些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够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他的结论是“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这表明民主是没有阶级性的,什么叫阶级性?什么叫无阶级性?这在有些人的头脑中是十分混乱的。斯大林在理论上有过许多错误,但在对语言的有无阶级性的论述却是很精彩的,它可帮助我们弄清阶级性的有无问题。他说,“语言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服务作用不是替某一阶级服务而损害另一些阶级,而是一视同仁地替全社会服务,替社会所有阶级服务,“它既可以替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也可以替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明白,民主为什么没有阶级性了,民主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所以民主共和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恩格斯此举为我们重新评价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片面性(下转第81页)

义和团的战场表现：从无畏到怯懦

○ 侯宜杰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和直隶爆发，标榜“扶清灭洋”，烧杀抢掠教堂教民，杀害传教士和其他洋人。为保护使馆安全，各国驻京公使要求调卫队进京。5月31日，经清政府同意，各使馆调进卫队300余人。其后，团民陆续进入京城，活动不断升级。6月10日，各国公使感到危险逼近，决定增调兵力保护。当天，英国海军舰队司令西摩率领2100余名八国联军，由塘沽登陆，然后从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发，中途遭遇义和团袭击。从此开始，一部分团民参加了同八国联军的战斗。

“英勇”来自上法吞符

对于团民在与联军作战时的表现，一种主流观点认为极具“英雄气概”，说他们以血肉之躯与侵略军搏斗，英勇抗击，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颂歌。引以为据的一则史料就是：“拳匪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竟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

这种情形在头一两次参加战斗的团民身上，确实存在过。如6月12日义和团在廊坊拦击联军时，团民“挥舞着剑、叉子和棍棒，迎着机枪的射击越跑越近……那些年轻的男人们，明显地处于极度疯狂状态，他们撒野地跑在那些疯狂人群的前面。……他们显示出使人震惊的英勇……持续了一个小时的连续速射……他们被击退，并确信他们已受到了沉重的打击。”14日，团民呐喊着企图夺取并摧毁装甲列车，联军猛烈射击，“但他们仍以惊人的勇敢向前冲，完全暴露在联军的火力之下，毫不顾及自己生命地挥着刀剑。当他们冲到最后六十或七十码时，一挺马克沁机枪向他们开火了……尽管盲信之徒极其勇敢……但当后面的队列踏在前面队列的尸体和倒下的伤

员之上时，他们的勇气丧失了，扔下了长柄叉、大刀和火绳枪，为了宝贵的生命逃走了。”北京的团民开始助攻各国使馆时，亦“自恃其术，每出攻犹踊跃自效”，但被击毙多人以后，同样“渐知枪炮之不可避，遇西兵则相率鼠窜。”

团民初与联军战斗时的英勇来自何处？

刀枪不入是不可能的，神灵附体是骗人的。但调查材料显示，上法以后，团民的勇气确实来了。有些团民说：“磕头上法，大喊大叫地往前闯，看样子都忘了洋人的洋枪子弹蹭头发了。”“打仗时神护着你的身体，枪子来了就顺着身子的两边跑过去了。神让你累也不知道累，分外的有精神。”文献也有记载：“团中童子甚多，有年仅八九岁者，执刀临阵，自云上法后，身不自主，但觉气急不可耐，故前奔耳。”

那么，团民上法之后神就附体，“竟冲头阵”，“视死如归”的奥秘到底在哪里？一位团民的自述解开了这个谜团。

上法的关键不在念咒请神，而在吞符。“义和团每人一道符，用朱砂画在麦黄纸上。”为什么喝了符就有勇气？世世代代在义和门习武的团民索克恭予以最直截了当的回答：“画符用的红砂是兴奋药做的，喝过符一小时内，心神烦昏，光想打仗。一个时辰过了就没事了。”另一位团民说：“据说喝符仅能在一个时辰内管用（符纸可能用兴奋药书写，起心理感，实际并不能避枪炮）。”

奥秘就在“兴奋药”三个字。符是用掺了兴奋药的朱砂画的，喝下符就等于服用了兴奋药。兴奋药含有使人兴奋和暂时迷失本性的成分，所以团民喝下以后，“心神烦昏，光想打仗”；而且这种药只在一小时内发生作用，过了这个时间，人就恢复了原样。团民的“英雄气概”就是来自兴奋药。

尽管目前笔者只见到一位团民将“英雄气概”的奥秘曝光，显得证据略嫌孤单，但也完全有

理由相信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首先,该团民世代习武,了解不为外界所知的绝密内情,他以当事人的身份揭示出请神附体、画符念咒背后所蕴藏的诡谋,证实了团民“英雄气概”产生的真实原因。喝下了兴奋药,团民处于神志不清的癫狂状态,既不知身在何种危险境地,亦不知枪炮可以毙命,光想打仗,所以只知抡着大刀向左右乱砍乱舞,身不由己地冒着枪林弹雨向前冲去。一个义和团的大师兄也坦然承认:“他们所以把自己弄成这样的昏迷状态,是可以避免对刀斫剑击的任何感觉。”这在不了解真实内情的外人看来,团民所表现出来的自然是视死如归、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其次,合理地解开了不易为人们理解的某些谜团。神灵附体、画符念咒在小头目、团民和外人的眼里,仅仅是“取其形式”而已。其实并非如此,而是有其实际意义,即假借这种形式,让团民服用了兴奋药。

团民在战场上吞符念咒以后为何神志不清、如醉如痴如狂,毫无畏惧地向前猛冲乱杀?因为吞符便是服用兴奋药,精神失常,根本不能控制自己。

后面的团民见前面的同伙被击毙,为何尚不畏死,继续前冲?因为他们也吞了符,服用了兴奋药,在兴奋药的控制催动之下,意识不到前面的同伙被击毙,亦不晓得枪炮之厉害。

团民为何冲杀一阵便败退下来?因为兴奋药发挥作用最多只有一个小时,团民在这个时间之内可以充满勇气,“置生死于度外”,超过起作用的时间,神志清醒,便畏死逃跑了。

在练习时大头目们为何也让团民吞符念咒?这是为了让练习者表现出“神拳”的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使人们易于相信,欺骗煽惑更多的人跟着他们行动。

无独有偶,在与义和团相隔一个世纪有余的当今世界上,也出现了服用兴奋药的“勇士”。据英国《每日镜报》报道,“伊拉克的反美武装分子为了对付装备精良的驻伊美军,每当发起进攻前,都要服用一种类似于兴奋剂的特殊药物,吃后立刻感觉自己像‘超人’一样厉害,对美军毫不惧怕。”这一事例可以作为义和团“英雄气概”就是来自兴奋药的有力佐证。

战场上的真实表现

服用兴奋药所产生的勇敢只是一种虚假现象,不能证明团民的“英雄气概”。下面再看团民在抗击联军的主战场——天津的表现。攻击天津租界的战斗在6月13日打响,此时驻守天津的洋兵并不多,大约是廊坊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已被戳穿的消息传开,天津的团民连他们开始进攻时的短暂“勇敢”都未表现出来。

15日,义和团著名的领袖曹福田带领团民赴马家口前线,前面打着一杆红旗,上面大书一个“曹”字,侧书“扶清灭洋,天兵天将”。他骑着马,戴着墨镜,口衔洋烟卷,身穿青长衫,腰束红带,足蹬乌缎靴,腰间插着小洋枪,背负快枪,活脱脱像个黑社会头子。“手中则持一秫秸,语路人曰:‘汝等盍往观乎?但学我手持一秫秸,临阵一挥,洋人立即授首’”。许多人跟着前往观看。入城西门,出城东门,将近马家口,曹福田“辄曰:‘再进已有地雷埋伏,我已算出,不入洋人陷阱’。随由渡船渡河,意似赴河东车站,亦能与洋人战也。及渡河,不复南趋车站,而竟北越街衢,经锦衣卫桥至河北,又渡河而南,肃旅而归。”这样转了一个大圈,根本没有同洋兵打仗,便回来了。而犹“大呼‘大得全胜’,向居民勒得胜饼、绿豆汤,饱餐战饭矣。”他就是这么与联军作战的。27日,他向各国下了一道战书。次日,张德成率领号称“天下第一团”的四五千人到达天津,与他联名出示,29日与洋人“合仗”。表面上看,战书充满了对联军的藐视,显示了大无畏革命精神和把反帝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然而,29日他们却借口东南风不利,竟未出战,实际上不过吹牛骗人而已。以后直隶总督裕禄几次催促他们二人率领团民与清军一起出战,他们“乃藉口时尚未至,或云日干不利,任意推诿。”

愈是往后,团民愈是畏敌如虎。在清军与联军恶战的时日,大致都是这种情况:“攻击洋人时,皆系官兵在前,团民‘在后相随,不敢前进’;‘或招摇过市,以示威武’;或‘匿伏民居中,肆意抢掠’;或‘每声张临敌,率皆绕城而行,去敌尚远,群伏屋角篱根,须臾肃队而归,辄喧呼曰‘大得全胜’。”7月13日,联军向天津城内发起总

攻,夜晚,“城内义和团全部撤出来,外来的义和团全按原路撤走,本市的义和团在撤退中解散,各自回家。”

几位团民也讲了他们的亲身经历。

当时任拳首王荫荣卫队队长的李九恩说：“首次跟敌人作战,是去攻打老龙头车站。……这次战役我们打胜了,但牺牲的人不少。第二次也是打老龙头、老盐坨一带,均在五月间。第三次是打海大道。这回战役,没有人受伤,但回到后方一点名,发现西坛口短了七个人。……我又回到海大道找那七个人,找到了,原来躲在大酱园里。……以后,我们又打海光寺日军营地……攻不上去,就撤回鼓楼。隔天……义和团很快就把队伍拉开了,但是那天并没有作战。”这股义和团打过两次仗后,就有七人躲藏起来,不敢上前线了。第四次败了下来,以后未再打仗。

团民郭世荣说：“第一次……拿着刀枪到了马家口,在那里听说外国人有埋伏,没敢动手就回来了。第二次打武库……见洋人枪炮不断打来,避了枪,避不了炮,于是义和团就撤下来了。回来之后,有些人就动摇了,退了。……第三次是打东局子。……开仗后,有一百来个外国人骑着马排成横排,下了马,端着枪向义和团射去。义和团当时本无枪,又够不上洋人,站着挨打,于是大家都爬(趴)在地上避枪炮。”这股义和团只打过三次仗,第一次“没敢动手就回来了”;第二次同样如此,而且有的动摇逃跑了;第三次不敢向敌人冲锋,“大家都爬(趴)在地上避枪炮”。

团民王文发说：“义和团出了南门,就和住在紫竹林的六国军队招呼上了……整整一天,杀了个天昏地暗。……第二天又跟着打了一仗,夜里还是回到江苏会馆过夜。他妈的,洋毛子……拼命地往这一带打那个开花炮。……不知是谁说:‘这炮可恶呀!咱们别打了,回老家吧。’就这样,我们十二人就夜溜出城,回到老家——郑楼来了。”这12个团民只打了一仗,就逃回老家了。

二师兄李长庆说：“有一次,可能是个法国人,赶着水车走来,一到这里就被我们剁死了,还夺来了一支枪。又有一次,来了鬼子的一队马队,为首的两匹上是女的。我们见了后,就把他们轰到铁路下边,就在铁路下边和他们打了起来,共打死他们七人,夺了两三支枪,一匹马。咱们死了



义和团

七十二人。……纪家庄就打起来了,马场也着火了。于是我就领着这十来个人赶回去,刚到纪家庄,敌人就放二排枪,不一会,庄上跑出个人来说,鬼子过桥了!我抬头一看,庄子也起火了,这才撤回家来。……鬼子占领了海光寺,从此,我们就散了。我逃到离此三十里的大泊子,我的刀就埋在那里。”这股团民开始遇见一个单身洋鬼子,打了胜仗。第二次遇见的以两个女人为首,很可能不是正规战斗部队,所以能打死7个敌人,团民牺牲的多达十倍。后来尚未见到敌人,一听说鬼子过桥,便撤了回来,接着就逃走了。

这几位团民都是在义和团得到高度赞扬的年代里向调查人员讲述的,倘若义和团确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定会感到万分光荣,把英雄事迹毫无隐瞒地加以宣扬。然而,他们的自述说明,义和团决非具有大无畏气概的英雄。

义和团的大头目们如张德成、曹福田、刘十九、韩以礼等自吹神通广大,法术无边,可是,在与联军战斗时,从不见他们“竟冲头阵”,浴血奋战,没有一人战死在拼杀的沙场上,均在危急时刻当了可耻的逃兵。他们的行为不仅比起中日战争中的邓世昌、林永升等爱国将领、民族英雄有天壤之别,就是当时官兵的英雄气概、爱国精神亦高出他们不止千百倍。聂士成一有战事,便驰

美国的党代会： 团结而胜负难料的大会

○ 董郁玉

美国也有党代会，这就是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实则是确认各自政党选举出来的总统候选人的仪式。这种仪式，在最近二三十年以来，随着声光电技术的发展，越发具有“好莱坞”风格的“嘉年华”气氛，用喧闹的方式凸现出庄重。不过，这样充满节日气氛的同道聚会，却很容易让人想起“party”的本意，也凸显了“美国式民主”的特征。

当然，这样的党代会，自然没有什么“政治报告”等政治议程，也不存在谁上下、谁进出等需要在会上揭晓的“核心机密”。即使是大会要确认的总统候选人，其踏入总统竞选征程的“誓词”，也

绝对不敢罗列任何枯燥的政治教条，更不要提那些不抑不扬的政治废话了。在这样的仪式中，尽是激情四射的讲演，全是锋芒毕露的宣示，本党贤达、社会名流、演艺明星、体坛巨匠轮番上场，极尽所能为本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壮行，也不失时机地以此来提升政党的社会动员能力。

不过，美国的政党全国代表大会，并非从一开始就是这般“轻松”。众所周知的是，在《美国宪法》制订之时，来自12个州的制宪会议代表，并不属于任何政党，因为美国的政党组织在当时还没有出现。不仅政党没有出现，那时的美国，甚至连国家政府都没有建立。

美国“独立战争”之后，那些战功显赫的军队

赴各营，激励士兵。7月9日，带兵进攻紫竹林，突遇大队敌人，仍然亲冒炮火向前猛进。到达八里台，“洋兵四面环击，枪炮如雨”，他“两腿均受枪伤，犹督兵不许少退。营官宋占标劝令退后将息，该提督奋不可遏，仍复持刀督战，又被敌枪洞穿左右两腮、项侧、脑门等处，脐下寸许被炮弹炸穿，肠出数寸，登时阵亡。”宋占标“有战必先”与其一起壮烈牺牲。营官徐照德带队攻入武库，“短兵相接，手刃敌人者三，忽中枪弹，犹挥手杀敌，气尽而止。”帮带吕光烈“首先攻入武库，中弹身亡。”营官潘金山守卫东局子，“右腿被枪子洞穿，裹创力战。”马玉昆部右路统领李大川带领部队进攻，“鼓勇先趋，当将铁路夺占”，后来“中炮阵亡”。哨官以下英勇战死的不计其数。有些士兵死的也极为悲壮，潘金山部被迫从东局子撤退时，有两个士兵留下来埋地雷，联军冲进后，他们毅然拉响，与敌人同归于尽。

天津沦陷之后，义和团吓得胆战心惊，魂飞

魄散，再也不敢上前线“灭洋”。仓场侍郎刘恩溥奏道：“津城不守之后，洋人声言专杀义和团民，以致东安、武清各团，皆已闻风解散。”“接奉谕旨，飭臣会合团民，短兵相接，出奇制胜。惟团民业已溃散，臣竟无法可施。”办理通州防剿事宜长萃亦奏道：“前经奏准招募两营，扼要驻防，业经出示晓谕，而义和团民竟无应募之人。”

在北京的团民更不用说了。6月15日，团民二三千人攻打西什库教堂，高声喊叫：“烧呀，杀呀，二毛子呀，你们的生日可到咧。”继而奔向教堂大门。守护的洋兵打了几排枪，击毙三十余人，后来的团民一见，全都吓得跑回去了。“受伤者趴的趴，滚的滚，皆奔命向西滚去。”以后整整两个月，投入数万人，仍未将教堂攻开。8月10日，联军逼近通州，外乡义和团纷纷逃窜。至北京沦陷前，“前所谓义和团者，早已鼠窜兽散矣。”■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黄钟）

将领们,在取得战争胜利后,并没有弹冠相庆、分官封爵,更没有放开肚皮猛灌庆功酒,敞开喉咙高唱“大风歌”,而后撸胳膊挽袖子张罗建国大业。相反,这些开国元勋们都自我削官为民,选择了与他们手下官兵一样的归宿——解甲归田。于是,世界历史上一个罕见的没有政府的国家出现了。有人打江山,没人坐江山,这等傻人和这等怪事的组合,却正构成了美国政治权力形成与传承的基础。

《独立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美国的建立——美国的国庆日以“独立日”相称,即是以此为标志。国家有了,战争打胜了,国家政府却没有成立,政治权力也没有着落。在独立战争硝烟散尽的几年之后,来自12个州的制宪会议代表才开始讨论起草宪法。直至1789年,在《独立宣言》发表13年之后,在《美国宪法》正式生效的情况下,选举人才选举出了美国第一届总统乔治·华盛顿;由此,美国在持续了13年的“无政府”状态后,才有了本国的联邦政府。

要说这个乔治·华盛顿,整个就是农民的底色,老是惦记着他在波托马克河畔的那“一亩三分地”。独立战争胜利后,作为厥功至伟的大陆军总司令,他脱下戎装,放下枪杆子,拿起锄头,专事“修理地球”。1787年,他被推选为制宪会议主席。两年后,他又全票当选为美国国家第一任总统。但是,在毫无悬念地被选举为第二任总统之后,华盛顿决意不再担任第三任总统。1796年,是美国第三任总统的选举之年,华盛顿在其留任呼声甚高、以致可以不需太多努力就能担任美国“终身总统”的情况下,准备好了《告别辞》,放下了政府的“印把子”,又回到农庄撸锄把子去了。

一个依既定政治规则放下政治权力的官员的《告别辞》,与一个因老病“被迫”死亡而不得不放弃政治权力的统治者的“遗训”相比,其道德感



2008年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召力、影响力和约束力都不尽相同。在《告别辞》中,华盛顿对在国家政治权力的取得与交接继过程中出现的党争与派系倾轧的苗头进行了警告。这些警告,成了美国政治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了后来的美国政党组织从事政治活动的“紧箍咒”。

华盛顿在《告别辞》中,对在民选有任期的政府官员选举中的政党作用表示了高度警惕。在华盛顿看来,在选举中,如果政党的作用过于强大,那么,政党或将成为选民对官员进行“授权”的障碍,选举可能名存实亡,而参选候选人和当选后的官员亦将听命于政党,从而可能背离选民的意愿。华盛顿告诫说,政党的精神“是一团火,我们不要熄灭它,但要一致警惕,以防它火焰大发,变成不是供人取暖,而是贻害于人”。

而后来的美国政党发展历史,也大体上没有背离华盛顿的告诫。如果把现今美国的政党全国代表大会比作是一团大火的话,那么,这团大火的“热度”或许刚刚可供人们取暖。实际上,在当今美国总统的选举过程中,政党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小,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过是这团大火的最炫目一刻。

美国的政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形式与内容,是随美国公众政治参与程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一定意义上,所谓民主,就是政治参与;所谓政治参与,就是通过选举来决定政府人选从而由此影响

公共政策选择的政治行为。所以,没有选举,就没有政治参与,而没有政治参与,当然也就没有民主,有什么样的选举,就有什么样的民主,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具体到美国而言,没有限制政党作用、公众参与程度更大更直接的政治参与,也就没有所谓“美国式民主”。

实际上,政党的组织形式,只是实现政治参与的一种技术性手段。在交通、通讯不发达的年代中,一匹马可能是一个人进行政治参与的必要工具,一壶咖啡、几块点心和—个空间稍大的场所可能就是政治参与的必要物质基础。国家建立初期时的物质匮乏、生活艰辛,使得政治参与真正成了“肉食者谋”的事情。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组织就成了凝聚党内外资源、扩大参政所需的财政物质基础的重要工具。

美国的政党,从来就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政党组织“无组织、无纪律”的松散性,既保证了每个党的党员不会因为“入党”而获得什么好处、而只以党的政治倾向为认同标准的“党的纯洁性”,又防止了因党内资源分配而出现的人身依附现象。而这反过来又使得政党没有必要聚拢那么多的社会资源以“犒劳”那些党内的“积极分子”,进而就在最大范围内根除了滋生政党腐败的土壤。

并且,无论从资源使用上还是在财政开支上,政党与政府间的界限分明:政党的一切开支均来自于政党筹得的资金,与国家的财政开支没有关系。因此,美国的政党全国代表大会,不论规模多大,不论开支多少,都甭想从国库里揩油。即使某个政党的候选人日后如愿当选,其胜利也与该党在其任期内的兴衰无甚关系。甚至总统被执政党开除出党,也不影响其法定的权力和任期。这个在理论上的“执政党”,既不能因为本党推出的候选人当选而成为当选者的实际控制力量,更不会因为本党党员成为政府官员而在国家财政上得到一分钱的好处。

百多年来,美国政党的政治作用不断式微。政党在国家政治权力交接与继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是与公众的政治参与方式不断增多、手段日益多样化呈反向关联的。1796年,在华盛顿明确表示其“回家种地”的意愿之后,分属当时不同党派的国会议员以非正式会议的形式,分别提出

了本党的总统以及副总统候选人。这种由国会议员中的政党成员召开的决定各自政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非正式会议,被称为“大佬核心会议(King Caucus)”。30年之后,因美国领土西扩,各政党内部的权力急剧分散,“大佬核心会议”这种决定政党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机制寿终正寝。19世纪30年代,美国各政党开始采用由来自全国各地的党代表来提名本党参加大选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制度。由此,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取代了“大佬核心会议”。

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与“大佬核心会议”相比,政治参与度更强,被推选出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代表性也更强。但是,在19世纪上半叶,由于政党经费开支的限制,旅行和住宿等问题甚至都可以成为限制出席政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人数增加的重要掣肘因素。代表人数少,候选人与选民接触的机会有限,成为政治参与度提高的天花板。此时,各州以及全国性机构的政党领袖们,就会利用决定财务开支的权力,挑选那些符合他们意愿的人充当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进入20世纪,旅行和住宿已经成了普通公众可以自行负担的事情,有意参选的人也可以通过日益增多的技术途径来募集更多的款项,来支撑其在更广的范围内游说选民,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所以,到1916年,已经有过半数的州把由政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名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改变成由普通“党员”直接选举参加大选的候选人,最终再由政党全国代表大会确认候选人资格的初选制度。这个制度,大体上就是人们今天看到的美国总统大选的党内初选制度。

进入20世纪,广播、电视的出现和普及,彻底改变了政党进行政治动员的方式,使得任何阻碍政治参与度提高的借口都不再成立。在互联网时代,普通“党员”利用技术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往往要高于政党的领袖人物。党员、支持者、捐款人、“粉丝”被互联网融为一体。这样,有意参加投票的“党员”甚至都不用离开家门,就可以多角度地了解参选人的背景、主张以及其他品性,当然,也少不了丑闻和八卦。有这样便利的条件,各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沦为”对已经在初选中被选定的候选人的确认仪式,就再正常不过了。

“大佬会议”和全国代表大会“提名并确定”候选人程序的消失,让每个政党参加大选候选人角逐的内部过程完完全全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之下,并成为一定范围内的公众事务。由此,“大佬”也好,“遗老”也罢,其影响力,甚至往往还不如一个选举专家公开发表的一篇政治分析文章。在这种情况下,党内的权势人物也就很难再关起门来在小范围内确定只有不多人中意和更少人知道的人选。在上届美国总统大选中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那些党内深孚众望的所谓“超级代表”,不敢逆拂党内普通党员和代表的意愿,也正是出于这种原因。

美国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说到底就是要让本党的候选人成为国家政府掌权者的一个动员会和誓师会。由此,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目的,就是要“染指”国家政权,接掌政治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就是美国国家政治权力交接和继承中的一个既定的公开程序。这个程序,大体上保障了美国自联邦政府建立直至现在为止的权力交接和继承过程的和平和有序。当然,在争夺权力继承人的过程中,也时有候选人相互“抹屎”的现象出现,但是,无论怎样,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候选人相互“抹血”的血腥场面。

没有经过任何政党遴选程序而当选美国首任总统的乔治·华盛顿的伟大之处,在于其把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质上的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终身制”驱离了美国政治传统。其实,从理论上讲,一个“符合程序”的掌握最高政治权力的终身领袖,并非不可能出现在民主政治中,其出现也并非就一定违反民主政治中“麦克风里出政权”、“摄像头里出领袖”的“票箱规则”。但是,幸运的是,就是如此这般的“小概率事件”,也被华盛顿“扼杀”在动议之中。而华盛顿此举,不啻为美国尚属稚嫩的民主“肌体”剝掉了一块可能被用来“下蛆”的“肌肉”。此一历史意义,从今天俄罗斯前总统、现总理普京力图钻宪法的空子而“二进(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努力中,更加凸显出来。

不过,从民主政治中“剔出”“合法的终身制”,其意义再伟大,也不过是解决了民主政治中的一个最基本问题。实际上,比“终身制”更危险、甚至更难依规则改变的却是政治权力看似“有

序”交接与和平继承的“传玺制”。在“传玺制”下,权力交接得越顺利、继承得越平稳,权力治下的公众则越没有“盼头”。

不论哪个政党,把参加继承国家权力角逐的党内候选人的竞争过程公开化,让所谓“初选”就由选民预选,是防止“传玺制”出现的良方。即使在民主制下,一个政党,只要强大到可以稳占国家权力继承者的位置,从而可以在党内“传玺”的程度,那么,这样的国家权力交接与继承,从理论上讲,等于是剥夺了至多可达49%(美国的选制下可能更多)选民的政治参与权。而且,有关国家权力继承的角逐也从主要是政党与政党的竞争,转向了主要是党内同志之间的竞争。这种情况下,党内的竞争几乎可以肯定要残酷于党外的竞争,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就成了虽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然却胜负已定的大会。因为党外之争,主要是保持或扩大优势之争,而党内之争才是真正的国家权力继承之争。这样的政党,如果竞争不透明,少数大佬说了算,那么,党内腐败的因由会就此而起。此一点,从日本原来的自民党在代议制民主下50多年的“传玺”历史中,就可以透彻地观察得到。

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与运作中,保持政党与政党之间势均力敌的竞争性,是防止“传玺”现象出现的必要条件。华盛顿之后,从美国第三任总统起,所有美国总统都有各自的政党身份。不同的政党,有不同的政纲。而政纲实际上就是政党利益的最直接表达。在多元社会中,不同的利益,有其当然的正当性。而政党利益的正当性,是不同政党存在正当性的基础,也是不同政党在合法竞争的状态下,通过取得政权来实现政党政纲,进而实现自己利益这一制度正当性的道德基石。

也正是在这样的正当性下,政党利益的依法表达,虽有“自私自利”之嫌,却无被定性为“僭越”、“窃取”之忧。在争夺国家政权的竞争中,各政党都要在不耗费国家资源的情况下,筛选各自的利益,从而组合成参选策略。在此,政党利益的清晰表达,是政党取得选民信任,扩大政党的社会基础,使政党更具代表性的前提。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历次美国总统大选中,那些在各政党利益的分野地带,看似中立中庸的候选人,反而既得不到各自政党中最中坚力量支持,也难以取得具

有其他利益倾向的人完全信任的原因所在。在政治舞台上,政治人物的角色转换,绝非换件戏装、变个腔调那么简单。

所谓政党的代表性,其实就是对政党利益的认同度。认同度高,政党的代表性强,反之则差。因此,没有对政党特征的清晰表达,政党的代表性就不可能鲜明,取得政治认同的难度就会加大。也是因此,在美国国家权力无数次“风水轮流转”的交接继承中,正是那些模糊政党一己之利,甚至声言没有政党自我利益的候选人,从来就没有实现自己“无私”风范的机会。在宪政基础之上的政治信任,既不允许“羊头狗肉”,也不通行“狗头羊肉”。这是因为政党代表性的背后有常识,政治信任产生的基础有逻辑。

允许不讳言一己之私的政党存在,并从中择其合意者,这当然不是选民太傻、太自私,而是一个没有自己利益的无私之党、无私之人的执政动机,很难得到那些每天都要吃喝拉撒睡的普通凡人的理解。当然,问题更在于,在现实社会中,无私政党及其候选人,怎么可能在“有私”的民众中,在财力的约束下,把无私的政纲从“口惠”落实到“实至”呢?而如果候选人在竞选中提出了一些超出普通人常识所能判断的目标和规划,提出一些绚丽多彩、花里胡哨的前景,那么,他就等于向竞争对手缴械投降。这当然也是在上次美国总

图书介绍

邓小平曾经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段话,如实的总结了党的历史。

1957年至1978年20年来,中共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至十年“文革”灾难。建国之后,肃反发展到以言治罪,以思想划分阶级;1957年前后反胡风,反右派,反地方主义,尤其反右,整了当时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内中多为高级知识分子与精英人

物;庐山会议后反右倾,伤及380万人;十年“文革”更是遍地敌情,如山冤案,国家主席、三军元帅都难幸免。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的恶果之一。1978年后,平反了一切冤假错案,才基本结束自己整自己的漫长历史,直到现在,“左”的阴魂从未散去。

再者,在不同政党都可合法存在的政治制度下,各自政党的不同利益,既是对以政党候选人名义获取政权者的约束,也是政党之间不用花费国家财力资源而实现彼此监督、相互挑剔的必要条件。当然,是“小政府、大社会”,还是“高税收、高福利”,这些代表不同政党利益的政纲,当其候选人获得国家政治权力后,在将体现其政党利益的政纲依合法程序转变为公共政策时,其间之不同并不会产生霄壤之别的差别。这不仅是因为所有公共政策都必须在由多党组成的代议机构讨论通过后才可形成,更是因为宪政制度保障下的民意选择并非绝对的“四年一次”,尼克松的政治下场就是明证。

也正是因此,美国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其实是一场只可言团结而不能定胜负的大会。这是因为哪个党的候选人最终能获得国家权力继承人的位置,党说了不算,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说了不算,甚至党的支持者也说了不算,而是全国的选民说了算。不论是怎样,那些政党的候选人,都必须在全国代表大会这团“大火”中暖暖身子,以投入到其后的冷酷竞争中去。■

(责任编辑 黄钟)



物;庐山会议后反右倾,伤及380万人;十年“文革”更是遍地敌情,如山冤案,国家主席、三军元帅都难幸免。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的恶果之一。1978年后,平反了一切冤假错案,才基本结束自己整自己的漫长历史,直到现在,“左”的阴魂从未散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历史情况?革命和建设两个阶段长期存在“左”的错误,产生其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是思想认识和理论问题,除此之外,根本问题还是体制问题,是民主和法制化的问题。本书对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庐山会议的教训,“大跃进”失败教训何在等问题,进行了披露和反思,提出了反“左”的感想和意见。

定价 22.8元 邮费 6元 地址及邮编见版权页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668-0650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代理出版：

- 个人出书：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专记、学术著作等。
- 老人出书：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 家庭出书：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 学生出书：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 学校出书：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 博客出书：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合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 旧书翻印：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 电子音像：音乐、戏曲、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合作出书 常规出书 宣传推广 合作教材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署名/独名/编著

出书类型：

- A类：国内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可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 B类：无书号出版，用于交流与赠送，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基本价格：

- 1、大32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三千元，300页印刷100本四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2、16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4千元，300页印刷100本五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注：A类型代理出版的书，1000册起印；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校（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欢迎“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中国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代理出版业务。尤其自《学生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每年代理出版作品近百余部；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服务热线：010-58608407 82057551 58608409

传 真：010-58608409 投稿邮箱：5805191@163.com

登陆网址：(老人出版网)www.lrchuban.com(学校出版网)www.xxchuban.com

(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出版发行网)www.51isbn.com

公司名称：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102218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作品展示





三千元五十本起编辑出版 个人文集·回忆自传·家史家谱

(三年出版一千余种, 欢迎来书店参观洽谈或来电咨询)

出书范围

- 1、个人文集: 诗文、小说、杂文、随笔等单集或合集。
- 2、回忆自传: 革命、受难、创业、怀旧等回忆录、自传。
- 3、家史家谱: 先烈纪念集、先辈遗文集, 家族百年史、家谱族谱等。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打算→编辑部寄发参考样书→作者寄送稿件图片→公司核算成本价格→协商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寄送大样作者初审→专业编辑审改→协商设计封面插页→排版设计制作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出版印刷送书。

基本价格

“个人文集、回忆自传”一般32开本, “家族史记、家谱族谱”一般16开本, 封面与照片铜版纸彩印, 内文黑白胶印, 胶装或线装; 二百页出版50本三千元起, 设计、排版与加印彩页费用另行计算。所出书一般没有书号, 只用于交流与赠送, 需要书号发行的另行协商。北京客户上门服务, 外地客户来电说明赠送样书。

老人出书, 历史见证; 家族出书, 文化传承!

服务电话: 010-6892 0114 6892 0399 6252 5116

接待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图书城25号(家史·家谱·传记书店) 邮编: 100080

单 位: 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绘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登陆网址: 《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家族出书网》(www.jzcsw.net)

欢迎订阅2012年 **炎黄春秋**

2012年本刊将继续——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

以史为鉴、以史资治，“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

恪守“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的史德，

以求实存真的态度书写历史。

全年 96元 订购热线：**010-68532048**
010-68539058

邮发代号：82-507 全国邮局网点均可订阅

直接向本刊办理全年订阅和单本邮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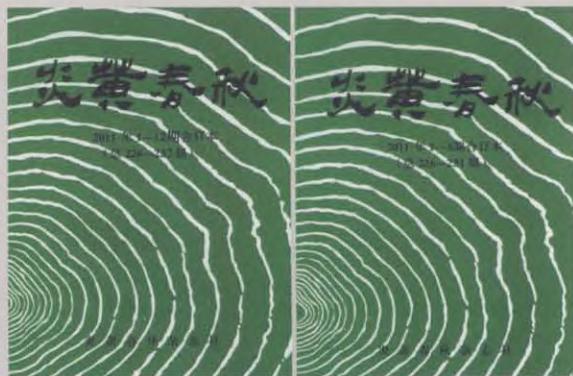
邮局汇款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收款地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银行汇款 开户名：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帐号：01090324900120109064325 开户行：北京银行复兴支行

批发联系：13910850872 传真：010-68522852 电子信箱：yhcqfxb01@126.com Yhcqw01@126.com

网上订购：代理本刊零售网店“炎黄春秋网上书城” <http://yh100.taobao.com>

炎黄春秋2011年合订本



最新推出

简装一册本 110元
简装上下两册本 120元

本社发行部是《炎黄春秋》杂志合订本惟一正式发行渠道

合订本邮购免收邮费，订购者请通过邮局直接将款项邮寄本刊发行部。

务必在汇款单上填写清楚收件人详细地址、姓名、邮编、要求以及联系电话。

2009年、2010年合订本(均为上下两册，每年105元)存量稀少，如需要，请直接汇款购买。

辛亥革命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陷阱

王元化：对启蒙思想的反思

储安平在《光明日报》当总编

重温新民主主义

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

义和团的战场表现：从无畏到怯懦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8.00元